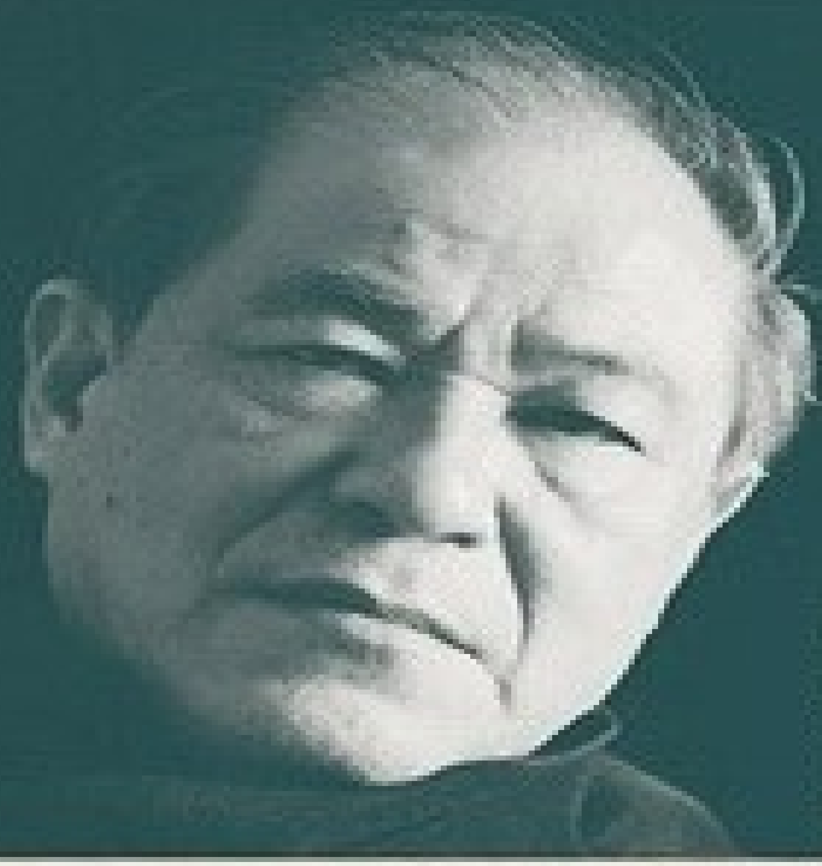


无悔

陈明忠回忆录

一个日据时期的"台湾日本人"怎样变成中国人
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如何成为社会主义者
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为何是坚定的两岸统一派
精彩难得的精神履历，暗夜行路 矢志不渝

李娜 整理编辑
吕正惠 校订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书名页

无悔：陈明忠回忆录

李娜 编辑整理

吕正惠 校对

一个日据时期的“台湾日本人”一怎样变成中国人

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如何成为社会主义者

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为何是坚定的两岸统一派

请读难得的精神履历：暗夜行路 失志不渝

版权页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lP)数据

无悔：陈明忠回忆录／李娜整理编辑.-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4

ISBN 978-7-108-05664-1

I.①无…II.①李…III.①陈明忠-回忆录IV.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9867号

责任编辑叶彤

装帧设计张红朱丽娜

责任印制崔华君

出版发行生活·黄耆·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编 100010

网 amwww.sdxjpe.com

经销新华书店

排版制作北京红方众文科技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16年4月北京第1版

201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635毫米×965毫米1/16印张20.25

字数193千字图50幅

印定数00，001—10，000册价48.00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序——吕正惠

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这些台湾统派的年轻人，很希望五十年代的老政治犯（我们习称“老同学”）写回忆录。那时候全台湾已经充斥着“台独”派的历史观，我们希望“老同学”的回忆录可以产生一些平衡作用。但“老同学”对我们的建议不予理会，他们认为，重要的是要做事，回忆过去没有什么用。况且，那时候台湾解除“戒严令”才不久，“老同学”也不知道过去的事能讲到什么程度，心里有很多顾忌，当然更不愿意讲述以前的事。

当时我们着重说服的两个对象，是林书扬先生和陈明忠先生。林先生尤其排斥写回忆录的想法，因此，直到他过世我们都不太了解他的一生。陈先生虽然比较愿意谈过去的事，但也只是在不同的场合偶尔谈上一段，也没有想写回忆录的念头。

二〇〇八年，《思想》的主编钱永祥，要我和陈宜中联合访问陈先生。这篇访问稿《一个台湾人的左统之路》发表以后，很意外地被大陆很多网站转载，大陆读者反映说，他们对台湾历史增加了另一种理解。

由于这个缘故，陈先生终于同意由他口述，让我们整理出一部回忆录。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李娜知道这件事以后，自告奋勇，表示愿意承担访谈录音和整理、编辑的工作，不拿任何报酬。李娜和蓝博洲、张俊杰，还有我，多有来往，比较了解台湾的统派，熟悉台湾历史，为人也很热情，所以我们都同意由她来承担这一工作。应该说，这本书能够完成，李娜是最大的功臣。

李娜完成录音的逐字稿整理和编辑以后，我打印出来，交给陈先生修订增补，我再根据陈先生的校稿加以整理。李娜的逐字稿已经把陈先生所讲述的事实做了一些归并，而且划分了章节。在这方面陈先生和我只做了小幅度的调整。我的主要工作是修订文字，让陈先生的意思表达得更明确，并且跟陈先生随时联系，确认一些事实。

我跟李娜讲，陈先生普通话讲得不太好，讲话常有闽南话的习惯，造句、用词比较质朴，整理时不要太过修饰，尽可能保持他的语气，这样比较生动。李娜完全按照这一原则整理，只有少数地方不太合乎闽南语的习惯。我跟陈先生一样，讲的普通话含有浓厚的闽南话味道，因此，凡是我认为不太合乎陈先生口吻的句子和用词，我都改了。另外，陈先生个性比较急，讲得比较快，前后句子常常不太连贯，我就增加一些句子，让意思清楚。我的修改，陈先生至少看过三遍，他有时候也加以增改。应该说，全稿是在陈先生的仔细审订下通过的。

回顾起来，自从李娜把逐字稿交给我以后，又经过了两年多，因为我很忙，校订工作拖得太久，这是应该跟陈先生和李娜致歉的。另外，稿子在《彝报》连载期间，我把校订稿打印出来，交由陈先生修订。这种工作都是陈福裕负责的，他还和陈先生密切联系，从陈先生处选用照片，编配在本书中。在最后的排印过程中，一切工作全部由人间出版社的蔡钰凌小姐和夏潮联合会的李中小姐统筹。最后，黄玛琍小姐听说是陈先生的书，立即允诺设计封面及版面，这都应该说明，并表示感谢。

二

陈先生生于一九二九年，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的最后阶段，台湾光复时十六岁，高中已经毕业，因此他主要的知识语言是日语。十八岁时遭逢“二二八”事件，并身涉其中，事变后不久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一九五〇年被捕，一九六〇年出狱。出狱后，经过艰苦的努力，成为台湾新兴企业的重要管理人员。但他不改其志，始终关心祖国的前途，花费大量金钱从日本搜购资料，并与岛内同志密切联系，导致他在一九七六年第二次被捕。国民党原本要借着他的案件，把当时岛内从事民主运动的重要人物一网打尽。陈先生备受各种苦刑，仍然坚贞不屈，让国民党找不到扩大逮捕的借口。国民党原本要判他死刑，由于海外人权组织和美国保钓运动参加者的倾力援救，改判十五年徒刑，一九八七年因病保释就医。陈先生出狱时，岛内“台独”势力已成气候，不久民进党组党，“戒严令”解除。为了对抗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陈先生又联络同志，组织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中国统一联盟、劳动党等，是台湾公认的重要统左派领袖。

陈先生口述的一生经历，主要围绕着上述事件而展开，主要是以叙述为主，虽然偶有议论，但无法系统地呈现他的政治见解，因此他决定把《一个台湾人的统左之路》收入书中，以弥补这一缺憾。陈先生的一生，不但呈现了台湾近七十年历史的一个侧面，同时也曲折地反映了中国人的现代命运。因为现代的年轻人对这段历史大都不太熟悉，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对本书中所涉及的历史问题加以重点分析。我希望这本书将来能够在大陆出版，因此，我把大陆的读者都预想在内，涉及面比较广，希望引起大陆读者的关注和讨论。

我的序言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台湾人与日本殖民统治的关系；二、国民党与“台独”；三、中国一九四九年革命的后续发展问题。

大陆的一般人好像有一个倾向，认为台湾人对日本的殖民统治颇有好感，到现在还念念不忘，其实这是最近一二十年来台湾媒体给大陆读者造成的印象，完全不合乎历史实情。在一次简短的访谈中（见本书附录），陈先生一开始就说，改变他整个人生的思想和行为的，就是高雄中学的日本人对他的歧视。这并不是单独的个案。陈先生的前辈，“二二八”事件后台北地区地下党的领导人，后来被国民党处死的

郭琇琮，是另一个著名的例子。他出身于台北大地主之家，跟陈先生一样，考上台北最好的高中，也因为饱受日本同学的欺压而成为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只要熟悉日据末期的史料，以及当时台湾重要人物的传记，就可以知道，光复后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台湾人普遍都有这种遭遇。

其次，台湾农民的处境，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远比清朝恶劣得多，陈先生在书中已经谈到了。只要稍微阅读日据时代的台湾新文学作品，或者了解一下日据时代的台湾经济发展，也会得到这样的印象，这就是为什么日据时期台湾最活跃的反日运动是由“农民组合”所发动的。而领导农民组合的知识分子，大半就是对日本人的歧视非常不满的、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的台湾人。这一股力量，是台湾左翼运动的核心，也是台湾光复和“二二八”事件后，台湾主流知识圈倒向共产党，并且加入地下组织的主要推动力。

非左翼的民族主义者如林献堂等大地主阶级，也对日本的统治不满。因为他们极少参政的机会，他们的经济利益也严重受到日本企业的排挤。他们一心向往祖国，认为只要回到祖国的怀抱，他们就可以成为台湾的主导力量，并且取得他们应有的经济利益。因此，台湾光复，国民党的接收官员和军队到达台湾时，受到极为热烈的欢迎，这从当时的报纸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这种情势，在国民党来接收以后，逐渐地、完全地改变了。国民党的接收，几乎一无是处，所以才会不到两年就激发了蔓延全岛的“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后，台湾内部的左翼力量认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在来台的大陆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下，迅速倒向共产党。他们之中最勇敢的、最有见识的，基本上都加入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当时国共内战的局势对共产党越来越有利，他们认为台湾解放在即，不久的将来就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没想到，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开始保护残存的国民党政权，国民党也在美国支持下，大力扫荡岛内的“亲共分子”，这就是大家习称的白色恐怖。国民党秉持“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个”的原则，几乎肃清了岛内所有支持共产党的人。这样，最坚定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台湾人，不是被枪毙，就是被关押在绿岛，还有一部分逃亡到大陆或海外，日据时代以来最坚定的抗日和民族主义力量，在台湾几乎全部消失。

非左翼的地主阶级（左翼中的地主阶级也不少，如郭琇琮、陈明忠都是）虽然对国民党很不满，但比起共产党，他们还是勉强跟国民党合作。但是，美国为了杜绝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左翼根源，强迫三个地方的当局进行土地改革。国民党当然愿意跟美国配合，因为这还可以借机削弱台湾地主阶级的势力。国民党表面上是向台湾的地主阶级购买土地，但实际上付给地主的地价根本不及原有的三分之一。台湾的地主阶级从此对国民党更为痛恨，地主阶级的领袖林献堂外逃日本，而且还支持在日本从事"独立"运动的另一个地主邱永汉。所以陈先生才会说，"台独"运动的根源是土地改革，这是从未有人说过的、深刻的论断。

这样，台湾内部原有的最坚强的、爱国的左翼传统在台湾完全消失，而原来温和抗日或者跟日本合作的地主阶级，全部转过来仇恨国民党。前一种人的后代，在父亲一辈被捕、被杀或者逃亡之后，在反共的宣传体制下长大，无法了解历史真相，又因为上一代的仇恨，当然也只会仇恨国民党。而地主阶级的后代，不管他们的经济力量受到如何削弱，他们还是比较有机会受到教育，比较有机会到美国留学。他们上一代对国民党的仇恨都遗留在他们身上，他们在海外又受到美国的煽动和支持，其"台独"组织在一九七〇年代大大地发展起来，并且在一九八〇年代和岛内的"台独"势力相结合，成为目前"台独"运动的主流。

在美国新兴的"台独"势力，开始美化日本人的统治。就台湾一般民众而言，他们亲身经历过日本和国民党的统治，认为日本官吏比较清廉而有能力，国民党的官吏则是又贪污又无能，他们逐渐忘却日本统治的残暴和压榨，因为国民党的残酷绝不下于日本人，而国民党的压榨也和日本人不相上下。所以，"台独"派对于日本殖民统治的美化，很容易得到一般台湾民众的呼应，这样，整个历史就被颠倒过来，积非成是了。最重要的关键还在于，国民党把最坚强的抗日爱国的岛内势力根除无余，这也是一九八〇年以后岛内的统派力量一直很微弱，难以发挥影响的原因。

三

国民党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残酷地清除台湾最坚强的、抗日的爱国力量，这纯粹是自私。但国民党为了稳定台湾，发展台湾的经济，不得不实行土地改革，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做错了。没有土地改革，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经济发展。台湾地主阶级的后代对此念念不忘，也应该加以批评。

坦白地说，这十多年来我对国民党在台湾的功过比较能坦然地加以评价。国民党在土地改革后，实行低学费的义务教育，又实行非常公正的联考制度，让许许多多贫困的台湾农家子弟逐渐出头，确实有很大的贡献。另外，由于教育的普及，受过教育的台湾人基本上都会讲普通话（台湾称为“国语”）。普通话不但让台湾的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还有少数民族可以相互沟通，而且，在两岸互通以后，还可以跟大陆一般民众沟通，客观上为统一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虽然在推行普通话的过程中，国民党曾短时期（五六十年代之交）施行过禁止方言的过当政策，但总是功大于过。现在的“台独”派，不管花多少力气想把闽南话文字化（他们称为“台湾话文”），都不能成功，这反过来证明了国民党推行普通话的贡献。

一九七〇年代以后，尤其在一九八七年“解严”以后，过去三十余年台湾历史的真相逐渐被暴露出来。面对“台独”派及一般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罪行的控诉，国民党的统治阶层，以及他们的第二代很难反驳，再加上美国的暗中支持，国民党也无法以法律来压制“台独”言论。这样，政治上台湾就分成两大阵营，即现在一般所谓的“蓝”与“绿”。在国民党长期统治之下，还是有不少台湾人跟国民党合作，他们的利益和国民党密不可分，同时，由于民进党常常诉诸群众运动，过分偏激，不少中立者宁可支持国民党，现在蓝、绿两边大致势均力敌。

不过，蓝军也并不支持统一。国民党的核心统治集团，是当年战败逃到台湾来的最顽固的反共人物，他们有很深的仇共情绪，并且把这种情绪遗留给他们的第二代。他们认为，虽然国民党治台初期犯了重大错误，但台湾社会的现代化还是要归功于国民党，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台湾民众才能过上富裕与民主的生活。因为仇共和自许的成就，即使面对“台独”派极大的压力，他们也不愿跟共产党合作，接受统

一。就其实质而言，蓝营基本上和绿营一样，都很少具有民族主义的情怀。除了维持“中华民国”的正统性这一点之外，他们跟绿营的区别并不大。所以很吊诡的是，蓝营虽然表面不讲“独立”，但他们真正的心愿是以“中华民国”这一块招牌，把台湾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所以现在的国民党也成为另一种意义的“台独”派。可以说，国民党长期和美国合作所进行的“反共”（后来还有“反中”）宣传，造成了今天岛内两党恶斗、面对大陆又两党一致的怪异局面。

其实，这一切都是美国长期导演出来的。美国在朝鲜战争之后，一方面用武力保护台湾，一方面支持台湾的经济改革，又利用极优厚的留学条件，把大部分的台湾精英都吸引到美国去。事实上，现在的台湾统治集团（不论蓝、绿），还有台湾大部分的企业家和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后代（或其亲属），甚至他们本人，不是拥有美国国籍，就是持有美国绿卡（马英九的女儿就是美国籍）。这样的集团既控制了台湾，又和美国具有利益上的种种瓜葛。在这同时，又有美国的盟友日本助上一臂之力。因为，作为“台独”核心的地主阶级的后代，基本上都亲日，在他们的影响下，“哈日”之风盛行。“台独”派甚至把当年日本人斥骂台湾人的“支那”和“清国奴”，转而用到现在的中国人身上，可谓荒谬绝伦。可以说台湾长期在美国和日本的影响下，已经自视为亚洲的“文明国家”。台湾人实际上抄袭了日本人的“脱亚入欧”论，不但瞧不起大陆人，也瞧不起东南亚国家的人。

现在大陆的少数人有一种想法，认为让台湾长期维持现状，对大陆的政治改革会产生积极的作用，这是不了解台湾问题的本质。因为，台湾问题是美国和日本采取联合行动，刻意干涉中国内政的最后残余。台湾问题不解决，就是中国百余年来被侵略的历史还没有结束。我们应该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来看待台湾问题，不应该对台湾的所谓“民主”抱有幻想。最近民进党煽动无知的学生包围“总统府”和“立法院”，表现出一种无可理喻的“反中”情绪，就是最鲜明的例子。

四

陈先生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加入地下党时，只有十八岁。那时候的他，对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都不是很深刻。一九六〇年他第一次出狱时是三十一岁，此后十六年，他想尽办法偷读日文资料，以求了解新中国的局势。一九七六年第二次被捕，不久“文革”结束，这时，他也许才开始真正的“探索”。他说，“文革”结束之后台湾对“文革”的报道，让他非常痛苦，他不知道中国革命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他不得不为自己牺牲一辈子所追求的事业寻求一个合理的解释，不然他会觉得自己白活了。

一九八七年陈先生第二次出狱，他开始阅读大量的日本左派书籍，企图深入了解中国革命的历程、“文革”发生的背景，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他已经把他的探索过程和看法写成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本书，主要的观点在本书中也略有提及。

陈先生探索的结论大略如下。他认为，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集合全民（或者说四个阶级）的力量与意志，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力现代化。这一阶段还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朝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这个说法，意思和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相近。又说，刘少奇是了解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新民主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有类似之处，“新民主主义”的形成，刘少奇贡献很大。新中国成立以后，事实上，“毛泽东个人”走的就是一条“违反”新民主主义这一“毛泽东思想”的路，所以才会产生“反右”和“文革”那种大错误（亦即，毛泽东不遵守“毛泽东思想”）。总之，陈先生最后肯定了自己年轻时选择的“新民主主义”，而且，把这一主义思考得更加清晰。

陈先生认为，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是一种“备战体制”，是在面对美国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随时威胁时的“应时之需”，毛泽东错把“应时之需”当作正确的思想了。陈先生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坚决拥护者。陈先生又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并没有违反社会主义的精神，还在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至于什么时候达到社会主义，他是无法知道的。他能够看到自己祖国的强大，看到统一有望，也看到中国有实力制衡西方，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掠夺政策，他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

我是一个“后生”的观察者，不像陈先生具有“参与者”的身份。我也像陈先生一样，认为“后进”的中国的所谓“革命”，第一个任务就是以“集体”的力量全力搞现代化，以达到“脱贫”和“抵抗帝国主义”的双重任务。但是，我比较相信毛泽东思想具有“复杂性”，并不纯粹是“备战体制”。

不论我跟陈先生在这方面的想法有什么不同，但我们都了解到，革命的道路是非常艰难的、前无所承的。在五十年代，主管经济的陈云和主管农业的邓子恢常和毛泽东“吵架”，因为他们不能接受毛泽东在经济上和农业上的一些看法。陈云常常退出第一线，表示他不想执行毛泽东政策，而邓子恢几次跟毛泽东唱反调后，终于被“挂”起来，无所事事。梁漱溟所以跟毛泽东大吵，也是为了农业政策。这些，都可以说明，新中国成立以后，路子应该怎么走，党内外有许多不同看法。“大跃进”失败以前，大致是毛主导；“大跃进”失败以后，变成刘少奇主导。“文革”又是毛主导，“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主导。应该说，中国的情势太复杂，内部问题很难理清。经过“文革”的惨痛教训，邓小平才能抓稳方向（一九八九年还是差一点出轨、翻车）。我推想，邓是以刘为主的一种“综合”，正反合的“合”，而不是纯粹的刘少奇路线。但这只是“推论”，目前还无法证实。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都犯过错误，而且一些错误还不小，应该批评。但如果说，这一切错误都是可以避免的，因此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主要地应该加以否定，那未免把中国这个庞大而古老的国家的“重建”之路看得太简单了。邓小平主导以后，还不到三十年，大家都觉得好像走对了，不免松一口大气，歌颂邓的英明。我认为，这也是把问题看简单了，邓是毛、刘、周的继承人，他不可能不从他们身上学到一点东西，因此，邓也不是纯粹的邓个人。对于历史，我觉得应该这样理解（邓应该也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中看到了一点东西，当然这是随他的意思决定去取的）。

我觉得，大陆内部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很多知识分子不了解中国革命在“反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或者“反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的意义。在中国崛起之前，西欧、北美、日本这些“列强”，都曾经侵略其他国家，强占殖民地（甚至可以包括苏联在“二战”后对东欧国家的宰制），而中国从来就没有过。到目前为止，中国是唯一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的现代化经济国家。

现在大家说："中国是世界的工厂。"俄罗斯的一份周刊说："世界超过一半的照相机、百分之三十的空调和电视、百分之二十五的洗衣机、百分之二十的冰箱都是由中国生产的。"前几年大陆南方闹雪灾，交通瘫痪，物资不能输出，据说美国的日常用品的价格因此涨了一两成。我说这话，不是在夸耀中国的成就，而是想说，中国的经济改变了"全球体系"。

在中国的经济还不能对"全球体系"造成明显影响时，西方、日本都已忧心忡忡，担心中国的崛起会"为祸世界"。即使到了现在，如果美国不是陷入一连串的泥淖之中，你能想象美国愿意坐视中国崛起吗？美国不是不想做，而是没有能力去做。

如果中国因素的加入，使得"全球体系"陷入不平衡状况，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崛起让英、法寝食难安，那"全球体系"就只有靠"先进国家"为了"扼阻"新因素的"侵入"而发起战争来解决了，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这样发生的。事实上，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并不是不想"教训"中国，只是它没有能力罢了。美国和日本搞军事联盟，说如果"周边有事"，它们就要如何如何，意思不是够明显了吗?

如果中国经济的崛起，能够让"全球体系"产生良性的调整，从而对全人类的发展有利，那就是全人类的大幸。如果因中国的崛起，而让全世界经济产生不平衡，从而引发另一波的"列强大战"，那人类大概就要完蛋了。现在美国经济不景气，情况似乎颇为严重；如果美国经济一下子崩溃，你能想象这个"全球体系"能不"暂时"瓦解吗？这样岂不也要"天下大乱"？应该说，中国一再宣称"不称霸"，宣称要"和谐"，就是希望避免这样一次大震荡。我觉得，这个时候重新来思考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逻辑的分析，就更有意义了。我是一个中国民族主义者，但我从来就希望，中国崛起只是一种"自救"，而不是产生另一个"美国"或"英国"或"日本"或"德国"，或一种难以形容的资本主义"怪物"。我觉得这样的思考也可以算是一种让"全球体系""走向社会主义"的思考。

从马克思的原始立场来解释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全面展开时，才可能实现。因为，只有全人类有丰裕的物质生产，才可能想象马克思所构想的那个人人富足、人人自由的物质与心灵双方面得到完满实现的社会。"一战"以后，西方资本

主义体制第一次遭遇全面危机时，许许多多的左派革命志士认为，全球革命的时代已经来临，但最终证明那是一种幻觉。

这一次“不合乎”马克思原始构想的“世界革命”，以苏共的革命开其端，以中共的革命达到高潮，以“二战”后许多“后进国”的共产党革命延续下去。现在已经可以了解，这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后进国”以集体的力量来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工程，这一工程可以把“后进国”绝大部分受苦受难的人从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剥削之下解救出来。这一革命的牺牲相当惨重，但相对而言，“二战”后那些走“西方现代化”路线的“后进”国家，牺牲也一样惨重。姑且不论这两条路谁是谁非，“后进国”都被迫走上了资本主义国家逼它们非走不可的道路。走第一条道路而唯一获得成功的是中国，走这第二条道路很可能将要成功的，大家都看好印度。中国的成功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具有三重意义。第一，它的崛起好像还不至于导致德国、日本崛起以后的那种资本“帝国大战”。第二，到现在为止，中国经济也还不是经典意义下的“资本主义”（它还保留了相当比例的公有制，也没有全面市场化），因此可以希望它对其他“后进国”产生启导作用，让它们不必完全照“西方道路”走。

中国的崛起距离全球范围的现代化还很遥远。拉丁美洲、非洲、伊斯兰世界、东南亚，这些地区目前都还在发展，我们不知道西方（尤其是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如何解决，也不知道拉丁美洲最终是否可以从美国资本主义的桎梏之下解放出来。但是，无疑的，现在可以用更清醒的眼光，用马克思的方法，好好地审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未来。只是，我们很难期待，二十一世纪会出现另一个马克思。

在这种情形下，每个地区、每个民族都只能以自救、自保为先。达到第一步以后，如果能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促使它们良性发展，而且不对周边地区产生明显的经济“剥削”，我相信，这样的国家就要比以前的英法、“二战”后的美日好太多了。并且，第三，如果它还能进一步制衡愈来愈黩武化的美国，让美国不敢太嚣张，那它对世界和平无疑是有贡献的。我认为，中国是现在世界上唯一有力量力争实现这三重目标的国家。

我跟一些大陆朋友谈过我的看法。有些人认为中国本身的问题多如牛毛，我这样想，未免不太切合实际。我逐渐了解，这种人大多羡慕美

国模式，认为中国距离美国模式还太遥远。但让我高兴的是，像我这种思想倾向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加。我相信，这种思想倾向，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之内，会成为大陆思想的主流。

五

我跟陈先生来往二十余年，用客观的眼光来看，他一辈子的经历让我非常感兴趣。他出身于大地主之家，从小不愁吃穿，生性聪明，居然从偏僻的乡下小学，考上台湾南部最优秀的高雄中学，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台中农业专门学校的农化系，最后还是以第一名毕业。以这样的背景，在台湾刚光复的历史条件下，他可以从政，就像他的好朋友林渊源那样，很容易成为地方派系领袖，甚至可以选上县长；他也可以从商，在台湾现代化的过程中，不难成为富裕的企业家；他也可以走学术道路，如果光复后他到日本留学，应该有机会成为名牌大学的教授。但是，这些路他都不走。在高雄中学的时候，因为日本人的歧视与欺压，他走上了反抗之路；光复后，因为国民党接收的劣政和“二二八”事件，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因此历经艰险，九死一生，但从不后悔。从我们光复后接受国民党教育的人的眼光来看，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陈先生现在的生活非常简单，如果没事在家，一天就买两个便当，中餐和太太共吃一个，晚餐再吃另一个。他全心全力为他的工作奔忙，此外，没有其他的需求。我没有见过人生目标这么明确、行动这么果决、意志这么坚定的人。一个人，十八岁就决定加入革命组织，到现在已经八十五岁了，还不想休息。看到这样的陈先生，再想起五十年代就已牺牲的郭琇琮、吴思汉、许强、钟浩东等人，就会觉得，他们那一代人真了不起。

我跟陈先生相处，最大的收获，是鲜明地意识到自己身上的小知识分子那种患得患失、怨天尤人的坏习气。有一次，在他面前，我对某件事情大发牢骚，他非常不解地看着我说，这有什么呢？让我很不好意思。应该说，这十年来，我的目标越来越单纯，行动越来越坚定，牢骚越来越少，他的无形的影响是很关键的。我很高兴，为他的回忆录的出版，我有机会稍尽绵薄之力，我也希望，借由这本回忆录可以让人们回想起五十年代为了全中国和全人类的前途而牺牲的那一代台湾精英。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陈明忠回忆录

01 家族与童年

我的家族

我们陈家原来住在高雄阿莲乡。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后不久就病死了，郑经接受陈永华的建议，把一些军队安排到各地屯垦，阿莲乡就是福建姓陈的开发出来的。阿莲陈姓有四个家族，我们属于最小的一支。

我的曾祖父叫陈蛤，因为是农家子弟，名字很土。但他是私塾先生，后来把家搬到五甲尾。我的祖父也读书识字，我家好像是从他开始做生意的。当时冈山各乡的粮食要送往府城（台南）去卖，路上很不安全，常有土匪，我祖父有武功，可以保护。路上的土匪只要一听说五甲尾陈家的车子，就挥手让过去，不收过路费。有一天，一连过了三辆，都喊："五甲尾"，土匪头不相信，亲自过来看看，竟然是我祖父亲自押车，一看，说"是陈英的哥哥啊"，就放过去了。不过，如果土匪来我们家，阿公也会请他们吃饭。

陈英是我阿公的大妹，在五甲尾非常有名，我小时候在外面就常听说："五甲尾的厉害女人，陈仔英、陈仔兰。"我回家就跟着说："土匪陈仔英、陈仔兰。"我爸爸非常生气，骂我："你知道陈仔英是谁吗?是你阿公的大妹；你知道陈仔兰是谁吗?是我姊姊。"看来，我们陈家的女人都很厉害。

我们陈家的武装好像是由陈英带领的。日本人来台湾后，陈英起来反抗，遭到围捕。陈英的人都还留着长辫子，被抓后，日本人将他们的辫子绑在一起，用火烧死。据说陈英拿着一根竹竿，撑着跳过墙头，逃走了。陈英后来死在台北艋胛（万华）。至于我的大姑妈陈兰，她后来离婚，一直在娘家跟我父母住，对我母亲很苛刻。

我祖父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留给父亲五六十甲土地（一甲地约0.97公顷。——编者注)。我祖母叫侯鸳鸯，是绑脚的，显然出身地主家庭。他们侯家的房子是两层楼，五甲尾唯一的两层楼。祖父过世得

早，祖母很会花钱，五六十甲土地，慢慢就剩下三十多甲了。我父亲是长子，上面三个姊姊，下面一个弟弟。

父亲陈万生从小接受日本教育，嘉义农校毕业，可以保送到日本去读书，因为是长子，家里不让他去，就留在台湾当公务员。我父亲是个标准的顺民，从来不反抗日本人。我后来读小学，老师说："你们是台湾人，也是日本人。"我虽然讲闽南话，但也以为自己是日本人，没有怀疑过，因为父亲是顺民，从来没有批评过日本人。

我叔叔叫陈进兴，书也读得很好，是台南高等工业学校（成功大学前身）第一届的学生。他一九三一年入学，读机械，毕业的时候刚好碰到经济危机，日本大萧条，影响到台湾，再加上日本的殖民政策是"工业日本，农业台湾"，他学的一点也用不到，只好先到学校当代课教员，后来和前民进党籍高雄县长余陈月瑛的父亲在高雄市"入船町"开"新和铁工所"，做制糖机器。叔叔有很多左翼书籍，我读中学时开始翻看，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我想，叔叔是因为经济危机而对社会不满，才会买那么多左翼书籍。不过，这好像也是当时的风气，读高等学校的人阅读左翼书籍好像很普遍。

我母亲叫黄不缠，出生在冈山地区海边村庄的一个贫苦农家。不缠，闽南话就是"不要了"的意思，希望下一个是男孩子。父母的婚姻完全门不当、户不对，祖母和大姑妈陈兰强烈反对，但因为我母亲漂亮，父亲坚持要娶，父亲是长子，祖父又不在，她们只好接受了。大姑妈陈兰一直对我妈妈不好，应该跟我妈妈出身有关系。

父亲生性风流，每天和一批人在外面花天酒地，白天根本看不到他，半夜回家就把我从床上抓起来打，因为我很调皮，在学校的操行（修身）老是得丙。他一面打我，一面骂我："操行得丙！"他读书时操行都是甲等。

我最早的记忆，是一两岁时趴在母亲背上，不知道是在外祖父还是外祖母的葬礼上。我看到供桌上的糖果，伸手去拿，妈妈啪的一下，打我的手背。

和父亲在一起的最早记忆，是在北港的四湖乡，父亲在北港郡公所工作。五六岁时，和几个比我大几岁的小孩子在门口玩，打起架，被大

孩子推到池塘里，父亲听到消息跑出来，鞋子也没顾得穿。他跳下水，把我捞上来，回家还打了我一顿，我觉得很委屈。

我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学期是在北港的公学校读的。一个学期后，父亲调职，回到了五甲尾公学校。在北港读书时，父亲给我买双肩背包，五甲尾的同学没有见过，那时乡下小孩子都是用包袱巾包书，打个结就好。我的双肩背包被传来传去地看，上学第一天就弄坏了。我穿着北港买的皮鞋，他们看了也稀罕，乡下孩子，本来都是打赤脚、穿草鞋的。

我就在五甲尾读小学了。

五甲尾分校

五甲尾（现在叫作嘉兴里）虽然小，但在周围的村庄里算是大的了。周围村子的孩子，像潭底、前锋的，都要来五甲尾读小学。课程除了日语、算术，还要学体育。我们就在校园角落的一棵雨豆树下练习相扑（现在这学校叫嘉兴小学，完全变了，只有这棵树我还认得）。冈山地区小学生相扑比赛，我们五甲尾第一名，因为我们五、六年级的学生是十八九岁，其他学校的才十二三岁。大人和小孩子比嘛，当然五比零了。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前后，台湾开始推行“皇民化教育”，偏远乡村，以前殖民政府不管不问，现在小孩都要强迫入学。我们那一级的学生就特别多，有五六十个，之前的年级都是二三十个。许多十几岁才入学的，到了五、六年级就十八九岁了，所以相扑第一名。

文科考试，我们就是全冈山郡（等于现在的区）倒数第一名了。尤其是算数，零分太多了。有个姓张的台湾籍老师，气我们成绩烂，拿竹竿一个个打，得零分的都挨打。他还在班上说：“若有人考上中学，我耳朵割给你们。”后来我考上高雄中学，向他要耳朵。他说：“‘四大恩’的内容是什么？”我说：“天皇、国家、父母、老师的恩啊。”他就一巴掌打过来，说：“你也知道‘四大恩’有老师，还敢要我的耳朵？”我不服，说：“是你讲的啊，考上了你就要给我。”我实在是气他太瞧不起我们了。

我在班里年龄最小，但日语、算数都是第一名，不过，我的“修身课”（操行）却一直是“丙”等，因为我太调皮捣蛋了。

从冈山到阿莲有巴士，一天只有几班，坐的人也不多。普通人都走路，有钱的人才坐车。经营巴士公司的老板姓刘，是冈山的大姓，很有钱。我爸爸和他很熟，吃喝玩乐做坏事他们都是一帮人。乡村土路，车子后面为了挡泥巴，有个橡胶做的挡泥板——那个橡胶，特别适合做弹弓。巴士在五甲尾的起站就在我们学校对面，我趁车子停下时，用刀子去切挡泥板。司机吼着跳下车，我跑进学校，他就去告校长。校长说：“一定是陈明忠干的。”我就被抓着了，罚跪。在校长和老师办公室里，有个房间叫“金库”，是放保险箱、天皇照片、教谕的

地方。我跪在里面，至少好几个钟头，起来脚都麻了。我心里有气，晚上就拿弹弓溜到校长家，打他家的玻璃，“哗啦”一声，校长冲了出来，我赶紧跑！

那姓刘的老板，后来又跟我爸爸说：“你儿子割掉我车子的挡泥板啊。”不过，那个挡泥板做弹弓真的是很好啊！

学校的“皇民化”教育

我读的五甲尾小学是高雄阿公店（后来改为冈山）公学校的分校，校长是日本人。我们乡下小地方，多数老师都是台湾籍代课教员，只有五年级、六年级有日本老师。那时候当小学老师是很有地位的，穿制服，制服上有金色肩章（如果是一个中学，校长的级别是比州长高的）。

老师说：“要记住，你们是台湾人，也是日本人。”小学生啊，深信不疑。老师教过一首诗，据说是日本天皇写的。大意是说：新高山（玉山）下的人民生活很繁荣，听了这个消息朕很高兴。天皇在哪里？在遥远的“内地”，但他惦记着我们台湾人啊，要做忠良的天皇子民。所以，我们要背诵天皇家谱，从第一代到昭和一百二十四代，滚瓜烂熟，到现在也还记得。

小学五、六年级时，据说是日本开国两千六百年，各学校都要比赛写大字（书法），叫作“健康报国”，我还得了三等奖。还有绘画比赛，我的画和学校一个老师的，一同被送去高雄州参加展览，结果我的入选了，老师的没入选。他很没面子。画的什么，总不过是台湾风景吧。或许我真的有艺术天分，“失去栽培”也说不定。

当时日本的教育体系大概也是学欧洲的，强调“教养”，书法、音乐、体育全面教育。但台湾孩童和日本孩童就读的学校是不一样的，日本小学生就读“小学校”，台湾小学生就读“公学校”。学校建筑、师资、设备差异都大，用的课本也不一样。小学考中学，依据的是日本人“小学校”的教材，我是后来上了中学才知道。除了“内台（日本和台湾）差异”，还有城乡差异。我们在五甲尾上音乐课，只有一台风琴，只有一个老师会用，其他老师教唱歌就是嘴巴教而已。四年级时，我被学校选去参加冈山郡的唱歌比赛，抽签抽到第一个，一上台，音乐一响，吓了一跳。因为用的是钢琴，我从没听过钢琴的声音，那么大声！结果第一句就唱错了，没得奖。那歌也是歌颂日本军国的：“我们能在夜晚团聚吃饭，都是因为皇军保卫；我们能够幸福读书，都是因为皇军保卫。”

高年级的学生，要去拜神社。一个月一次，走半个多小时去冈山神社，冲一个小木屋拜，也不打开。我很好奇，里面到底是什么呢？有一次拜过后，晚上，我和一个同学跑回去，偷偷进了神社，打开木屋，里面只有一张纸，写着“天照大神”。我大失所望，这算什么嘛！我们村子的妈祖庙里都是有神像的。走五公里，就来拜这个，我觉得不高兴，就冲着那张纸撒了一泡尿。我那个同学，他是五甲尾孙家的，也是大姓，吓坏了。说：“你小鸡鸡会烂掉哦！”

我们村子里的妈祖庙已经被禁了，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连庙也没有了，要家家供奉天皇的“神龛”，就是这样一张纸。虽然是战争年代，开始物资管制，但我们家是地主，爸爸又经营工厂，衣食不会匮乏。

我喜欢去家里的牧场，因为有刚挤出来的牛奶喝。那牛奶有种甘味，灭菌过后，甘味就没有了。有次我把十几个同学带去牧场，给他们喝牛奶，好多人都吐了，原来他们觉得有腥味，不习惯，我从小喝，没有感觉。我妹妹说，我少年时很会吃，很知道美味，后来干革命，坐牢，吃什么、喝什么，冷的热的都不在意了。

总之，小学时候就是好玩，无忧无虑。那时候的理想是做个军官，像日本军官那样，穿着神气的制服，骑着高大的白马。我受的是“皇民化教育”啊，对自己是“日本人”这点，没有过怀疑。偶尔会有点迷惑，那是来自课外书。妈妈挂在墙上的衣服口袋里放着钱，我要用自己拿。我就去冈山的书店，买小孩子看的《少年俱乐部》，还有一些讲日本历史的书。有一本书里讲天皇的故事，好多都一百多岁，还有个大臣，叫武内的，后来日本的钞票上还印他的像，活了两三百岁。我很惊奇，想，以前大概空气比较好，所以长命吧。可是不对，不是说古时的医学不发达吗？怎么能活这么久。后来又看到日本第一个女天皇，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候封的，那日本的历史怎么能有两千六百年呢？而且这和教科书讲的不一样。教科书里的第一个神武天皇不是中国封的。

有一年天长节，就是昭和天皇的生日，要“举国庆祝”。我们在操场集合排队，校长从我跪过的那个金库里搬出来天皇的“教育敕语”，全体肃静。他就开口念了“朕想–个二年级的女孩子放了个屁。本来很静，听起来特别真切，又是“朕想”之时，大家都哄笑起来。教务主任冲下台，抓住那个女孩子的头发就扔了出去，牙齿都摔断了。我们看着，

只觉得恐怖。村里人是吃番薯签的，本来屁多，她只是时机不对罢了。

教务主任是台湾人，也许越是台湾人，越要显示忠诚吧。现在想，这个屁，倒真是对“朕想”的“一视同仁”的嘲讽。

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皇民化教育”大力推进，但实际情况如何？李登辉常讲日据时代“皇民化教育”如何如何，台湾人的日语如何如何，“皇民思想”多深，那是胡说八道，他是把自己极特殊的“皇民经验”，强加给台湾人。

我六年级时，来了一位日本老师，叫栉渊。有个同学上课迟到，向他报告说：“我家猪的妈妈发神经了，我去找猪的哥哥来给它打，所以迟到了。”我们都明白，他是把闽南语直译成日语，原意就是家里母猪发情了，要去牵猪哥来交配。这日本老师听得目瞪口呆，让他再讲一遍，还是没明白，无奈地摇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来到了什么地方！”

我们乡下小学，一直到四年级都是台湾籍的代课教员，大多不是正式师范毕业，教课也不大认真，甚至日文水平也不高。我虽然不大会讲，但因为看课外书多，常发现老师讲得不对。有次老师处罚我们全班绕操场跑一圈，他却把主词和受词弄反了，听起来变成是叫我们“把操场转过来”。

“皇民化”时期的村庄

我们村子有个妈祖庙，庙口有空地。夏天，日头落山了，村里的人就到庙口乘凉、聊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庙禁了。村里组织壮丁团、青年团，还要训练。壮丁团的人年纪大点儿，多不懂日语。训练时，左右的口令没办法做，喊左右，就左手左脚或右手右脚，手脚一起出去了。因为台湾话（闽南语）里没有单独的左右概念，要讲“左脚右脚”“左手右手”。没办法，后来就用“碗筷”“碗筷”代替“左右”喊口令，因为吃饭都是左手拿碗，右手拿筷嘛。又比如，“向后转”喊成“东边转向西边”，因为学校的主席台都朝向太阳，向后转，就是“东边转向西边”。

推行日语的运动也加强了，老年人也得学，给他们在村子里办夜校。过了一段时间，总督府机关就来拍纪录片，要宣传“日语推行运动”，之前就指定好什么人回答什么问题。晚上，我下课回来，见院子里灯光大亮，有一部摄影机，两三个记者。老师指着一个老农脑袋：“阔累挖那恩叠斯嘎？（这是什么？）”那个老农本应回答：“阔累挖阿达马叠斯（这是头）。”之前反复练习过了的，结果，摄影机对着他一晃，他就慌了，说：“阔累挖三恩达马叠斯（这是睾丸）。”头变成了睾丸，人们都哄笑起来，那个日本女记者，笑得腰都弯了，蹲到地上去。我自己所经历的乡下的日语水平和“皇民化教育”状况，就是这样，跟李登辉的经验真是天地之差，我想李登辉应该是很特殊的台湾人吧！

战争末期日本对台湾农民的压榨

现在很多人一直在讲，“皇民化”对台湾影响有多大，我前面就是以我的经验来说明，他们根本是胡说八道。他们还喜欢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我就来谈谈我小时候（主要是中学时代）日本人如何压榨台湾农民。

战争时期，总督府开始强制农民大量种甘蔗。

台湾有句谚语，第一憨，种甘蔗给会社磅。（第二憨抽烟吹气，第三憨撞球相碰。）当时最苦是蔗农，因为政府和制糖会社联合，不但控制农民种甘蔗，还用“区域采收制度”，甘蔗不能自由买卖，只能卖给指定的制糖会社，价格也由他们定，磅秤也有问题。当时流传“三个村长五十斤”的笑话——农民去抗议的时候，三个村长一起站到磅秤上，结果总共才五十斤，你看日本会社多会偷斤两。

战争时期，总督府直接用强制手段，要台湾农民种甘蔗，还有一个原因：甘蔗产出糖蜜，发酵后，可以做酒精，供给生产军事用的燃料。

我们五甲尾的农地，主要是种稻的。近冈山的地方水多，种水稻，一年两期。接近阿莲的地方；地势高，旱田比较多，也叫看天田——台湾雨水多，看天啦。旱稻一年一期，有的旱田也种番薯。水利设施到不了的地方，才种甘蔗和番薯。

农地是这样的：下面厚厚一层是黏土层，水渗透不下去，上面是表土，每年要翻耕，表土如果没有了，就不能种了。黏土如果破坏了，水往下渗透，也不能种稻子，但可以种甘蔗，因为甘蔗是深耕的，可以靠地下水。

现在强迫种甘蔗，农民不愿意种，政府就用拖拉机来翻掉修水利是为了糖业资源，铁路道路建设是为了森林资源。）

戴国辉就认为，殖民统治是普天之下最坏的制度，完全没有好处。在社会制度上，殖民者压迫被殖民者；在经济制度上，殖民者压榨被殖民者；在人际关系上，殖民者歧视被殖民者，可说一无是处。他比喻说，日本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养了一头乳牛，这头乳牛就是台湾，目

的就是为了榨取它。这头乳牛长大了，日本人拼命挤它的奶。但是日本人战败了，被赶回日本，他们却无法把这头乳牛（台湾）一起带回去。这乳牛吃的是台湾土地上长出来的肥美的青草，它吃的是我们自己的草，才能继续成长，它吃的不是日本的草，难道我们应该感谢日本人以前拼命挤它的奶吗？难道我们应该把日本人看作我们的阿公、阿嬷吗?

归根究底，台湾本身原来就有很好的条件，也有人才，在刘铭传时代按照洋务运动的办法，引进了不少欧美先进设备；日本人利用了这些基础，展开了血腥的殖民统治，以统治者的姿态压榨我们，伤害了我们。这么坏的殖民制度，我们痛恨都还来不及，那些感谢日本殖民统治的人，我实在无法理解他们的心理。

除了强迫种甘蔗，一九三九年日本人还公布粮食配给统制，农民生产的粮食都要上缴，再统一配给。这样，农民就把粮食藏在干草堆下面，警察要来抓，查起来也很吃力。据说台中彰化有个日本警察，上面派他去查米，中午到村子里，发现农民吃的都是番薯签，真的没有米吃，他同情农民的贫困。后来被征兵去当炮兵，他说，他不愿意打中国人，自杀了。光复后，那个地方的人把他当神来拜。

本来，台湾的土地就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里，佃农与地主分成，多数是地主六分、佃农四分，有些高的地方，是七三分，土地贫瘠的地方才会五五分。基本上，农民租佃负担很重，虽然种水稻，他们却吃不到白米，只能把米卖掉，以换得生活所需，买番薯和番薯签来吃。所以，太平洋战争末期，农民生活受了几重剥削，非常苦。因为战争，肥料也没有了，产量很少。

我在地主家庭长大，小时候完全不知道这些。那时上学带便当，我家里是白米饭，同学多数都是番薯签，就是番薯弄成丝，晒干，不甜，不好吃，只是有淀粉质罢了。平常收成的时候，他们吃鲜番薯，我就拿白米饭跟同学换。他们以为我傻瓜，我也以为他们傻瓜，番薯新鲜的时候是很好吃的啊。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番薯成了台湾乡土的象征，台湾人开始自称“番薯仔”。其实台湾的番薯原来产得很少，因为土地肥沃，除了少数山坡红土地区种番薯，台湾多数是种稻米的。番薯怎么来的？早

期台湾的稻米输出到华南，回头的船就从闽南运番薯来压舱，所以番薯的集散市场在艋（万华），那里有个番薯市场。番薯在那里卸下来，集中晒干，再卖到岛内各地。我觉得好像是到战争末期，白米被集中分配，台湾人很难吃到白米，就大量吃番薯签。光复后，虽然实行土地改革，但农民不但要缴水利费，还要以稻谷换肥料，分到的土地还要每年摊还地价，农民很节俭，舍不得吃白米，有很长一段时间，还继续吃番薯签（六十年代初期还在吃）。

地主和农民，对日据时代的记忆也是不一样的，这是阶级差别，普通农民受压迫最重。我父亲是地主，学的是农业，又做公务员，战争来了就利用公务员身份办厂，生产榻榻米卖给日本人，牧场牛奶也供应给日本空军，所以他当然觉得日本人好。一九四〇年要求"改姓名"。台湾人"皇民化"有两个层次，"皇民化家庭"和"日语家庭"。物资配给时，日本家庭第一等，再来是"皇民化家庭"和"日语家庭"，有些人因为这个原因才改名字。公务员和地方乡绅被要求做表率，公务员不改的话职务就保不住了。我爸爸改了，给我也改，叫朝仓忠雄，爸爸改了什么，我就不记得了。

日据时期的一九三〇年代，战争时期，以及光复初期，农民生活都很苦，不少出身地主家庭的高校学生信仰社会主义，就是因为看到农民的生活非常苦，他们希望改善农民的生活。五十年代白色恐怖，这些人都被肃清掉了（郭琇琮、钟浩东等人都是地主家庭出身）。国民党就是在这种压力下才实行土地改革的。这些过去的事情大家都不记得了，就只会歪曲历史，实在很不应该。

02 从高雄中学到学生兵

从乡下考进优等中学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发生的那年，我进入高雄中学读书。

高雄中学建于一九二二年，本来是给日本人子弟读的，当时颁布的“台湾教育令”说要“日台共学”，所以也有很少量的台湾学生。当时台湾人能读中学的，一般家境比较好，因为读中学，将来就要考大学。将来不能考大学的，会去读职业学校，比如农业学校、商业学校。有五年制的，叫甲种职业学校，三年制的叫乙种职业学校。读职业学校学费较低，因此，没有钱的不会读中学。

当时南部有台南二中（光复后改名一中；当时叫“一中”的，是给日本人子弟读的，光复后改名二中），一般南部台湾学生都去考台南二中。高雄中学主要给日本人子弟读的，很难考，冈山公学校每年也只考上一个两个，从五甲尾考进高雄中学的，我是头一个。我是因为除了高雄中学，根本不知道还有别的中学可以考。

高雄中学是高雄县最好的中学，设备非常好，教学楼是欧式的红砖建筑，有个雨天体育场，有遮盖，还有武德殿和音乐教室。后面有宿舍，有些屏东和外地的学生就住校。

我进了中学才知道，中学入学考试，依据的是日本人的“小学校”的教材，不是我们“公学校”的教材；也才知道很多人都要补习，才能考进中学，大的“公学校”也是要补习的。我们在乡下什么都不知道。

我在小学成绩一直是第一名，家里是地主，年龄又最小，别人都顺着我，天之骄子一样，到这边就完全不一样了。

记得，有次读一个词dorobou（小偷），我发音总发不好，老是说成rorobou。老师说，高雄中学，日语最差的就是陈明忠了，这对我刺激很大。我小学喜欢读课外书，常常买日语的《少年俱乐部》，阅读是没问题，发音就不行。

还有城乡差别，从乡下考进高雄中学的很少啊。入学考试考体育的时候，有个项目是跳箱，我是头一次看到，根本不知道怎么跳，别人砰的一声跳过去，我是跑过去坐在上面，大家都笑坏了。单杠，我直到毕业也没学会。音乐我也很头痛，音乐课有钢琴，多数同学会读五线谱，我不会。

突然发现我是“清国奴”

我小学的时候，虽然对天皇都活一百多岁这件事怀疑过，不过整个说起来，接受的是“皇民化教育”，以为自己是日本人。但是上了高雄中学，我的脑子开始乱了。这里对我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高雄中学每个年级四个班，每个班五十个学生，大约四十个是日本学生，十个台湾学生。高年级的学生可以打下一年级的，理由随便找，比如“态度不好”，没有礼貌，就可以打。日本学生随便欺侮台湾学生。我个性烈，常和他们抬杠、打架，他们骂我“清国奴”。这对我冲击很大，我不能理解，以前老师不是说，台湾人也是日本人啊！不是“一视同仁”吗？进高雄中学怎么就变成“清国奴”了？为什么我常常挨打？被打了，我不服气，他们就再打。所以被打得很厉害。

小学生对老师的话都是信的，以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日本人，中国就是外国。父亲更是完全听日本人话的顺民（我后来对爸爸说：“你政治上是白痴，日据时代觉得日本人对，光复后觉得国民党对。”）；妈妈没有念过书，对我也没什么影响。所以高雄中学一年级时候，我的世界颠倒了，脑子混乱，也没人教我，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我曾经跟我爸爸说，可不可以转校去台南二中？但爸爸不相信我会被日本学生欺负。他读书时在嘉义农校，大多是台湾学生，日本学生很少，成绩又都是坏的，而他都是第一名，当然不会被欺负。所以高雄中学的糟糕情况反而让我醒过来，如果我去台南二中，可能就不一样了。

关键事件是和一个日本学生打架，我们在休息时间打，我打赢了。结果第三节下课时，老师一离开，前面的人把前门关起来，后面的人把后门关起来，十几个日本学生打我一个，打得我眼睛都张不开。打完了，一个日本学生说：“你可以和内地人打架，但不可以打赢。”我终于明白了：“原来我不是日本人。同样是人，但台湾人和日本人是不一样的。”“清国奴”这个词，光复后，在民间很长时间还是骂人的话。现在“台独”派骂外省人，也骂“清国奴”，真是讽刺。

钟浩东与岸本

从六岁到十六岁，我的青少年期一直生活在乡下和战时体制下，台湾反日的思想和行动完全被封锁，所以，我一直不知道台湾曾经有过包括民族派和左派在内的反日活动。只有一次，早上升旗后教务主任（当时的称呼是教头）大骂本岛人（台湾人）说："高雄中学的内地人（日本人）毕业生，很多人在内地当高官，但有两个本岛人却去支那做共产党，从事反日活动……"

我很好奇，打听之下才知道教头骂的是钟和鸣（光复后改名为钟浩东，他和几个朋友到大陆参加抗战，一九五〇年被国民党判死刑）和萧道应两位学长。这是我头一次听到"共产党"的称呼。

在同学里，第一个刺激我的是岸本，他的中文名叫宋朝明。

高雄中学的楼是两栋日式的欧洲红砖楼，第一栋的一楼是行政办公室、校长室、老师办公室；二楼是五年级和一部分四年级教室。第二栋楼，是三、四年级教室。两栋楼之间，有铺着木板的地方，可以坐下来休息。不住校的台湾学生，每天在这里等火车，有时中午大家也在这里休息。日本同学不会进来，这是被台湾同学占领的，成了一个聊天的地方。我在这里认识了宋朝明。他是高雄人，不需要等车，但他常来。他会一直骂日本人，讲日本人多坏。我很吃惊，很多话我从来没有听过。他这么年轻，怎么会有这么激烈的反日思想？直到第一次坐牢之后才知道，他是受两个舅舅蔡瑞钦、蔡瑞洋的影响。他舅舅日据时代抗日，后来两个人都加入了共产党，我坐牢时，曾经有十几天和他被判死刑的大舅舅蔡瑞钦同一间牢房。

总之，那个等车的地方，对我意义很大。台湾人里"三脚的狗仔"（指"皇民化"的人）不会来这里。其实多数台湾同学对日本人不满，只是不敢讲而已。

有个台湾学生和日本学生起争执，日本学生拿刀威胁要杀他，他跑掉了，打电话给学校，处理结果是台湾学生被开除了。他爸爸是律师，就去告学校，报纸上登出来。那时台湾人能做律师的很少，学校因为

这个事情闹大了，就介绍他到小学校当代课教员。高雄中学就是这样的学校。

当时的学制中学不分初、高中，是五年一贯制。中学考大学，要先进高等学校或大学预科，高等学校和大学预科毕业就可以上大学本科。读高等学校的，是什么大学都可以考。预科和高等学校，我记得要念三年，我们快毕业时，因为战争的缘故，改成两年。中学毕业后，我考上的是“台中农业专门学校”，而不是大学预科或高等学校，光复后这些专科学校升级为“学院”，于是我就成了“大学生”。

那时，高雄中学好多学生考台南高等工业学校（后来改名为“台南工业专门学校”，光复后再改名为“台南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成功大学）。考上的差不多都是日本人，台湾人很少。有一年，换了个校长，他刚从日本来，对台湾的政策搞不清楚，他按照成绩发表考试情况，报纸上刊登了名单，问题大了：考上的大都是台湾人，日本人很少。因为之前日本人根本是优待进去的。结果呢，这个录取名单被取消了，发表了也不算，重新发表，这次日本人就多了。

报纸已经刊登名单，入学了，还能取消！那时中学的校长，比州知事的地位还高。谁敢抗议？抗议也没用。（关于这一段，我的记忆似乎有错误。因为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国时报》有一篇台湾大学名誉教授刘广定发表的《日本殖民统治与日据》文章，其中说：“近读《成大六十年》一书，内有原‘台南工业专门学校’一九四四年入学学生陈祖旬先生所记当年入学考试台湾人受歧视之事，深深表达了‘殖民地人’的感受。他说：‘……入学考试当年采用不记名只记号码，我们机械系要录取两班八十名，应考生一千二百名……经笔试录取一百名，理应参加第二次口试；但因无记名关系，一百人中台湾人即占八十名，日本人二十名，发生变相结果；为此校长无法下台，延期口试，再增录取一百名［日人八十名、台湾人二十名］合计二百名；经二次口试正式录取八十名［日本人八十六名、台湾人十四名］作为收场……真是作为殖民地人升学之悲哀事件。初次录取的八十名台湾学生只正式录取十四名；但日本学生却自二十名反增加录取为八十六名！真是欺压殖民地人。”［按：数字加总有误，疑为报道误植。］）日据时代的差别待遇就是如此。李登辉他们讲日据时代多好多好，没那么回事。

读书与初步觉悟

我出生于一九二九年，日本一九二〇年代末就在肃清左翼和共产党，台湾的左派、台共都抓得差不多了，到我出生后几年，我家乡已经没什么人参加共产党或者农民组合。我读中学时，左派的书也被禁光了，但我叔叔有。学机械的叔叔找不到工作，很不满，偷买了很多日本的左翼书籍。我在高雄中学，对学校越来越没兴趣，课外运动也常常溜掉，回到家里找书看。

在家里阁楼的仓库里，找到那些有关政治、思想的书。其中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被删除的部分很多，重要的段落和术语都以×××代替，以我当时的思想程度完全无法把前后文连贯起来，所以虽然对社会主义思想感到好奇，但并不了解。

有次看到周佛海的小册子《三民主义》（周佛海著、犬养健编译的《三民主义解说》），他早年是共产党，后来加入国民党，又是汪精卫手下的大将。但他的小册子讲了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我那时十四五岁，对民权主义、民生主义都看不大懂，有关民族主义的部分看懂了，很感动，我才知道，原来我是中国人。在学校为什么受欺侮，我终于开始懂了，就继续找来更多左派的书籍，拼命看。其中阶级压迫的概念冲击了我，让我重新去看待人和人的关系。

那时我瞧不起“皇民化”的台湾人，觉得他们一点骨气都没有。当时我们私下骂日本人是四只脚的狗，“皇民化”台湾人既不是狗，也不是人，所以叫他们是“三脚仔”，像奴才一样，很讨厌。后来我发现，我家佃农对我的态度，也是这么恭顺。我放学回家，佃农看到我都会连忙说：“阿忠啊，你回来了！”我是小孩子，他是大人啊，对我却得用这样巴结的口气。我突然体会到，我家佃农对我的态度，和“三脚仔”对日本人的态度没什么不同！换个立场看，在佃农的眼里，父亲和我不就等同于日本人吗！搞了半天，我憎恨压迫和歧视，却不自觉地干了十多年，原来我从小就扮演了压迫者和歧视者的角色。无论是来自民族或阶级，被压迫者、被歧视者的苦楚都是相同的。

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家的佃农看到我都是毕恭毕敬的，很卑下的样子，我从来不以为怪。因为农业社会，佃农耕种的土地一旦被地主收

回，就没办法生活，所以对地主绝对地服从，对地主的子女也才会这样巴结。

这时我开始意识到，在学校，我受日本人欺侮，当一个台湾人，一点尊严都没有，动不动被打，政治上给人欺负，这是民族压迫。但作为一个地主的儿子，经济上我欺负别人，这是阶级压迫。我知道被欺负的痛苦，讨厌给人欺负，所以也开始觉悟到自己也不应该欺负人，甚至，世界上根本不应该有压迫存在。我的社会主义意识，就这样很素朴地产生了。

当时我还看了日本的《三代实录》，书中收录日本明治、大正及昭和时代的许多政治历史事件，没有特别立场，只是报道。书中被捕的日本共产党在法庭上的陈述让我很震撼，其中有个医生加入共产党，被问到为什么？他说，他家是大地主，他妈妈患了严重的气喘病，他从小立志做医生救病人。一天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工，一看就知道染上了肺结核。他告诉女工，肺病是初期的，只要多休息多吃有营养的食物，就会好。两年后，女工又来看病，却恶化为末期，没救了。医生骂她为什么不听话。女工哭着说，她爸爸早就过世，妈妈长期生病，家里还有两个幼小的弟弟，她只能工作多久算多久，好让弟弟长大，哪有时间休息！这位医生说以他的经济条件，就算可以救女工一家人，仍无法救全国同样需要帮助的家庭，所以他加入共产党。他讲这些话时，整个法庭寂静无声。法官说，他能理解这样的心情，但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呢？医生反问，现在有哪一个政党提出解决这种社会问题的纲领呢？因此他认为，参加共产党是唯一的选择。

学校、家庭中的经验和书里的思想慢慢结合了，我因此也觉得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走上共产主义之路是应该的。

我还看过，有一些日本地主阶级的共产党员，把土地分给农民。看了之后很激动。其中一位日本共产党，把自己一千多甲的土地分给佃农（一千甲地约相当于一万四千五百四十五亩。——编者注）。日本投降后，他选举每次都当选。台湾曾经放映日本电视连续剧《阿信》，里面有个老左派，一辈子搞土地问题，为此坐牢，脚都被人打断，但土地问题仍没解决。结果美国占领日本，强迫土地改革。他很挫折的是：一辈子搞革命没解决的农地问题，占领者一下子就解决了。我也有此感想，台湾是国民党来了以后才强迫大地主把土地分给佃农的。

除了这些左派书籍，我那时也看了很多文学书。我们十四保（保，日据时代的邻里单位）姓孙的，在村里捐了一个图书馆，里面很多文学书。在那里我看到日本白桦派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有岛武郎的作品，但那时左派的文章在杂志上已经看不到了。后来我读到托尔斯泰的《复活》，觉得和白桦派不一样，里面有“思想”。我第一次出狱后看到陈映真的小说，也有同样的感觉。我之前也看过白先勇的《台北人》，文字很漂亮，陈映真的文字没有白先勇那么漂亮，但他有“思想”。

我读到的日本文学里，也有反战的作品。记得有个场景，主角引用与谢野晶子的诗，大意是：“你爸爸妈妈把你养大，不是让你去杀人的，你新婚的太太在哭啊，为了他们，不要去死。”那是日俄战争时的反战诗歌，我看了很感动。

感谢高雄中学

很多年以后，我看到高雄中学高我四届（第十六届）的校友宇敷民夫的文章《消失在黑暗中的时代史》，他说：“高雄中学是充满爱国主义和皇道主义思想的学校，所以内地人学生以能够考上陆海军军官学校为荣。驻校军事教官，武道、体育的老师给予学生的是极为野蛮的教育——高班生不需任何理由可以随时殴打低班生，内地人更可随时随意殴打本岛人……”他又说：“在这种人种差别中我看到了现在日本人骄傲的原点。”总之，高雄中学的生活是野蛮、不愉快、恐怖的生活。

我就是在这一所充满野蛮、歧视台湾人的高雄中学念书时，才意识到自己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才进一步读了左派的书，有了初步的社会主义意识。所以尽管四年的高雄中学给我的是非常不愉快的记忆，但也感谢它没让我变成“三脚仔”。如果说，“二二八”事件改变了我的一生，那只是表面的。应该说，是高雄中学的生活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思想，这才是改变了我一生的根本原因。

爱国便当

我读高雄中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当时的学制为五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越来越吃紧，生活物资实施配给制。米粮、猪肉什么的不让自有，都要收走，然后，按等级配给——当时把家庭分成几等，日本家庭第一等，“皇民化家庭”和“日语家庭”第二等，然后是一般家庭。

当时有一种“爱国便当”，大概是学校规定的，用咸梅干配饭，梅干一颗，或两三颗放在一起，摆在便当的中间，看起来像日本国旗一样，叫“日刀丸便当”（日之丸便当）。

一颗梅干怎么够？我在下面偷偷放猪肉，但不敢放太多。我家是地主，吃饭没有问题，但在学校里不能显露出来。不住校的学生都要带便当，中午一起吃。不知道别的学校是不是也这样规定。那时市面上确实没有什么东西，我们乡下，还可以买得到猪，偷偷摸摸杀，被警察抓到会打。有养猪的，警察会来查，老百姓会藏。

我爸爸本来在冈山区公所，后来日本政府要求成立农会，叫作“农事实行组合”，用来控制农民，爸爸就到农会工作。大概从一九三〇年代以后，办了牧场和榻榻米工厂，生产牛奶和草席，都是供应日本人和军队的。台湾人以前不喝牛奶，牧场养奶牛，要请专门的师傅来，我爸爸请了东港一个台湾师傅。榻榻米工厂怎么经营我不知道，只记得机器都是木头做的，要人操作，还没有铁制机械，好多女工在那里做事情。

军事训练

因为战争，高雄中学的体育和军事训练占的比重很高。每周一、三、五都有军事课，一次两小时。还有课外的体育活动，我参加“陆上部”（田径队），跑一万米，后来三年级我就不参加了。不参加也不行，还挨打。我要离开陆上部的时候，队长就打我。他叫庄顺安，后来考大学没有考上，参加了志愿兵，当时在报名的人中，他是全台湾第一名，成了台籍日本兵，为天皇效命。

三年级就让我们拿枪训练了。当时“体力检定”，我都是中高级，但手榴弹不行，不会丢，一丢手榴弹，手好像就脱臼，一点办法都没有。成绩就变成“级外”，而且是最低的丙等（合格的成绩分为初、中、高三级，不合格为级外，再分甲、乙、丙三等）。四、五年级要去白河的训练所，进行一两个礼拜的军事训练，大家住在一起。有个高我一两年级的同学，军训时得肺炎死掉了，据说死前还喊着口号：“进攻，进攻啊！”报纸把他登出来，还做成小册子来宣传，学校觉得很光荣。高雄要塞司令部的司令官新妻少将来学校演讲，说：“我早就知道高雄中学学生是非常优秀的！”

就是这样的教育，我差点死在他们手里。我四年级军训的时候，有次做登陆演习，是学校和日本工兵队联合演习，船是工兵队带来的。登陆的时候，我上的那只船开始漏水，船上的小队长说：枪是天皇的，不能让它落水，让我们把枪举起来。那时候全身武装啊，能不能游泳都是问题，还让我举枪。我就大声向隔壁喊：“船！船！船！”小队长就一直打我，说我没有日本精神。我心想，开玩笑，死在这里划不来，如果这么死了，就是给他们多一个宣传品。当时船上十几个人，其他人都不讲话。小队长会游泳，我只会狗爬式，而且要赤膊才会啊，穿军装，绑腿，怎么游泳。我不想死，不想做军国主义的宣传品，因此整个训练期间，被打得半死。

那时，鼓励高年级的学生考“干部候补生”，考上甲级，将来可以当军官；乙级，可以当士官。我之前无意中看到过学校的鉴定，我被鉴定适合于当“兵”。

四年级上军训课时，学校配有两三个军队的教官。有一次，一个上尉教官刚刚从大陆回来，休息的时候谈天，他说：“世界上最强的是日本，第二强的是支那。”我们听了很吃惊，当时报纸上的宣传都说中国不堪一击。他说：“你们不知道，我们怎么攻都攻不下来，后来用催泪弹，才冲进去杀掉他们。”

飞行员的神气

战争的缘故，原本五年毕业的中学制度，改成四年毕业，也就是五年级和四年级一起毕业。但毕业生不管是否考上高等学校，都被送去做“学生兵”。一九四五年一月，我考上了台中农林专门学校（台中中兴大学前身），二月就到高雄寿山的“独立混成三〇联队”报到了，我刚刚十六岁。

连毕业典礼都没有，也是因为战时紧急状态。高雄中学那年当兵的，日本学生很少。现在想，是因为日本学生比台湾学生有更多渠道去念各种军校。日本学生的第一志愿，一般是考海军兵学校，再就是陆军士官学校，出来是做军官，但很不好考。成绩不好的学生就去考飞行预科练习生（简称“预科练”），这是战争末期才有的，是为了自杀式的特攻队培训飞行员的。第一期“预科练”学生上战场，差不多都死掉了。

当时报纸整天都在宣传“神风特攻队”，就是以自杀的方式攻击美国海军。当空军，就是送死。但反正必须当兵，总归是死，飞行员待遇好，普通陆军士兵是连吃饭都成问题的。飞行员就算死也死得漂亮些，所以很多日本学生报考。

光复后，有次跟高雄中学的日本同学聚会，他们之中不少人都是四年级时上了“预科练”，但那时日本快要战败，飞机都没有了，上不了战场。这些人本来百分之八十要死的，倒活下来了。

那时，飞行预科练习生的制服，扣子有七个（普通军服是五个扣子），衣服扣子上，还有樱花的图案。他们的《飞行员之歌》，歌词就是“身穿七个纽扣，预科练是皇国的飞行员……大和魂所向无敌”。有次，“预科练”的学生从高雄火车站走过，穿着神气的制服，排着整齐的行列，唱着歌，很威风。有些女学生在路边，一边看一边“喔喔”赞叹，很欣赏的样子。我们高雄中学的学长很嫉妒，气呼呼地冲她们挥手：“走走，看什么看！”她们都不知道，飞行员穿得这么漂亮，这么神气，因为他们是要送死啊。

独立混成三〇联队

一九四五年二月，我到高雄寿山报到。那时高雄要塞司令部的司令官是新妻少将，就是曾经到我们学校去训话，表彰我们那个死前还喊着“前进”的学生的那个人。我去的是杂牌队，叫独立混成三〇联队。因为那时连船也不够用了，也因为要准备美军登陆台湾才没有被派到海外战场。

在部队主要是做工，挖战壕，挖洞。有个高雄兵从别的部队转过来，消息灵通，跟我说，美国要登陆了，要塞的炮以前是向外海的，现在要掉转头，要打市内战。所以我们才每天修工事，就是散兵坑，是为了躲在里面打仗的。至于挖洞，我们也不是工兵，也不懂测量，就凭感觉挖。记得我们分两队从两个方向，按设定的角度挖，最后会合打通。我们这边，挖着挖着，听到另一边有声音，敲敲，那边也咚咚地回敲了。原来两队也不知是谁挖的角度偏了，两边错开，接不起来了。

那时主要就挖工事，训练比较少。但原来在学校一直是有军训的，基本的训练都有了，也会打枪，扔手榴弹。战争进行了那么多年，日本国力和兵力都已经衰弱，人心也浮动。我们是杂牌军，部队的条件更差，除了连长和军官有宿舍，我们连兵舍都没有，就自己砍树造房。饭是有，菜就稀罕，有时一个人就一根空心菜，也不切断，就那么一根放在碗里。

肚子饿，就想办法，什么都敢吃了。山上蜥蜴多，捉了剥皮，烤着吃。蜗牛也多，但开始不知道蜗牛的前半段有黏液，是不可以吃的，吃了拉肚子。后来才知道用木屑灰把有黏液的部分去掉，吃它用来爬的、肌肉多的部分。还有昭和草，就是一种可以吃的野菜。

高雄神社也在寿山上，记得一年级时每月去拜神社一次。山上猴子很多，猴子很聪明，看见小孩子就围过来，跟我们要吃的，看见大人就跑掉。我们到寿山当兵时，已经看不到猴子了，都被部队捉来吃掉了。

不久我就又开始挨打了。那时连长有报纸看，他看完丢掉，我们就捡起来看。有次看到报道说，日本的一架战斗机被美国打下来了，飞行员跳伞，伞没有打开，摔死了。一个女学生看见飞行员快要落地时，合掌朝皇宫的方向拜，就说皇军真是忠诚。我说："这是胡说八道嘛。"第一，飞行员是转着圈掉下来，他怎么辨别东南西北？第二，那女学生，也不是掉在她面前，怎么知道他合掌拜？那时我才十六岁，本来就对日本人不满，当兵，吃得又坏，从小到大没饿过肚子，现在肚子里没吃的，只有怒气，就敢讲。结果被打了小报告，挨了顿恶打，因为我"侮辱英灵"。

第二次挨打更凶。每天有个训练内容，是预备美国坦克车M4登陆时，对抗作战，就是在路旁挖个洞，人躲在里面，坦克车来的时候，就举着一个前端挑着炸药包的竹竿冲出来，刺向坦克车，然后卧倒。每天就训练这个扔炸药包然后卧倒的动作。我想，炸药包一扔，一爆炸，一个竹竿的距离，人一定跑不掉，早死掉了，卧倒是多余的嘛！这是训练自杀队嘛！这个话，又被听到了。这次被打得半死，因为"影响士气"，性质更恶劣。

我想，这样下去，不用死在战场上，在这里先被打死了，就决定逃。结果才跑到高雄市内，就被宪兵抓到（后来我才知道出去要戴袖章、外出证，不然一看就知道是逃兵）。本来应该军法审判，但结果是私下处理，关禁闭，一个半月。连长怕给上面知道，影响他的成绩，他日子也不好过。

之前他有教训。有次，我们独立混成三〇联队的队长（等于团长）于保大佐，远远走过去，离我二百米，我以为他没看到我，就没敬礼。谁知他眼睛很厉害，就叫我过去，问："哪个连队的，为什么不敬礼？"我说："我以为你没看到。"他打电话把我们连长骂了一通，连长就打我一顿。我决定报复。再次看到于保大佐，还是不敬礼，连长又挨了大佐的训。连长看着我说："你故意啊！"但不敢打我了。所以我逃亡被抓回来，他没有上报，就关禁闭。

关禁闭时，连菜也不给吃了，就一个饭团，蘸着盐水吞下去。我对厨房送饭的人说："你饭团里面要给我包菜喔！否则我出来打你。"我让他包军官的菜，和士兵的不一样的。厨房的人也怕我这种人，乖乖地包了菜。

有天觉得身上痒得不得了，找来找去，发现内裤上有十多只虱子，真是吓坏了，从来没见过，我家里没这种东西啊。禁闭室里睡稻草，里面藏着虱子。出来后，就用开水烫衣服，烫虱子，啊，那是第一次和虱子打交道。

我的反抗心没有被打掉、关掉，高雄中学的生活已经告诉我，我不是日本人，受他们欺负，为什么还要替他们打仗，当炮灰?

剑部队

这次关完禁闭，我被送到了“剑部队”。剑部队是从“满洲国”调过来的关东军的主力部队，队长是中将，级别很高。那里七八年没有新兵了，所以从其他部队调过来四十个新兵。后来才知道，新兵都是我这样的人，别的部队不要的、成绩不好的兵。

他们这支部队的一些老兵，一九三〇年参加过日本“二二六”事变。兵变领头的十七个青年军官都被判了死刑，参与的部队被送到满洲战场。因为“二二六”之罪，他们在军队里的功名之路已经没了，最高就是“上等兵”，所谓“万年上等兵”。所以，这些士兵，混出一种风格，是老油条，也很横，上面也不敢拿他们怎么样。他们点名不到，连长过来问，老兵就说：“你知道，打仗的时候，子弹不一定从前面来，也可能从后面来喔！”连长听了这话，掉头就走了。

剑部队没新兵，也没什么台湾兵，我这个台湾新兵，主要就是给他们做勤务，擦皮鞋、烧洗澡水之类的。但是他们也看到我倔强，敢反抗，反而对我有点“欣赏”似的。他们就是叛乱兵啊，大约觉得我孺子可教，不但给我讲日本肯定会输这样的话，喝了酒还教我唱歌，唱的就是“二二六”兵变时的《青年军官之歌》，也叫《昭和维新之歌》。（李娜按：这是一首表达青年军官忧国忧民，要求变革，铲除贪官和腐败的歌曲。以屈原、汨罗江和孔明、巫山为比喻。但受“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二二六”兵变反而使日本加速走上了向国外发动战争、转移国内矛盾的军国之路。后来《昭和维新之歌》成为日本右翼的代表歌曲。）兵变被镇压后，这首歌本来是禁唱的，但他们不管。我学会了这首歌，现在还记得。

跟他们学的不只是歌，更好用的是那一套不听话的作风，就是不要乖乖地听话，消极也是一种反抗。我后来坐牢的时候，这一套还真发挥了作用。

在剑部队，也是第一次跟日本人有了密切的生活接触。我家是地主，父亲是“皇民”，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日本人还是毫不相干。我从小看日本书长大，但到这时才知道好多日本的习俗是怎么回事，比如日本人喜欢洗澡。我们之前的部队，都是在河里洗澡。剑部队就用桶，日

本人叫作“风吕”的。但没有真的木桶，用汽油桶代替，从下面加热烧水，桶里面垫一块木板。洗澡按照官阶顺序洗，轮到我的时候，我不晓得那个木板是隔热的，把它拿了出来，结果一跳进去，哦，给烫得……

排长洗澡的时候，我得在旁边听命。他叫我：“背中流士！”一一让水从背部流过去？我以为让我给他背上浇水，就浇水，他回头就给我一巴掌，原来是“擦背”的意思！

在剑部队也一样是挨打。军队是很野蛮的，上级欺负下级，老兵欺负新兵，入伍早一天，就可以是大的。（中学里学长可以随意欺负新生，大概就从部队学来的。）有次，有个当兵前是和尚的日本兵，说我态度不好，“没礼貌”，要打我。我对他有印象，新兵入伍的时候，要一起座谈自我介绍，他说：“我是个和尚，但是个酒肉和尚。”这句话印象很深，所以我知道他是新兵。我就问：“你哪天入伍？”他一讲，比我晚一天。我就说：“笨蛋，你是下级”，就举手打他。

有次站岗的时候，是凌晨两点之前，我靠在墙上睡着了。排长巡夜，用军刀刀鞘打我的头。我从迷糊中惊醒，本能地举枪就刺，他很敏捷，躲开了，但把他的衣服前襟给刺破了。他说：“好好好，你要杀我！”早上集合，他叫我出列，当众宣布：“这个兵要杀我，幸亏我是剑道三段，躲开了，但我的衣服给他弄破了。”于是我又挨了一顿打，送回原队处理。

押送回到三〇联队，连长说：“啊！你又回来了。”他心里一定想说：“倒霉啊，才送走。”从此他也不管我，懒得理我了。

学会了“二二六”士兵的办法，日子好过多了。值夜班的时候，我偷偷拉开连长的抽屉，把外出证偷出来，第二天白天就去高雄找叔叔，找他要钱，去买东西吃。高雄有军队的联谊社，叫“偕行社”。那里有很多吃的，是供应军官的。虱目鱼一块钱一条，我有外出证，就可以买。

那时候部队薪水是十八块钱一个月，但五块钱要强迫储蓄，只剩下十三块。物价是一只鸡五块，十三块当然不够用，才找叔叔要钱。

后来又发现，我们部队的山洞里，储藏有好多罐头，有菠萝罐头、牛肉罐头，我就趁夜里站岗的时候偷来吃。米也可以偷，地上挖个洞，用便当盒煮米饭，配罐头吃。这些都可以看出部队纪律已经没有那么严，台湾毕竟不是前线，没有那么紧张。

后来日本投降，部队解散，物资分给台湾兵走路，才发现很多罐头是空的，他们就说一定是我偷吃的，那按人头一人一套的毛毯、军装、罐头，就不给我了。事实上，恐怕不只我在偷。

当兵六个月的时候，也就是日本快投降的时候，有天集合，连长点名，说："点到名的往前走三步。"最后除了我，全都走了三步。"点到名的从今天开始是一等兵。"大家就回头看我，我无所谓，随便你啦。

日本投降

在剑部队的时候，那些“二二六”士兵就说，日本要败。回到台湾人的联队，虽然不敢公开说，但也有很多人议论，因为当时美国和大陆的飞机轰炸很厉害。我到剑部队之后，独立混成三〇联队遭到轰炸，我很多中学的好朋友都在轰炸中死了。岸本，就是宋朝明，高雄中学第一个激发我反日意识的同学，也被炸死了。

当时在台北、高雄、台南各有一家现代百货公司，高楼，有电梯，很多人专门去观光坐电梯。高雄的百货公司叫吉井公司，我去过，也被轰炸了。我们在寿山上，看到火焰滚滚，白天连着晚上，整整烧了两天。

轰炸的飞机每天来，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方向，日本军一点办法没有。有高射炮也不敢打，打了就会被轰炸。看到这种情况，谁都知道日本会输，但战败之后怎样呢？不知道，没想过，作为受日本教育的台湾学生兵，很难想象。

日本投降那天，我正带着外出证在高雄晃，到晚点名的时候才回来，就听到说，天皇“玉音放送”，日本投降了。我说：“喔！”外表没有特别怎样，心里是高兴的，但不敢讲，大家也不能流露出来，因为我们这时还是日本军队。至于日本官兵自杀的，在三〇联队我知道的就只有一个士官。

03 从光复到“二二八”

光复

光复前，我已考上台中高等农林学校（光复后改为“省立台中农业专科学校”，是中兴大学前身），一九四五年九月，我收到入学通知，到学校报到。教务主任是大陆来的，看我才十六岁，怎么可能考上大学，要我降一级念“预科班”。我跟教务主任说，日本的学制是中学五年，因为战争又改成四年毕业，我才能这么早考上大学。我的国语还讲不好，他又不会说日本话，两人沟通不良。我们只好去找院长周进三，他在日本留过学，知道日本的学制，一看我的材料就说，没错。我就开始了大学生活，因此我对院长的印象非常好。

农学院“二战”前有农化、农艺、森林三个系，光复后新设农业经济、植物病虫害两个系，因此共有五个系，每系只有一班，我读的是农化系。

日本投降了，国民党军队还没来，这段时间比较混沌。我被分在第二宿舍，宿舍里的日本高年级学生因为战败苦闷，在一起喝酒，喝醉了，就挥着刀，叫我们新进学生起来，嚷着“喝酒，喝酒！”那哪里是酒，是酒精兑水，很难喝。但是没办法，还得应付他们。有天晚上我回来，发现棉被没有了，原来有个日本学生把我的棉被拿去当掉了。我很恼火，一气就搬出了宿舍。管理员说：“你创纪录啊，住九天就走。”十月十七日国军来了，我把日本学生全部赶到第一宿舍，我成了第二宿舍的龙头。

光复了，好多在日本留学的台湾学生回来，转校进来，慢慢每班人多了，有二三十个人。在班里，我被指定做班长。第一学期考试的时候，有消息传出来说，考第一名的姓陈。班上有个同学叫陈保德，嘉义农校毕业，成绩很好，都以为是他，没想到成绩一公布却是我。我才十六岁，考第一名，平常看起来也不用功的样子，他们不服气，有次特意出题考我，看我怎么算。我一下就算出来，这样他们才服气。

光复了，台湾人扬眉吐气，曾经被欺负得很惨，这时就有了报复的心理。有些地方，如台北，开始出现打日本人的情形。也有学生自发组

织来维持秩序。我们十几个学生也组织起来，自觉是民间的警察。有人把日据时期的一份资料印出来，是台中几个有名的日本人给总督府的一份建议书。建议书上写有：“日本骂人的话只有几句，台湾有几百句，关于‘性’的就有一百多种，可见台湾人是卑劣的民族，所以需要消灭他们。怎么消灭呢？第一给他们抽鸦片。第二鼓励他们赌博。”看了这份建议书，大家就骂：“王八蛋！去抓他们！”建议书上有几个人的署名，我们就先去找“南”医院的院长。走到医院前面，忽然有人讲：“说不定他有手枪啊。”大家就犹豫了。我说：“你们不进去，我进去。”我直奔院长室，先拉开他抽屉看，没有枪，就对他说：“起来！”他乖乖地站起来，我就一把推出去，门外的人一拥而上，把他捆了起来。

日本人挨了打，也要报复。报纸上报道说，有日本人组织了一个叫“幻组”的暴力组织。有天我在宿舍，一个日本同学打门口过，唱《幻组之歌》，故意反复唱：“mabolosi。”我从床上跳下来，拿起一把木刀冲过去，他却不敢打，跑了。

有次路上遇到一个商业学校的日本学生，走到比较黑暗的地方，我就突袭，在他印堂上打了一拳。有时候突袭时碰到体格很好的人，反而会被对方打得半死。我小孩子时候就顽劣不好管，经历了高雄中学和当兵的经历，十六七岁，年少气盛，一想起从前被欺负，现在能够报复，特别有种旺盛好斗的劲头。

读书

光复后，有些日本人为了生活，把家具、衣服、书籍拿到街上卖。当时最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有不少日本人还有如《资本论》等左翼书籍。我买了不少，但看不太懂。当时我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大都来自日本的反共书籍——因为要反驳，不得不阐述共产主义理论。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反倒是来自大陆的《观察》和《展望》杂志。

光复后几年，台湾的文化很活跃，有许多从大陆来的知识分子，大陆的书籍和杂志也跟着进来。台湾人中有头脑、有理想的，也都很活跃，办了很多杂志和报纸。因为看到国民党接收的状况非常差，年轻人都想在思想上找出路，自由主义的《观察》和共产党的《展望》等杂志在台湾销路都很不错。不过，据我的感觉，《观察》被接受的程度还是高于《展望》。社会主义或共产党成为年轻人的思想选择，是"二二八"事件以后的事。

从高雄到台中读书以后，最让我吃惊的是，街上十字路口旁常有二三十个年轻人，围着一圈弹风琴一起学"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到处也都有自动教人国语的小型团体，可见台中地区日据时代的文化气氛一直很好，而且反日情绪很强，光复后才会有这种自发的热情。这让我感到十分震撼，也深深感觉在思想上我比那些人落后太多了。

两年后"二二八"事件发生，我在"'二二八'最后一役"之地的埔里看到了当年教唱"国歌"、教学国语的那些人围在谢雪红旁边，听谢雪红指挥的情形。再经过三年，白色恐怖肃清全面展开，我又在"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里，看到了那些人被枪决前的最后一幕。这就是说，由于国民党接收的失败和"二二八"事件，他们抛弃了国民党的"白色祖国"，走向了共产党的"红色祖国"，然后，从容就义。这就是那批爱祖国、爱人民的热血青年的下场，我一直没有忘记他们。日据时代反日，光复后反国民党，这样的年轻人都是时代的先觉者。那时代，怀抱理想就是要掉脑袋的事情。

光复后的农学院教授，部分留用原来的日本人，部分从大陆过来。台湾本地的老师很少，有位林秀栋，罗东人，五十年代被判十年。院长周进三和教务主任，都是从大陆来的。大陆来的老师的风格和日本老师不同，对学生态度很好，是经过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吧。但我们和大陆老师语言不通，虽然觉得他们带来民主、进步的气氛，但很难有更多的交流。不过，我们对他们的印象都很好，“二二八”事件时，我特别把他们带到宿舍，请同学把他们保护起来。

风雨欲来

台中火车站前面有一条大路，我们宿舍就在火车站后面，电影院在前面。铁轨两边有天桥可通。我和同学去看电影，嫌麻烦不走大路，常常通过天桥到前站，然后跳栏杆过去，这可以说是受到光复后社会失序的影响。

火车站附近有宪兵巡逻，有次被他们抓到了，叫我们跪下。说："你们台湾学生瞧不起我们中国兵，妈的跪下。"我们是三个人，他们也三个人。我看他们拿着手枪，安全栓还没开，偷偷跟那两个同学说："我们打，一个对一个。"他们两个不敢，跪下来了。我不跪，我说："我们是学生，你们管不着，报告到我们学校去吧。"他们就动手打我。这时很多人围过来看，看得愤怒了，就喊起来。他们也有点儿害怕，就放我们走了。跪下来的两个同学一直觉得对不起我，一九六〇年代我出狱回家后，他们还来我家向我一面恭喜回家，一面道歉说，当年让我挨一顿打。

那个时候，民怨已经累积到一定程度了。光复初期的激动，兴奋，扬眉吐气，都成了深深的失望。物资短缺，通货膨胀。官员多用大陆来的，看到的尽是贪污腐败。国军是横行霸道，又骗又抢，根本乱来。

当时在学生宿舍，每个学生缴三十台斤米，应该够吃的，但都被管事的人贪污掉了。我们吃不饱，只好自己去买米烧饭。买米的时候，到第一家问，二十块一斤，太贵了；换一家，二十五；再换，三十块！赶紧回到第一家，二十块变三十五块了。就是这样，一天之中，涨价好几次。

有次在市场上，看到部队的兵也来买米，他们买了一大包，大概六十公斤，要两百块。那个兵就拿出一张大陆的纸币（关金券），面额一千块。老板不收，说没见过。他说："你不是中国人吗？"老板说："是啊。"他说："中国人怎么不用中国的钱？"老板只好收了，而且还要找他八百块。当然这张纸币就是废纸，不知道大陆哪一时期哪个军阀发行的，根本一文不值。

这种事情看得太多了，大家火大了。后来我才明白，国民党不代表祖国，对国民党不满和对中国不满是两回事，但那时弄不清楚，就变成很讨厌大陆来的人。接着又发生了穿越铁轨遇到宪兵的事，我非常愤怒，对祖国的热望变成了绝望。也就因为这种不满的情绪，我才没有认真学习国语。

所以“二二八”事件之所以发生，情感的因素是很大的，是民怨，盼望祖国，祖国来了，怎么对我们这样？我那时还不了解，这是整个中国近代动乱、帝国主义侵略、国共内战的一个后果，是内忧外患的一部分。经过“二二八”事件的洗礼，看到一些前辈的行动（譬如街上自动教唱“国歌”的那一批人），我的思想逐渐清楚了：必须以革命行动来根除老中国的一切旧习气（以国民党为代表），把新中国建立起来，中国才会有希望，台湾才会有希望。因此，在“二二八”事件之后，我就加入了地下组织。

04 “二二八”事件前后

台中戏院市民大会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我还在农学院读三年级。这天下午去看电影，晚上回学生宿舍，迎面碰到谢桂芳（他也是我高雄中学的学长），说：“你还去看电影啊！”我说：“是啊！”心想有什么不对。他说：“台北都打起来了！”就走掉了。接着台北延平大学（台湾人建的私立大学，夜间上课。很多延平大学学生参加了“二二八”，也有不少人加入共产党；延平大学后来改为延平中学）和台大医学院的两个学生来宿舍通报消息了。他们说，三月二日在台中戏院要召开市民大会，问我参不参加，我说：“当然去啊！”

第二天街上就有很多人散发号召斗争的传单，台中整个闹起来了。我记得还看到杨逵写的传单，鼓励人参加市民大会。

三月二日，台中戏院里人满满的。大家推杨克煌出来讲话，他正讲着，谢雪红来了，他就介绍谢雪红，一听是日据时代反抗日本人坐了十几年牢的人，大家就都很敬佩，推举她做大会主席。讨论要怎么做，很多人跳出来讲，群情激动。有人就喊：“讲没有用啦，去！”去哪里？先去了警察局。警察局长立刻解除全体警察的武装，把武器都交出来。我跟着到警察局，就看见台中县长被捉来了，跪在阳台上，谢雪红在旁边，好像进行公审一样。

台中县长因为贪污，大家都很憎恶，有人喊枪毙他，谢雪红讲：“他虽然坏，罪不至死。”有人又喊：“耳朵割下来！”谢雪红说：“这也太野蛮了吧。不要吧。”又有人喊：“打他！”她说：“打可以。”就让两边按着的人打他。她对群众还是很能控制，也因为是日据时代敢反抗日本人的，大家都很尊重，都听她的。

很多人从警察局拿枪，我也拿了一杆枪。枪膛里有黄油，这是保存枪的办法，我在中学三年级的军事训练课上就学过，应该拿布伸进枪管里擦，弄干净。但这时忘记了，拿到枪后就走了。带着枪和子弹回到农学院宿舍，但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台中集会是自发的，其实没有人指挥。

这一天，台中也成立了“台中地区临时处理委员会”，并且把学生组织起来成立“治安队”。台中农学院比较保守，可能因为学生出身的关系。光复时郭琇琮组织“学生联盟”，台中地区的师范学校和商业学校都参加，轰轰烈烈的，农学院就没有参加。现在农学院也成立了属于处理委员会的学生治安队，队长是林秀栋，他是农学院仅有的台湾人教授，罗东人（事件后被学校解聘，转到延平学院任教，一九五〇年被捕，判刑十年）；副队长是一个林姓学长。但当时参加武装斗争的，大多是师范学校、商业学校和谢雪红的建国工艺学校的学生。台中一中和农学院的很少。

攻打教化会馆

三月三日，大家到市政府广场谈天，要干什么也不知道。忽然国军一辆卡车开过来，架着一挺机关枪，后面堆着沙包，看到人就扫射。我们赶紧趴下来，躲起来开枪。我专打车轮，打中了，但车没停，稍微转了一下就开走了。如果它不跑掉，我们就可以消灭它。等到车子都没了，我爬起来，发现跟着我来市政府广场的陈保德（现在是爱之味食品公司的副董事长）不见了。回到宿舍见到陈保德，他说他从排水沟里爬出去，先回宿舍了。

听说国民党的部队集结在教化会馆，下午有武器的人自动去攻，我就去参加。我日据时代受过军事训练，知道卧倒、跳起、进几步。我听机关枪的声音，知道什么时候该卧倒、什么时候该前进。一个商业高职的学生看着我，我跳起来，他也跳起来，但我卧倒，他就没跟着卧倒，结果就中了一枪，受伤了，几个有经验的人把他抬走了。攻教化会馆的人，有从东南亚回来的台籍老兵，有失业的人，多数有战争经验。学生大都没有打仗的经验，所以死伤的人较多。

有个人提醒我："你的枪有点奇怪喔，会发火花。"我也奇怪，怎么对方的火力都往我这边来。我突然意识到，啊，黄油，是我枪里的黄油没有擦掉。算我命大，被集中扫射也没死。那个人，我后来才知道，是东南亚战场回来的老兵，外号叫老虎(Tora)。

一直打到晚上，到几点忘记了。忽然一颗手榴弹落在我身旁三四米远，我赶紧卧倒，它一直滚到我脚边来，好在没有爆炸。原来，这是日本留下来的手榴弹，日本的手榴弹和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用的不一样，要先敲一下再扔出去。国军不会用，我捡回一命。

教化会馆外面有围墙，里面二楼走廊上堆着一捆一捆棉花，用来挡火力，我们的枪打不进去。而且我们在平地，他们在高处，火力又强，所以他们损失很少。攻教化会馆现在被说得很厉害，其实我们攻是没有办法攻进去的，因为国民党军队的家属也在里面，那些家属哭，要投降。守军最后投降了，我们进去后，发现里面仓库里有好多日本空军飞行员专用的衣服、围巾，大家就拿出来穿。

投降的大概一百个左右，几个年纪大的，就带他们到学校集中管理。我们攻的人，各方面都有，搞不清楚多少人，也没有指挥，就那么乱打一通。但我看见一队穿黑衣的，很勇敢，动作很迅猛，据说是埔里来的少数民族。我后来去了埔里才知道，他们穿的是灰色衣服，是日据时代警察留下来的衣服，晚上看起来以为是黑衣。他们是埔里的平埔人，领导人是黄信卿，以前是台籍日本军官，在东北做军官。（“二二八”后他跑到上海，他自称“二七部队”的参谋长，是不是我不知道。“二二八”后他来学校宿舍找过我，讲过他的经历。他是台北人，爸爸是医生，对外省人很厌恶，拒绝给外省人看病，因为国民党太坏了。他告诉我，在大陆北方打过仗，当过排长。战争结束，就跑回来了。我对他不满的是，他讲到，有次占领一个大陆村庄，村里的人献给他一个女孩子，让部队不要乱来。那个女孩做他临时太太。他说，那个女孩还是大学生。后来离开时，他也没有送她东西，就留了一个袁大头给她。那个女孩子说：“你这个袁大头太贵了，我做你的妓女半个月就这么一点报偿！”我那时想，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对他很反感。看见我不满，他说：“你不能原谅我吗？这是战争啊。为了让部队不要乱来，才送女孩子给我睡觉，我是队长啊。”我还是很生气，想这个台湾人怎么搞的。）

古瑞云（周明）“二二八”后也跑到大陆，后来写了一本《台中的风雷》（人间出版社，一九九〇）。他自称是谢雪红的副官，书里面提到这个黄信卿。黄信卿怎么跑的，我就不知道了。古瑞云是谢雪红派。他后来对我讲，他赞成社会主义，但对统一有意见。（他弟弟在五十年代的白色恐怖中被捕，枪毙了。）

到埔里去：寻找黑衣队

台中市和近郊的一些机关都被市民占领了，“二二八”时，整个台湾大概只有台中全面被市民占领。但是当时就有消息，说国军已经要开来了，“处理委员会”的地方士绅很害怕，宣布要解散“处委会”和“治安队”。谢雪红把坚持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二七部队”，后来到了埔里改称台湾民主联军。台南、嘉义则是张志忠率领，首先叫嘉南纵队，后来改为台湾自治联军。再后来在香港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名字就是根据这两支队伍取来的。

我们占领台中后，农学院的学生负责守卫火车站。台北来了通知，要枪和武器。我们的武器也没那么多，就用火车送手榴弹给台北。

后来有个人来报信，才知道高雄很惨，被高雄要塞司令部彭孟缉的军队打得一塌糊涂，希望我们台中派援军去。我是高雄人啊，想带人去援助。那时我们有三四十个人在火车站，但不太敢跟我去高雄。我就想到黑衣队，三月十七日就去埔里找他们。其实他们是埔里的平埔人。我到埔里，看到他们几个人，还穿着那身衣服，拿着枪，我就问：“是攻教化会馆的吗？”他们说：“是。”我说：“我想去高雄，要不要去？”他们就说：“可以啊。”我说：“你们多少人？”一算，五六十个人。那么需要车子。怎么办呢？在埔里过一夜后，三月十八日我去找埔里的区长。那个区长很客气，拿名片给我，我一看，张文环，不是那个日据时代很有名的小说家吗？我问：“你是不是作家张文环？”他说：“是。”我说：“我看过你的小说啊。”他很高兴，我们就谈了很多。他当时大约是能高区的区长，区公所在埔里。但他说：“车子没有。”

我决定回台中去调车子，结果在埔里的大街上碰到了谢雪红、杨克煌他们。他们开着一辆巴士，后面装着袜子、毛毯、蚊帐等很多东西。看见我，我还穿着教化会馆里缴获的日本空军的衣服，他们就说：“哎，学生来，帮忙帮忙。”原来二七部队要撤退到埔里，他们先来，把教化会馆里的东西运过来卖，当经费。他们问我在埔里干吗？我说要带少数民族去高雄救援。他们说先帮忙卸东西。这时还没跟我说要撤退。帮过之后，我就打算回台中，正好带谢雪红来的巴士也要回去，我们就一起走。路过草屯，碰到二七部队的人，说：“国军要来

了，我们要撤退，你不要回去了。”我想，昨天出来还没什么事，怎么一天之间就有这么大的变化？我还是要回去。他们又说：“你回去碰到国军，带着枪就麻烦了，不要拿枪。”我就把枪交给他们。又有个人说，他们撤退时，火药库没有来得及炸，拿钥匙给我，让我回去后把它炸掉。

寂静的台中

我和那个巴士司机回到台中，发现整个台中是静的，街上完全没有人了。可能知道国军要来，二七部队又撤离，一般人都不敢出来了，台中好像死城一样，感受很不好。回到宿舍，宿舍也是空的，桌上有林渊源留的一张条子，让我到苗栗县后龙镇一个同学家里，说他先去了，让我也去。可是没有车子，怎么去？我打算先去炸火药库，到那里一看，已经被流氓占领了。我过去，他们就喊："干什么？"我说："我看看。"他们说："看什么？回去回去。"国军进来之前，流氓先进来保护。流氓是最快倒戈的，这种人真要命。

流氓一般是无业游民，之前攻教化会馆之后，台中开始有人打外省人，就是一些流氓乱来。我曾见他们打一个孕妇，踩她的肚子。我说："打倒贪官污吏，不是打倒外省人。"我有枪，就冲着他们喊："再打我就开枪了。"他们就不敢打了。我想到学校的外省老师会有麻烦，就去找院长，问："有没有人找你麻烦？"他说："有啊。"我说："我有枪，你全家准备一下，我带你们到宿舍。"他说，他家里还有几个外省老师、农业化学系的主任等。我说："通通来。"我把他们带到学生宿舍，让林渊源照顾他们。林是凤山人，慢我一期，但跟我很好。他很会照顾人，就让他在宿舍照顾外省老师，流氓不敢来学校宿舍。

林渊源留的条子，让我去后龙，找姓魏的同学，也是农化系的，后来在美国一个大学当教授，娶了一位越南总理的女儿。但我没法去，没车子。我决定赶快回埔里，带两个同学（郭锡赓和王明璋）一起走。

加入二七部队（台湾民主联军）

之前和那个巴士司机分手时，和他约定了在一个地方等，要去埔里的话坐他的车子。我去炸火药库时，看到那些流氓倒戈，就担心那个司机会不会也倒戈。本来也不认识啊，就不敢去约定的地方，决定走路去。我带着两个同学先到第一宿舍，看到同班同学田焕玉正在整理要缴出去的枪支。我们三人各再拿一支枪和子弹后出发，走到雾峰附近，听到后面有车子来。是不是国军来了？当时整个台中没有人，气氛很肃杀，认为国军随时会来，所以很担心。但台中到埔里，走要走一天。我就让他们两个在路边蹲下来，我去拦车：如果是国军，我会

给打死，你们就快跑；如果不是，我们就可以搭车走了。我拿枪站在路上拦车，没想到就是那个司机！他等我很久没等到我，所以就开走了。他说："怎么你没有来？"我说："我怕你也叛变。"他说："妈的！"

到了埔里，谢雪红他们本来在小学校那边驻扎，后来怕影响学生，就搬到武德殿。叶芸芸曾问过我埔里到底多少人，我说武德殿很小，顶多容纳一两百人。她说："别人说一两千个啊。"我说："别人怎么讲我不知道，我在那看到的，就这么多人。"我还告诉过叶芸芸和苏庆黎，在攻教化会馆时候，手榴弹扔到我脚边，知道它的杀伤半径五米，掉下来离我身边三四米。我当时没讲，现在敢讲：当时一紧张，害怕得阴茎的肉都缩进去，剩下皮，没办法小便了，一个钟头以后才恢复原状。她们听了笑坏了，说："你最诚实。"

没有打过仗嘛，怎么不害怕。

我是又回到埔里后，才加入二七部队的。在埔里武德殿，人家都分好睡的地方了，我没地方，谢雪红说："睡我旁边好了。"我睡在她旁边，这样才听到他们的许多话。好多干部过来跟谢雪红和杨克煌讨论工作，里面就有陈文茜的七舅公何集淮。

有次我听到谢雪红说："台中如果解放了，要把最大的路命名为'雪红路'。"杨克煌就骂她："什么雪红路！牛屎路啦！"我听了，对杨克煌印象很好，觉得他人正派。杨克煌后来在大陆和谢雪红结婚，日据时代两个人坐牢时就恋爱了。杨克煌先出狱，家里让他结婚，谢雪红知道后很生气。

有个钟逸人，写过《辛酸六十年》，说陈明忠"二二八"时给"支那军"打伤了，到现在都没醒过来——因为我没赞成"台独"。他说自己是二七部队队长。黄金岛说他胡说八道，他从来没打过仗。至少在埔里，我也没见过他。还有一件事，我第二次坐牢回来时，《人间》去采访黄金岛，又来找我，说在你对面山里打仗的黄金岛提到你。黄金岛还说，谢雪红给钟逸人十万块去买粮食（当时可以买二十公顷土地，一万块可以买两甲），结果他跑掉了。《人间》把这个写出来，钟逸人要告《人间》。后来我就说话，当时我在啊。我们在埔里因没钱买青菜，每天都吃罐头。

我回到埔里后的第二天也就是三月十九日，二七部队开会。谢雪红宣布，二七部队改为“台湾民主联军”。有个新闻记者蔡铁城（五十年代被枪毙）就说：“埔里是台湾的重庆。”大家听了很振奋，埔里是重庆，就是革命的中心啊（就像重庆是抗战的中心一样）。大家就朝天鸣枪庆祝。

谢雪红去苏联学习过，有军事知识，她知道埔里守不住。只有乌牛湳桥这个地方可以守。国民党的部队来，一定会经过这个桥，他们如果冲过来，埔里就守不住了。

所以谢雪红想要把部队带到雾社去，山里面可以打游击。她去雾社联络，我没有跟着去，因为我不是她的亲信，情况是后来雾社的乡长高聪义告诉我的。她找高聪义，高说：“我们这里的人，经过‘雾社事件’，死了十之七八；活下来的小孩子长大了，参加高砂义勇队，又死了三分之二；如果再参加这个，我们就灭族了，所以我们不希望你们来雾社。如果个别人要参加，我不反对。”所以只有十几个人跟着谢雪红下山。谢雪红因为之前听到我想要带着埔里的少数民族去支援高雄，就把这些雾社的少数民族给我带，我后来跟别人说我们是“突击队”，实际上是敢死队。因为当时（一九八七年）我刚保外就医出来，敢死队这个名字不敢讲，就说是突击队。雾社的少数民族十几个，埔里自愿参加的人（平埔人）一二十个，副队长是吕焕章（后来白色恐怖时他被判死刑，因为在地下党里他是“台中武装工作委员会”委员）。谢雪红身边的人，大概不少是共产党员。我当时只有十八岁，都不了解，就是凭着年轻和血气。因为睡在旁边，听到他们谈的很多话。我听过谢雪红和他们讲，如果埔里守不住，就退到嘉义附近的小梅基地，嘉义那儿有张志忠的台湾自治联军，去和他们合流。

“日月潭之战”

我们在埔里占领了能高区署和警察所。国军那时也进驻到二水、集集、水里、日月潭，准备进攻埔里了。听说国民党要从日月潭攻来，我们打算先发制人，去攻打日月潭。古瑞云做总指挥，分成三个队行动，一个队大概十几个人。到了涵碧楼，发现已经空了，国民党的部队跑到日月潭的另外一个地方了。我们就往派出所方向走，当时是晚上，刚一上路不久，忽然他们的探照灯照过来，机关枪也扫射过来。我们赶紧卧倒，距离很近，但互相都不知道多少人。我们的总指挥古瑞云说：“要马上攻！”我说：“情况不清楚，对方火力又那么强，不能贸然进攻。”他说：“现在不攻，等到天亮了，他们的援军来了，我们就死定了。”我有些犹豫。他就说：“你怕死吗？”我被他一激，就决定攻。我打出手势，全体敢死队员就一起大喊“冲啊”，冲了出去。没想到，国军听到我们的冲杀声，竟然落荒而逃。他们也搞不清我们多少人，什么情况。原来他们也很害怕。这一仗我们俘虏了三个国军，后来“警备总部”的档案记载是俘虏了二百人，这也成了我后来被通缉的罪证。

乌牛湳：最后一战

攻完日月潭，我带着我的敢死队连夜赶回埔里，还来不及休息吃饭，早上七点多，国军又攻过来了。不管国军从哪儿来，要进入埔里，都得通过乌牛滴桥。当时脑筋也简单，也没有真的打过仗嘛，我们就守在那里。乌牛浦桥前后有两块山丘，当时是我带敢死队十二人守着靠埔里镇的一边，黄金岛带人守另外一边。一直打到下午四点多，忽然有颗子弹从另一侧打过来，从我左边腋下擦过胸部，我只觉得一阵灼热。我想怎么子弹从侧面来？回头一看，原来对面的黄金岛已经撤退，国民党的军队从三面上来了，我们被他们包围了，于是就赶紧撤退，身边只剩下敢死队的五个人。我们匍匐前进，溜下山去。后来看到古瑞云的《台中的风雷》，说得一点也不真实。我是最后撤退的，我记得很清楚，我知道他胡说八道。我躺在那里都被打了一枪，他说，他站在那里挥动帽子，怎么可能不被打到，距离只有不到一百米，百发百中啊（吕正惠按：见《台中的风雷》八十四～八十五页）。

我们回到武德殿，发现没有人了，谢雪红他们都不见了。我知道原来讲过撤退了去小梅基地，有条去东势的山路可以走，但我不是台中人，不知道怎么走。我的队员，雾社的少数民族说："我们回雾社吧。"

我腋下被打了一枪，受了伤，先在埔里看医生。那个医生给我敷药，手直抖。我给他钱，他也不要。他说："我是医生，不管好人坏人我都救。"我还想逗他，问他："那你把我当好人还是坏人？"后来到雾社，有个张新汉医生继续帮我治疗，他本来是基隆人，得了肺结核，来雾社养病，因为这里空气好，乡长就让他当卫生所所长。白色恐怖时他也被捕了，在监狱里我们正好同一个房间。我问："你为什么进来？"他还不好意思讲，原来是因为给我治疗，但他没有被判罪。

雾社乡长高聪义

埔里和雾社中间，有个地方叫眉溪，那儿有派出所，有五六个警察。我已经两个晚上没有睡觉了，又打了败仗，受了伤，心里有气，看见眉溪的警察，就开枪吓唬他们，结果他们跑掉了，以为我们很多人。他们就向上面报告说，五六十个武装的人攻击他们，所以之后国军才来雾社抓人。

快到雾社的时候，路边有片林子，我们之中的一个人，是雾社的赛德克人，拐了进去，我以为他要小便，我也去，结果看见他在林子里，枪抵着下巴，要自杀。我说："你干什么？"他说："打了败仗，没脸见人。"我说："我们也不是故意打输的。"

到了雾社，我们找到乡长高聪义。高是布农人，有个日本名字叫加藤，他是日据时代日本人的养子，所以能够受教育，算是我农学院的学长（他念书的时候，还叫台湾帝国大学附属农林专门学校，我念书时，改为台中农林专门学校，光复后才改为省立农学院）。战争时，高聪义参加高砂义勇队，被派到菲律宾小岛上，在那儿居然语言差不多通，他觉得很奇怪（后来才知道，少数民族和菲律宾土著都是南岛语族的人）。我带着农学院的两个同学，躲在高聪义家，从他那儿才知道谢雪红曾经来找过他，和他讲想撤退到雾社打游击的事。雾社的副乡长是个平地人，叫刘锦焜，想在山上做生意，高聪义不允许，他一直怀恨，现在正好有机会了。我们那时每天喝酒，"二二八"怎么打也都讲，他都听到了，就去告密，说高聪义通匪，窝藏我们。再加上眉溪的事，国军来抓人，我就换下空军军服，逃离雾社，打算回台中去。

走到雾峰时，肚子饿得不得了，看见小吃店，闻着真香。我身上只有一碗面的钱，想，算了，把它吃掉！人一辈子很可能会不小心无意做了坏事。比如我走的时候，枪弹来不及处理，藏在高聪义家的屋梁上，后来国军搜出来，给他惹了不少麻烦，那是无心做的坏事。也有明明知道不对，还要做，就成一辈子心病。在雾峰这个面店，一碗面眼看要吃完了，肚子还很饿，我就把腋下的毛拔几根，放进去，叫老板来看："怎么这样，这么脏？"老板说："对不起，对不起，再换一

碗。”这是明明知道不对，还是做了。这一碗面想起来内疚，一直记到现在。

我第二次坐牢出来，有个日本朋友来，她要去雾社找高聪义，我说："你问他认识陈明忠吧？"晚上高就打电话来了。后来我们见面喝酒，他就说："妈的！你走的时候枪藏到天花板上也不告诉我！"我说："对不起，太匆忙，来不及啦。"后来他为此受到情治人员的监视和骚扰。

05 从加入地下党到被捕

回到农学院：准予自新，危险分子

回到农学院，已经开学了。有同学对我说："快跑，报纸上登出来了，通缉你。"后来我看到通缉布告，上面说，谢雪红悬赏奖金十万，我一万。我回宿舍收拾东西，准备逃走，林渊源来了。他说，院长周进三让他告诉我，不要跑，他会帮我。我说："他凭什么呢？"原来他是陈仪的妹婿，他哥哥又在南京中央当大官。（周进三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思想大概有点左倾。后来他要跟陈仪回浙江时，跟我透露过，他是民主同盟的人。）

三月底，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委员李冀中，还有被蒋介石派来宣慰的"国防部长"白崇禧，都发表过声明和讲话，针对学生，说："准予自新，不咎既往。"

周进三院长就让我按照教育处订的《省立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关于"二二八"事件自我表白须知》的规定，写一份"自新声明书"——实际上是学校帮我写好的，当时我还不怎么会国语，反正这个自新书是制式的，内容统一。院长给二十一师政治部发函，附上我们六个学生的文件。

函件是：敬启者查本省"二二八"事变期间本院学生陈明忠等六名因识见浅薄，不明事理，致受人煽动，参加暴举，该生事后深知自己言行错误，向本院请求准予悔过自新，本院以该生等确属无知盲信，照章似可准予自新，兹将该生等名单开列一份，函请备查为荷……

"自新书"还要附上日记，交代那几天的活动，和什么人在一起，谈些什么，参加什么集会，每个人发表了什么意见，事件中见闻、感想，未来求学服务计划等等。我后来看到档案中这个日记，里面写的事件日期都不对，我自己写的怎么都不知道，大概当时是胡乱应付，随便乱写的。

后来，院长又让吴本立教授带我去二十一师政治部，找一个新闻处的少将。那人说："你们学生爱国没错，可是现在怎么样，物价上涨，社会大乱，你们热情做了错事。"把我训斥一顿，算是把我的通缉取消

了。那时还追问我谢雪红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啊。（一九九一年我去大陆的时候，有老台胞一直问我，谢雪红什么时候离开埔里的，我根本不记得了。原来，当时地下党曾经派谢富来通知谢雪红撤退。谢富本来是台中市委，做生意掩护身份，地下党让他去通知谢雪红撤退。如果是接到谢富通知，她才离开，她是英雄。如果之前就离开，她是逃兵。原来一些老台胞在大陆和谢雪红斗得厉害，才问我这个。我确实不记得谢雪红撤退的时间，我不是有意帮她讲话。）

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带着军队撤退到台湾以后，曾经宣布，参加“二二八”的人，写悔过书之后，不再追究。但是我不知道，我已经被列为“危险分子”，黑名单上有我的名字。

加入地下党

我就在农学院继续念书，一年后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地下组织（正式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

“二二八”让年轻人很苦恼，也开始想：出路在哪里？当时我们读了很多大陆过来的杂志，我前面说过，有民主党派的《观察》和共产党的《展望》。慢慢大家了解，原来祖国有两个，一个是现在欺负我们的、以国民党政权为代表的白色祖国，一个是要打倒国民党政权的、以共产党为代表的红色祖国。

当时很多台湾青年都是在“二二八”后，从白色祖国转向红色祖国，开始左倾的。台湾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二二八”后扩大了。“二二八”的时候，地下党只有七十多个成员，一九四八年就有了四百多人，到了一九五〇年全面逮捕时，根据蔡孝乾的交代，已经有一千多人了。

我现在说“二二八”时共产党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很多人不信。我就说，以后历史会说话的。“二二八”时，台北没有成立武装部队，只有台中和嘉义成立了部队。台中是谢雪红，嘉义是张志忠，都是共产党员。当时我还不是党员，但很多参与的人已经是党员了，只是身份不能暴露。

我入党的时间是一九四八年三月二日，就是台中开市民大会的一年后。因为我在“二二八”事件中表现勇敢，本来又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倾向，地下党早就注意到我了。我和农学院的谢桂芳、吕从周三个人一起入党。吕从周是陈文彬（光复初期是台大教授，后来担任建国中学校长）的外甥。他原本考上了师大，不读，又考来农学院，和我住一个宿舍。谢桂芳是凤山人，在高雄中学时高我一级，但光复后才考上农学院，所以，到农学院他成了我学弟。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谈得来，后来一起入党，发展成支部，谢桂芳年纪大点，做书记。

我们三个被观察了一年才入党的，入党的地点是在台中陈福添的家里。墙上贴一块红布，李舜雨带着我们三个宣誓。李舜雨（后来逃到大陆，改名李绍东，二〇一一年九十二岁逝世于上海）是职业革命

家。他的父亲李乔松，是日据时代农民组合的领袖之一，非常有名。我先由李舜雨领导，李舜雨逃走后，又交由李乔松领导。

一九四八年二月，台中开全省运动会，我们就去运动会上偷偷发传单。怎么发呢?

很多人来看运动会，有小孩子卖冰棒。我们找几个卖冰棒的小孩，给他们一点钱，把传单给他，跟他说:“有人买冰棒，就顺便给他传单。”警察发现了来抓，小孩说:“不知道啊，有人给我钱让我发的。”他是小孩子，警察也没办法。其他传单，利用晚上往台中墙上贴，这一次的活动是我们的入党考核。

农校同学的命运

“二二八”时我带着农学院两个同学在埔里打仗，又在雾社高聪义家躲藏。我被捕后，那两个同学怕得要命，但我都没有讲他们，他们很感激我。

家在基隆的那个同学叫王明璋，我们离开雾社后，他给高聪义写信说：“谢谢你的照顾，我们等待快乐的日子到来。”结果这封信被查到了，他家里花了很多钱才保住他。家人跟他说：“不要和陈明忠在一起了！”把他转学到台大读书。他在台大读书时，我去他家找过他，他不在，他姐姐在，问我是谁，我说“陈明忠”，姐姐说：“啊，还是个小孩子嘛。”原来，她听她弟弟讲过我，还以为是个高大的大胡子。

后来我坐牢出来，在旗山农校教书时，他到高雄来出差，到旗山农校找我。我正午睡，有人用脚踢我的枕头，枕头踢掉了，我醒了，说：“哪个王八蛋？”一看是他，我们谈得很愉快。旗山农校的老师好多是台大毕业的，有个客家人，被他教过，惊讶地说：“你怎么认识他的啊？”我说：“早就认识啊，老朋友了。”那时他已经是副教授了。

顺便讲一下，因为我参加过武装斗争，我的同学对我很尊重。我爸爸在台东县政府山地科工作时，有台北林业部门的官员过去，爸爸请他吃饭。问他哪个学校毕业，他说台中农学院，爸爸说：“陈明忠你认识吗？”他说：“认识啊。”爸爸就说：“是我的孩子啊。”他说：“啊！”他本来坐上座，赶紧下来，让我爸爸上座。有时爸爸出差来台北，让我帮忙，因为好多农业官员都是我农学院的同学或学弟，检验局啦，林业局啦，很多单位都有我的同学。后来我在公司工作时，有时公司会让我出面，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的同学都会帮忙。也因为这个原因，第一次出狱以后，我跟父亲的关系也比较缓和了。以前，他要小老婆，这个小老婆还是我公学校的同学，我很生气，我们的关系一直不好。不过，虽然我们的关系有了改善，我结婚时还是没告诉他，他很生气，又不敢讲，他其实很怕我。

日月潭茶叶试验所

农学院毕业后，地下党想派我去雾社建立武装基地。当时地下党在山地建立的根据地，北部有角板山，南部有阿里山（角板山泰雅族人的省议员林瑞昌，阿里山邹族人的领袖高一生、汤守仁、汪青山都加入了地下党，后来都被枪毙。日据时代的许多山地精英，战后初期和地下党接触，才是他们被肃清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受日本教育，才不被国民党信任），中间地带就是雾社，还没有建立基地。如果建立起来，三个基地可以连接起来打游击，所以最初给我的任务是去雾社建立基地，我就申请去雾社乡公所工作。我是台中农林学院毕业的，家里又是地主，要去山地乡做公务员，是有点怪。我爸爸不清楚怎么回事，骂我："大学生，省政府以上才去，县政府都不去，你要去乡公所！"我说我身体不好，有肺结核，要去雾社疗养，山地空气好。我爸爸对我毫无办法。

乡长接受了我的申请，报了上去当经济股长，但上面不准，原来因为"二二八"，我有案底。（后来，有次遇到一个田姓同学，他和宪兵队好像有什么关系。他说："你有危险哦，黑名单上有你，说你是危险分子。"第二次出狱后，我才又知道，国民党的档案说，我俘虏过两百个国军，是危险分子。哪有两百个国军！根本就只有三个。）

后来我就去了比较近的日月潭茶叶试验所，当化验员。假日到雾社去做联络。那时去山地要有入山证，要检查，我去了三次没问题，第四次时，岗哨盘问我："你常常来干什么？"我说："雾社地区的人生活不好，想帮他们在那边种茶叶，改善生活。"回来后，我告诉李乔松，他说："你不要再去了，有危险。"以后我就没有再到山地工作，如果我留在山地而被捕，必死无疑。

大逮捕

一九四九年底开始对岛内的地下党进行大搜捕，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规模更为扩大。农学院先被捕的人供认，院内姓谢的、姓吕的两人有问题。因为不知道具体名字，特务就来学校抓人，到教务处，叫谢桂芳过去。那时，谢桂芳的哥哥已经在台北被捕，他就比较小心，先偷偷去看，教务处只有一个人，他以为没事。可是他不知道外边停有车子，特务已经在楼上等着了。结果一上去，就被抓了。

谢桂芳戴着手铐下来，正好吕从周吃饭回来，看到他，谢桂芳偷偷把衣服拉上来，给他看见自己戴了手铐。吕从周明白，谢桂芳被捕了，赶紧跑路，跑到冈山，叫他哥哥来通知我，要我小心，他不知道我那时的党籍已经移到台南市了。后来吕从周竟然能够偷渡，跑到大陆去，真是幸运极了（他现在还在）。

现在就说到我为什么被捕。我的领导李乔松因为身份暴露，要逃到大陆去，临走前交代我，下一次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会有人跟你接头，如果到时接头的人没有来，立刻走。我按照他的话去等人，等不到人，我就赶快回到冈山，到冈山农校教书。冈山农校有一个叫蔡仁雄的数学教员，大我四五岁，台南二中毕业，去日本留学回来教书。我从他的话里听出一些味道，知道他是地下党。后来他想要介绍我，我说我已经参加了，但和组织断了线，你帮我联系一下。他是台南市派来的，是区委。我就接上了台南的组织。后来，台南地下组织被破坏，我带他到大岗山一个同学家里躲。

不久我就被捕了，但我没有把他供出来。他从大岗山来冈山找我时知道了我被捕的消息，但没有来抓他，他判断我没有讲他，他赶快出来自首，也没有讲我。他虽然自首，但显然没有变心。我关了十年出来后，他常来家里找我，要送钱给我。他事业成功，养鸡发了大财。他叫我娶他妹妹。我那时身体不好，肺结核，吐血，就说："你妹妹我又不认识，我也没工作。"他说："生活我给你保障。"我还是没答应。我们一直有来往，一九七六年我第二次被捕，出狱后他仍然来找我。他前几年过世了。

逃过一死

特务得到的情报是，我在冈山中学教书，他们到冈山中学抓我，没找到。他们又到了冈山农校，问校长："陈明忠在这里吗？"我那时远远地看到校长指着我这边，我走了过去，就被带走了。

我之所以被捕，推测起来有两个线索。一个是我农学院同学吴寅生，他是光复后去大陆读书的第一期公费生，去了北京大学，因为英语差，退学了。回台湾后，常来农学院的宿舍聊天。他说，大陆现在共产党虽然还不行，但一定会赢，因为国民党没有民心了。后来他被特务抓了，他不是共产党，熬不住刑求，就被收买了，成了特务。

我从茶叶试验所回学校时，碰到他，我告诉他，我要回冈山教书了。那时知道我回冈山的只有吴寅生，很可能是他说出了我。但他误以为我是去冈山中学，所以后来特务先去冈山中学抓我。我坐牢出来后，他曾叫一个朋友带话道歉，说，他没有讲我是共产党，只说和谢雪红关系密切。我说道歉没有用，我牢都坐过了。他后来在台视当副导演，他老婆是很有名、很漂亮的闽南话演员。

第二个线索是这样。在"保密局"被审讯时，我一直不承认，那个审讯的人说，你上级已经招出你了，就把自白书给我看，我只看到"陈明忠"三个字。后来他要抽烟，打火时被风吹熄掉了，他转过身去打火，我趁机去翻那个自白书，看到第二页的签名，洪什么儿，中间那个字没来得及看清楚。他回过身来，甩手打了我一巴掌。但是我看到那个名字了。

后来我在"军法处"的监狱碰到张伯哲，他问我："谁讲你的？"我说："一个叫洪什么儿的。""是洪麟儿"，张伯哲说。李乔松去大陆以后，把我的组织关系交给洪麟儿。那天按照约定时间碰头时，洪麟儿没来，我就跑掉了。所以洪麟儿没见过我，只知道我的名字。他是区委的，家里有武器。张伯哲就是逃到他家里被抓的，要抓洪麟儿，结果还抓到张伯哲，想抓小鱼，连大鱼都抓到了。

张伯哲判断，关于我的情况，法官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要咬紧不承认。我在冈山农校教书一年多后，才被抓，吴寅生打的报告，是"二二

八”时期的事，是旧案。从这条线索判断，我的新案只有洪麟儿提到，此外没有任何证据，因此无论如何不能承认加入地下党。不论如何刑求，就是不承认，我因此逃过一死。

06 从被捕到判刑

转移

一九五〇年夏天（暑假的返校日），我在冈山农校被捕，先被送到冈山宪兵队，又转移到彰化宪兵队，然后是台南宪兵队、台北“保安司令部”、“保密局”南所、北所，最后到“军法处”。

在彰化宪兵队，被刑求，先是灌水、夹手指，然后老虎凳。老虎凳的砖头一块一块往上加，我都不承认。刑求的人说：“再加一块，你腿骨会断，人可就终身残废了。”我一想，是啊。于是招供。招什么？我说：“我参加了‘社会革命党’。”他们查来查去，查不到这个组织。他们说我不老实，把我移交到台南宪兵队。

在台南宪兵队牢房，同房有宪兵，因为开玩笑玩儿枪误杀了同事，也被关在这里。晚上有宪兵来跟他聊天：

那人问：“陈明忠是哪一个？”

“里面那个。”

“队长说，这个人要死了。”

“他不承认是‘共匪’啊！”

“当然不会承认啦。你知道××师长，查出他姨太太是‘共匪’，他自己把她毙了。自己的姨太太都杀，他知道沾上‘共匪’的厉害啦。‘共匪’……当然死也不承认的。”

我听到他们聊天，又想，在这里没被刑求，看来定案了，必死无疑。

有一天早上，听到叫我的名字，我就把手表、杂物整理好，交给同牢房的黄介石，准备去死。我那时二十一岁，黄介石二十二岁。少年人不懂安慰，傻傻捧着我的东西，看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后来知道，黄介石是台中师范支部书记，判死刑。）

走出牢房时，我觉得脑袋顶部突突地跳，有点紧张。我这时候才知道，人的顶门，天灵盖上还有动脉。出来才发现，是要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情报处，不是枪毙。

“保安司令部”情报处是由东本愿寺改的，在西门町（按：今狮子林商业大楼、六福西门大楼和诚品书店武昌店那一块）。我被关到三楼一个房间，一个人，闷得发慌，我就数墙上和柱子上的佛像。有一次我唱日本歌，忽然旁边牢房有人说话了：“你会讲日本话？”

我们就隔着墙壁谈起来。他自称白井少将，日本人。我问他为什么被关在这里，他说：“我也不知道啊。”后来我出狱，听说当时国民党找来了一批冈村宁次的部下，组成“白团”，帮国民党训练人员，来对付共产党。冈村原来是日本军华北区司令，他用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对付共产党的游击队，很受肯定，被提升为整个中国战区司令。战后冈村宁次被列为重要战犯，本应该接受战争审判，却被国民党庇护起来，后来被揭发，不得已送回日本。但蒋介石和他秘密达成了组织“白团”的交易。出狱后我还特意去查了“白团”的档案资料，不过没找到这个白井。

“保密局”

我又从“保安司令部”情报处转到“保密局”南所，这里环境最差，因为抓的人太多了。房间不够，一个房间关二十四个人，所以只能八个人躺下睡觉，十六个人站着或蹲着，三班轮换睡。这样站了一个礼拜之后，脑子连思考的能力都没有了。

我到“保密局”第一天就被打。这天早上喝稀饭，里面有绿豆，简直是美味，我一口气喝了好几碗，结果老是想上厕所，打了几次报告都不许。后来看守说：“你出来。”我一出去，马上就一顿暴打。原来，这里的规矩是每三小时开放一次上厕所。

厕所是这样的：大便的地方，是一个围起来的池子，大家蹲在池子四周。之前在宪兵队时，有人趁上厕所逃跑，所以他们加强戒备，犯人在里面大便时，门是开着的。开着也算了，卫兵还站在门口，举枪对着你。这怎么大便得出来！所以我十几天都便秘。终于便出来了，硬硬的，还有光泽。

之前那个人怎么跑掉的呢？卫兵带他上厕所，拿钥匙开门，刚打开，这人忽然转身就跑，卫兵慌了：如果去追他，门已经开了，厕所里面的人会趁机跑出来；如果先顾锁门，这人就跑了。这一慌，那人已经跑到院里，翻过墙去了。为了活命，人的脑筋变灵光，胆子也变大了。我第一次坐牢出狱后见过这个逃跑的人，但他已"自新"，没事了。

对"保密局"南所还有一个记忆。这里有土豆，也就是花生，有一次分到十九颗，我舍不得吃完，吃九颗，留十颗，包起来，想着下顿吃。没想到调房间，忘记拿了。现在还会想起这件事。（现在也还是喜欢花生米下酒，没有花生米就不痛快。有次跟那些支持抗议靖国神社的日本左派吃饭，笑他们，日本人吃花生都是一颗一颗吃，我是一口吃掉好几颗。）

再后来，我又从"保密局"南所转到北所。北所原来是辜颜碧霞（辜濂松的母亲）经营的高砂铁工厂，听说附近有吕赫若的大安印刷所。吕赫若变卖了自己的祖厝，又从辜颜碧霞那里拿到一笔钱，开办了这个印刷所，表面上印乐谱、歌谱，实际印地下党的宣传品，包括《光明报》。一九五〇年《光明报》案发，吕赫若关闭了印刷所，逃亡到鹿窟基地，在鹿窟基地被毒蛇咬死。辜颜碧霞被捕，高砂铁工厂被没收，就改为"保密局"北所。

北所房间较宽，终于可以睡了，每个人都可以躺下来睡觉。只记得晚上没有棉被，觉得冷。大概是牢房不够，赶工的结果，每间牢房的墙壁水泥未干而显得潮湿。最后，移到"军法处"。

“军法处”：冯锦辉和钟浩东

“军法处”在今天的青岛东路，就是现在喜来登大饭店的所在。有二层楼，关押犯人的地方分几个区。一区、二区在楼下。二楼是三区，关女犯，我太太冯守娥就关在那里，那时我们还不认识。

我关在二区二十房，谢桂芳就住对面牢房，看到我进来，很惊讶，说：“你怎么来的？”意思是，他并没有供出我，怎么我也被抓了。我就说：“又不是我爱来。”同房人听到，都笑起来。

这里给犯人穿的囚衣是红色的，红内裤和短袖红内衣。早上放出去洗脸五分钟，要求必须穿这种囚衣，因为醒目，方便卫兵监视。很多人都不喜欢，只在那五分钟穿。我因为被捕以后，转移来转移去，几个月就一身衣服，穿得都快烂掉了。所以我一拿到红衣裤，二话不说就换上。同房难友说，这个人很干脆。

我们这个房间三十多人，分两班睡觉。我认识了同房的张伯哲，最初是他叫我过去，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陈明忠。”他说：“哦。”就把我的情况一一都说出来。我吓一跳。他说：“不要怕，我是你上级的上级。”他是台湾地区地下党的重要领导，台中地区地委。他在鱼池乡林业试验所担任总务科长，那里离我工作的茶叶试验所不远，他曾偷偷地来观察过我两三次。所以我不认识他，他记得我。

我进二十房不久，有一个叫冯锦辉的被叫出去枪决了。他走出去之前，和同房的每个人都握手，带着微笑走出去。和我握手时，他的手是温热的，我非常佩服。我在台南宪兵队误以为要被枪毙时，因有点紧张而感觉到自己脑袋顶部突突地跳，他居然这么镇静。我们唱着安息歌送他走，我问张伯哲：“他是谁？”张伯哲说：“他是罗东的小学教员。”我在绿岛时，朋友指着一个出来提开水的女生，告诉我说：“她就是冯锦辉的妹妹，叫冯守娥。”当时我完全没想到，后来会和她结婚。（很久以后，我终于知道，冯锦辉是宜兰地区的负责人，由郭琇琮直接领导，他早就知道一定会死，所以视死如归。他是我岳丈最喜欢的儿子。）

又过了几天，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也被叫出去了。本来基隆中学案，凡是外省地下党员一律判死刑，本省人一律判感训（破案时“戒严令”下达不久）。钟浩东和其他本省人被送到内湖小学“新生训导处”（绿岛新生训导处的前身），但他坚决不接受感训，被调回“军法处”。他是我高雄中学的学长，也是当年在高雄中学朝会时被点名大骂的两个人之一，因为他们跑到大陆参加抗战了。

按照惯例，我们唱安息歌送他，他要求我们加唱《幌马车之歌》。他说，他太太跟着他到大陆参加抗战，他太太很喜欢这首歌。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就是著名作家钟理和。在绿岛时，有人告诉我，钟理和其实也加入了地下组织，但那时他犯了严重的肺病，生死未卜，大家都不讲他。（关于钟浩东的事迹，大家可以参考蓝博洲写的《幌马车之歌》。）

张伯哲

张伯哲告诉我，基隆中学案外省人都枪决，本省人都判感训，让本省人产生了不该有的幻想，以为国民党对本省人比较宽大，加上大家以为台湾快解放了，于是许多人被捕后就坦白交代关系。他说，其实这是国民党一贯的欺骗手法，没有国民党统治经验的本省人太天真了，国民党对共产党是绝对不会手软的。

果然，以后的判决状况证实了张伯哲的说法。抓了一大批人（如台北市委案、台中市委案、学委案等等）后大约四分之一的人会被判死刑，也就是支部书记以上的人都会死。不久之后，判死刑的"行情"提升为三分之一，于是，小组长以上的都死了。再过一段时间后，行情更上一层，提到二分之一，如此一来，连参加小组会议的人，以及缴过党费的人都要死。

张伯哲在大陆时是东江纵队团级政委，来台后是台中市、台中县地区的地委委员，他当然一定死。我看他每天都很平静，好像等待的不是死亡，我问他："你不怕死吗？"他说："孔子不是说过吗，朝闻道夕死可矣。"对他来说，"道"就是共产主义。

张伯哲是广东东江地区的人，地主家庭出身，家境蛮好的，全家只他一个人参加革命。他写了遗书，给我看过，其中有一段大意是这样：你们反对我参加共产党，可是你们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证明我们是对的。那时候共产党在大陆已经打赢了内战，建立了新中国，所以张伯哲觉得革命基本上已经成功，他死而无憾。张伯哲是在我被送到"军法处"新店分所以后才枪毙的，他把遗书交给一个判五年的人，我出狱后，找不到那个人，也不知道遗书是否送到了他家。那个人是因高雄市委案被捕的，一九四九年就被捕了，在牢里得了脚气病、夜盲症，很瘦，很可能出狱不久就死了。

张伯哲死后十年，他的家人接到以他的名义寄来的西装料，家人很惊讶，就以为他还活着。据我判断，这个西装料是蔡寄天寄的。蔡寄天是地下党领导蔡孝乾和宣传部长洪幼樵之间的联络员，蔡孝乾跟洪都投降了，所以国民党也让蔡寄天自新。蔡寄天和张伯哲可能是同乡，或者组织上常会接近，知道他家的地址。我在绿岛时，因成绩不好被

迫写文章登在壁报上，蔡寄天曾经在新生训导处编壁报，有一次他在壁报上看到我的文章，偷偷跟我讲，要我在文章中不要随便暴露思想，免得引起别人怀疑。蔡寄天后来改名为蔡丹冶，专门研究中共文艺理论。（吕正惠按：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在一次大型研讨会的休息时间，蔡丹冶主动来找我聊天——我看过他的书，知道他——他说，我这篇论文比较有民族主义色彩。听了陈先生的话，我才知道他原来是地下党的人。）

“解严”以后，有人回大陆探亲，特别跑到张伯哲家，跟他们家人讲张伯哲牺牲的经过，因为这个原因，张伯哲被大陆追认为烈士。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叫作谢汉光，是张伯哲所服务的“鱼池林业试验所”的所长，是由张伯哲吸收入党的。台中地区地下党被破后，张伯哲通知谢汉光赶快离开。谢汉光逃难到台东县山地后，刚好有一个少数民族往生，他就用少数民族那张身份证躲过三十多年的“戒严”恐怖。谢汉光在大陆结婚九天后就来台，他夫人生了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又给他生了三个孙子。

我看到冯锦辉、钟浩东、张伯哲临刑前的勇敢与坚定，他们的影子一直留在我脑海中，让我下定决心，要跟着他们的路走下去。我一直记得张伯哲跟我的谈话，这是我在“军法处”牢房最大的收获。

三个外省人

在二十房，我见过三个外省人，印象很深刻，到现在还记得。有一个人，是属于搞情报的“洪国式案”的人，来台之前见过毛泽东和刘少奇，后来被枪决了。他曾跟我讲，毛泽东对他们很亲切，像好好先生，刘少奇看起来很严厉，对他们一个一个追问，什么事情都不放过。他认为，是因为刘少奇在白区领导地下工作，毛泽东没有这种经验，所以做事风格不一样。

还有一个“中央政治学校”（现在的政治大学）毕业的，南京人，跟着部队来台湾，负责打电报。他的一个同学是共产党，让他给对岸发电报，他拒绝了，但没有检举，后来被牵涉进来。那时的行情，“知情不报”一般是判七年，他以为自己会判七年，结果有一天竟然叫到他的名字，要叫出去枪毙了。他整个人呆了一阵，然后说：“我不相信！”又再说：“我不相信。”他走出牢房时，长叹了一口气，说：“啊——算了。”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判决书上写着：“‘中央政治学校’的校长是蒋委员长，你是他学生，竟然不检举共产党！”

另有一个叫刘鸣钟。日本投降时候，英国送了一艘军舰（太平舰）给中国政府，国民党战败，要撤退来台时，蒋介石是准备坐这艘船来台湾的，却由于该船向共产党投降（起义），让老蒋没坐成。刘鸣钟是去英国参加接收的。但内战后他当逃兵，带太太来台湾。有个同事问他，太平舰的装备如何？他就说了。那同事后来被抓，供出他。刘鸣钟想，这也没什么，我又不是共产党。后来他看到“中央政治学校”那个人因“知情不报”被枪毙了，就跟我说：“看这样，我大概也要被枪毙的。你们是共产党，要被枪毙时都会喊‘共产党万岁’，我不是共产党，不能喊‘共产党万岁’，但也不能喊‘国民党万岁’啊——国民党都要枪毙我了。我喊什么呢？”他想了一下，就说：“我要喊：‘刘鸣钟二十七岁！’”枪毙那天，看守进来叫：“刘鸣钟！”我的名字的读音跟他很相近，又睡在旁边，我和他同时坐了起来。我以为叫“陈明忠”嘛。我们俩都坐着，互相看着对方。看守放慢速度，又喊了一遍“刘——鸣——钟”，他就出去了。但他太紧张了，“刘鸣钟二十七岁”，忘记喊了。

越狱与逃亡

我在二十房，听到一些越狱与逃亡的事。有一个台湾医生也是“洪国式案”的，是黄顺兴太太邱瑞穗女士结婚前在日本的男朋友（江德兴）。有一天早上，他把一条毛巾弄湿了搭在脖子上，和另一个人抬马桶去倒。倒马桶的地方在围墙边，上面有铁丝网。倒了马桶，他把毛巾往上一甩，缠住铁丝网，马桶倒扣过来，踩上去，就翻墙过去了。但他跳下来时脚摔伤了，还是被抓了回来。

也有逃亡成功的。有个人叫林声发，胆子很大，洗澡时背了一个木梯，在院子里慢慢走，看守以为他是外役（有些普通案件的犯人，让他们做些牢里的事务，叫作外役，也可以到监狱外面出公差）。他不跑，慢慢走，没有人怀疑，到了围墙边，啪的一放，爬上木梯就跑掉了，但后来还是被抓回来。他逃亡了好几个月，跑到哪里都被追，亲戚有多少，警察都查得清清楚楚。有一次他去找一个亲戚拿钱，竟然被一个真正的外役看到，就喊：“共产党，共产党。”他就被抓回来了。

集体逃亡的，我知道的有两件，一件是吴思汉想干的。他是因台北市工委案件被抓的，他用肥皂做成牢门钥匙的模型，让太太送东西来监狱时偷偷拿回去，打成钥匙，再放到猪骨头里送进来。但他后来想，不对，如果开了门，逃出去了，我们台北的人熟悉环境，可以跑掉，可是很多中南部的人不行，被抓回来就是死，本来不会死的也会死。这么跑，会害死很多人，他就决定不逃了。

吴思汉后来被枪毙了。台北市工委案在当时影响很大，这一案的吴思汉、郭琇琮、许强都是很有名的医生，所以很轰动（蓝博洲把他们三人的事迹都写出来了）。枪毙前，在台北火车站前贴公告，那天早上，车子从“军法处”到马场町，很多人围在路边看。

再有一件是台南市工委案的。我们去“军法处”提审时，要经过一个碉堡。他们的计划是，第一批开门出去洗澡的人，用酱油瓶打倒看守，再从看守身上找出钥匙，把牢房的门都打开，大家一起冲向碉堡，向碉堡的看守丢石灰，让他们眼睛张不开。但第一批冲出去的人，用酱油瓶打看守的时候，没有把看守打昏，看守叫起来了，看守所的铁门

立即关上，其他人当然就出不去了。那些冲出去的人，后来有的被判死刑，其他人都加判四年（白色恐怖赔偿的时候，加判的几年不赔）。当时领导他们越狱的是郑海树，台南市工委的书记，是全国台联前副会长郭平坦先生的姐夫。虽然郑海树的岳父（郭平坦的父亲）是当时台南纺织界最重要的企业家之一（比当时新光集团老板吴火狮更为重要，在某一个纺织公司担任董事长，吴火狮是他的总经理），花了很多很多钱却救不了他女婿的命，只做到让郑海树在被处死之前，秘密地和家人（妻子和孩子）见了最后一面，而这使郭家开始走下坡路。

我从台中回到冈山时，是通过蔡仁雄和台南工委会联系上的（这件事前面已经谈过了）。我在狱中倒马桶碰到郑海树，他说："蔡仁雄自首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是案头。"我说："我没有承认参加共产党。"他说："我知道，我也没有讲到你。"我前面讲过，我曾带蔡仁雄去躲起来，蔡知道我被捕后，就出来自首，他也没有讲到我。自首的人什么都得讲，如果不讲，后来被发现了，就是死刑。我被捕一段时间，蔡没有被抓，蔡就判断我没有讲他。所以他后来自首时，也不讲我。说起来，大家都是胆子大，所以蔡很佩服我，他对我也真够朋友。那时候只要郑海树和蔡仁雄任何一个提到我，我恐怕就难逃一死（因为"二二八"我有被通缉的案底）。

在新店分所判刑确定

后来我被转到了新店分所。一般来说，送到新店的应该就不会死，留在"军法处"的大多会死，但有个例外是谢富。他本来已送到新店了，他就是被派到埔里通知谢雪红撤退的那个人，他原来是台中市委，做生意掩护身份，国民党不知道他是个重要人物。那时台中市工委被破坏，重要的人有洪幼樵、蔡寄天。蔡寄天是原台中女中的训导主任，是蔡孝乾和洪幼樵的联络员。蔡寄天自首了，后来成为有名的反共文艺理论家，改名蔡丹冶。

蔡寄天被审讯时，知道洪幼樵快要搭船出逃了，他撑着，预料那天船已经开走后，才供出洪幼樵，没想到因为台风，船没有走，洪幼樵就被捕了。洪幼樵被捕，讲出了谢富的事。谢富从新店调回"军法处"，被处决。

新店的牢房比较大，可以睡十五六个人，如果睡十五个人，马桶就放在角落。如果多来一个人，就把马桶放过道中间，角落就可睡人。有次新来一个人，是个乡下人，这房里有个流氓欺负他，不让他把马桶放中间，不给他地方睡。我看不过，就过去把马桶搬到中间，流氓大怒，跟我打起来。看守来了，说我煽动闹事，就把我调到隔壁，用绳子吊起来，只能踮脚尖站着。那间牢房有个鸦片案的犯人，他拿一床棉被垫在我脚下，这样我就能站立了。他又拿一双筷子，竹子做的，把竹子皮剥下来，削到很薄，插到手铐孔里，一下就打开了。那牢里关着不少鸦片案的人，对他们来说，最惨的是没有鸦片了，犯起瘾来没法子，一直哀号，眼泪鼻涕直流，有个人整整叫了几个礼拜。

我的案子就是在新店的时候判的。因为我始终没有承认参加共产党，而只承认参加了"社会革命党"，他们查来查去也查不到这个党还有什么人，刑求我又不承认，又找不到其他证据，最后就判我十年，理由是在他们"二二八"的黑名单上有我。宣判的时候，我说："我没有参加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啊。"法官说："'二二八'就有组织啊。"我说："蒋介石一九四九年撤退来的时候，不是宣布'二二八'不追究吗？"法官说："没有错，不追究才判你十年啊，如果要追究的话，你十条命都不够判，所以你要感谢当局的宽大。"

我们那个案是个杂案，把一些无法归类的人一起判。其中有一个叫辜金良，他很早就被抓了，但老是找不到他的证据，他也什么都没讲。他曾经几次因为别的案而被调问，但总找不出他跟这些案的关系。有一次他又被调问，法官说："怎么你又来了？"事回答："又不是我想来的。"最后，他被判十二年。其实，他跟张志忠关系密切，如果找到证据，是要判死刑的。我们有一次在绿岛打起来，我突然停手不打，他说："怎么不打了？"我说："你年纪比我大，我不能打你。"后来我们就成为好朋友。出狱后，我介绍他跟许金玉结婚，他们在屏东做咸鸭蛋，刚开始非常辛苦，后来就赚钱了，赚了不少。我第二次出狱，组织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和劳动党等团体，他非常支持，捐了很多钱。后来他中风，躺了几年才过世。蓝博洲访问过他，不晓得整理出来了没有，这个人是不能忘记的。（按：辜金良的口述已收录在蓝博洲著的《老红帽》［台北：南方家园，二〇一〇］里。）他的太太许金玉，也很了不起，好像有很多人访问过她了。

移送内湖小学

在新店正式判决后，按理我要被送到军人监狱，但军人监狱人满为患，我又被送回“军法处”。回到了一区十二房，碰到了中学同学岸本的舅舅蔡瑞钦。岸本就是受他两个舅舅影响，才会在雄中的时候就有民族意识，骂日本人。蔡瑞钦后来被枪毙，另一个舅舅蔡瑞洋，自首了。蔡瑞钦死前，写了一首日本和歌，大意是：太太带着孩子来看他，却不被允许见。是很伤感的歌。

再之后，我又被移送内湖小学，好像叫“新生总队”，是绿岛新生训导处的前身。一到五队是古宁头战役（金门战役）的俘虏。当时从“军法处”送到内湖小学的，编成六队。睡觉时，早上起来发现毛毯没盖到的小腿，全肿起来，后来才知道是被跳蚤咬的。星期天扫除时，我们就用水冲木床，跳出来几百只跳蚤，看得我直起鸡皮疙瘩。那里洗澡，是一个池子，洗过的水再倒回去，反复用，我不敢洗澡。

“新生总队”六队的犯人们很复杂，有判感训的，有判刑的。有十年以下，也有以上，性质不一样，思想也不统一，大部分不是共产党员，很难团结做什么事。

四队则最团结，最坚强，会抗议。他们都是判十年以上的人，其中有个叫陈行中的，他原来是孙立人部队管补给的上校，因为贪污，后来逃回湖南老家，买地置产。共产党来了，他带着地主去欢迎。共产党不能杀他，也不想用他，就送他去受训，派到台湾工作，却被同乡的吴雨村检举而被判十年。吴雨村是他家乡自卫队的队长，杀过不少人，他的同乡都很怕他，他在湖南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到台湾后，他们的老大做“交通部长”，后来老大死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失了势，三十多个人都被抓。吴雨村虽然检举了陈行中，但后来也被牵连进去，判了十年。

陈行中很会讲话，也有声望，因为他假装自己是共产党的干部，又确实被共产党训练过半年，知道共产党的方法。四队很多人进来是冤枉的，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所以听他一讲就很佩服他，跟他学习，四队的学习运动很热烈。

那时很多人莫名其妙被牵连，也有因为国民党内斗，进来后受不了刑求，就承认了。有次我听到一个吴雨村的同乡、同案说，他太太责备他："你明明不是共产党，为什么要承认？"那人回答："连吴雨村都承认了，我还能不承认吗？"有个在基隆做生意的余某某被抓，就把他一个朋友、"警备总部"姓马的中校供进来。因为这个姓马的，平常总吹牛说和蒋经国称兄道弟的，他想把姓马的牵进来，说不定就一起得救了。没想到姓马的进来，刑求吃不消，也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了。我在那里的时候，姓马的常常要揍那个姓余的生意人。

被捕的政治犯里，百分之四十是外省人，当时外省人人口只占台湾百分之十五。所以可以知道，白色恐怖是国民党因为意识形态，因为对共产党的恐惧，就对全民进行大清洗。

当时吴石案最轰动，因为他是"国防部"参谋次长。那时，大陆正准备攻打台湾，吴石把资料送给大陆派来的一个情报员朱谌之。朱谌之丈夫前妻的女婿是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朱谌之来台的住所就是女婿的家里。后来吴石、朱谌之、陈宝仓中将（第四兵站总监）、聂曦上校等人都被枪决了。

另外，共产党中央社会部的于非（原名朱芳春）和萧明华来台后，分别谋得《国语日报》编辑和省立师范学院（现在的台湾师范大学）助教的工作。于非利用"台湾省社会处"主办的"社会科学研究会"附设的"实用心理补习班"为基础，从事组织活动。后来他依照中央社会部命令改变工作路线，专力于情报策反工作，曾利用"国防部"作战课课长苏艺林上校取得台湾的防守地图、碉堡位置等重要军事机密情报。

苏艺林将这些资料装在皮包内，带着不知情的陆军大学上校教官张国维一起上于非要回大陆的船上，交换皮包后下船。案发后苏艺林被判死刑，不知情的张国维也被判五年（因为这个案子，"国防部"后来抓了很多人，台湾很多军事设施也因此修改了）。张国维曾因其所著《蒋介石的三角战术》一书，曾被蒋介石亲自召见，他不满被判刑，反复上诉，结果从五年改判十年、十五年，最后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后才不敢再上诉。

于非当时曾通过各种关系拟争取党、政、军高级人员如孙立人、游弥坚等人，据说当时他们虽未为于非所动，但亦未向当局检举，因而使

当局认为有“隐忧”。这些情形就可以说明，当时国民党为什么那么恐惧，宁可错杀一百，也不肯放过一个。所以，白色恐怖蒋介石真是痛下杀手。

蔡孝乾被捕时供出的地下党只有九百多个，再加上大陆潜伏过来的情报人员，被抓到的党员总共也不过一千三百多个，但据报载，整个白色恐怖期间国民党总共抓了十四到十五万人，枪毙了一万多人，冤枉的人实在太多了，这是国民党在发泄怨气。但是监牢里的人看着那么多人在枪毙前喊着“共产党万岁”，确实受到很大的震动。

来到绿岛

一九五一年绿岛的“新生训导处”成立，可以疏散台北人满为患的监狱了。我在内湖待了大约两个星期后被移送绿岛。据说第一批政治犯抵达绿岛是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七日。我们从基隆坐登陆船去，我们犯人坐在船舱下，和煤、货物一起。小便、大便也都在里面。很多人晕船，一直吐。环境非常恶劣，如果是猪，恐怕都会死掉，我们却活下来，到了绿岛。被捕、审讯、刑求、押送，整个过程，大家都吃尽了苦头，但人的生命力是惊人的。记得在“保密局”，有个受了枪伤的人，大概快死了，被扔在走廊里，他躺在那儿，自己伸手到化脓的伤口里捏蛆虫。

绿岛上本来就住有老百姓，“新生训导处”其实就是政治犯的集中营。开始时有两个大队，第一大队有四个中队，第二大队有三个中队，加一个女生分队，第三大队后来由南日岛的俘虏所构成。补给船三个月来一次，送粮食和煤炭，我们犯人就从港口抬到监狱。吃得很坏，没有青菜，馒头很硬，因为面粉太差，发酵不够。有时我们就吃做酱油的黑豆——晒干了吃，还有咸菜干。这些东西吃到胃痛。原本我的胃在日据时代当学生兵时就开始坏了，在彰化宪兵处灌水刑求，搞得更坏。这时就开始胃溃疡，吐血。伙食太差，犯人们抗议，要求改善。队长就说，我们队的钱由特务长借给人家了，但借给谁忘记了，特务长薪水不多，请大家原谅他。其实是伙食军官贪污。那时鱼很便宜，五毛钱一斤，也不给我们吃。［吕正惠按：本章提到张伯哲被大陆追认为烈士（一九九六年），陈先生原来不太清楚原因，后来看到汕头陈仲豪老先生的文章，才完全了解。陈仲豪先生是张伯哲在韩山师范读书时的同学，经由张伯哲的安排，到钟浩东领导下的基隆中学教书。基隆中学案爆发时，又经由张伯哲的安排逃回大陆。他写了两篇文章：《五十年代台湾白色恐怖六十周年祭》，回忆了跟他共事过的钟浩东、林英杰、张奕明、张伯哲等人；《六张犁魂兮归来——深切悼念在台湾殉难的张伯哲烈士》，详述了张伯哲的一生，以及他被追认为烈士的经过。我们要特别向陈仲豪先生表示谢意。又，本章所提到的萧明华，是台静农先生抗战时期在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教过的学生，一九四八年来台。她被枪毙后三十多年，台先生曾经写诗悼念：《过青年公园（日据马场町刑场）》“荒木交阴怪鸟喧，行人指说是公园。忽惊三十年前事，秋雨秋风壮士魂。”关于于非和萧明华的

事，香港的许礼平先生写过一篇文章《秋雨秋风壮士魂——台静农诗句笺注》详细考订过。]

07 在绿岛

劳役

绿岛监狱取名“新生训导处”，意思是“训导”我们，让我们获得“新生”。其手段，除了政治学习，就是劳役。例如在海边挖石头，这是为了修监狱的围墙。我心想，自己做围墙关自己，没道理，我就偷懒。在绿岛，我用到了在关东军老兵那里学会的无赖求生法，能不做就不做。比如上山砍茅秆，因为绿岛风大，无法种菜，砍茅秆来做防风篱笆，好种菜。队长规定，每人每次要砍五十根两米以上的茅秆，完成这个工作量，验收时赏一根香烟。我就选那些跟我一样营养不良、长得很细的，但长度够两米的五十根，这样，重量不大，很轻松就背下山来。验收的分队长看了，说：“老天爷！”但还是给了我一根香烟。

六队这些负责看管我们的军官，待犯人不算很坏。他们是西北军系统的，蒋介石不把他们当一回事，驻守绿岛等于发配，也是没什么前途的。后来，有的人砍的茅秆里有不够两米的，捆成一捆时，就前端对齐，想蒙混过关，被发现了。有人问：“谁干的？”分队长就说：“一定是陈明忠！”又说：“那个家伙，将来生下孩子没屁眼！”我不高兴，找他理论，他就宣布：“大家听着，我刚才讲生孩子没屁眼的，不是说陈明忠！”大家听了哈哈大笑。

有阵子发起打苍蝇运动，规定一个人要交五十只苍蝇。内湖跳蚤多得吓人，但在绿岛就活不了，大概因为海风太大。这里虽然有很多苍蝇，但不好打。有人用鱼内脏养苍蝇，很容易就抓到五十只。我把饭粒用墨水染黑，晾干，冒充苍蝇上交。两次都蒙骗过了，第三次被查出来。队长说：“奇怪，怎么都没看到陈明忠在抓苍蝇，就交上来了？”仔细一查，就被发现了。

重体力活，比如挑煤，三十公斤、四十公斤地增加。肩头磨得起泡，有的人就把衣服垫在肩上扛。农民还好，知识分子吃不消，要抵抗，商议集体不抬规定重量的煤，受处罚也不抬。当希望表现好的人，争先装五六十公斤后，不想按规定装四十公斤的人就没人敢出去装。于是我就带头去装不足三十公斤的煤，比规定少十公斤左右。队上对我

的处分是大家吃饭休息时，罚我挑不足四十公斤的队上厕所的大便，或者挑水。

这还不算严重。后来，朝鲜战争的“反共义士”来到台湾，新生训导处就搞“良心救国运动”，鼓动大家表态参加。我们不干。队里开了一个会，让参加的站一边，不参加的站另一边，我第一个站出来，到不参加的那一边去。原来只是调皮捣蛋，现在变成政治上有问题，严重了，所以后来硬把我扯进所谓的暴动中。

南日岛俘虏与两场暴动

一九五二年十月，国民党袭击莆田的南日岛，带着八百多解放军俘虏回到台湾。先在新店军人监狱把军官统统枪毙，兵就送到了绿岛，编入第三大队。那些被枪毙了的，新店监狱的人还把肝拿去当地的面馆，让卖面的给煮了吃。卖面的煮的时候觉得奇怪，这也不是猪的，不是狗的，是什么呢？后来知道了是人的，卖面的人把锅都扔了。

那时南日岛的俘虏跟我们一起政治学习，有“三民主义”“共匪暴行”“国父遗教”“领袖言行”等。教官讲“共匪暴行”，说“共匪”部队有慰安妇，那些南日岛的俘虏立即说：“没有。”教官说：“报纸上写的。”他们说：“我们从那儿来的，我们知道啊！金门部队有慰安妇，你们国民党有，我们没有。”

教官很恼火，不让他们上课了，但他们很想读报纸，想了解情况。我们六队有个叫陈澄诠的，被捕前是造纸厂工人，他对我说，他们（南日岛的俘虏）想看报纸，我们就商量怎么传递报纸前几版的“国际形势”给他们。那时大家要上山劳动，上山后分散，可以趁那时给他们。我当时编入第九班，是成绩不好的班，班长是个海军军官，最会打小报告的。副班长大家选我，狱方不让我当，但没人肯当，只好给我当。陈澄诠在山上传递报纸，班长看到了，就去告密。晚点名时，就把他叫出来，关碉堡。碉堡在海边，是关禁闭的地方，空间狭小，马桶的蛆虫爬满地，没法躺下来睡觉。

陈澄诠被抓，被刑求，要他承认组织暴动，还要他供出参加的人。他最后承认“暴动”，但说，陈明忠只是知情，没有正式参加。除了他，还抓了好几个人。其实哪里有“暴动”，是想把我们这些“成绩不好”、不听话的政治犯抓起来，找个名目枪毙。

那些南日岛的俘虏是真的要暴动的。军官都死了，他们只是普通的兵，但他们毕竟是军人，知道碉堡在哪里，机关枪在哪里，他们策划怎么攻击、怎么分配任务等等。那时每三个月补给船从台东开来一次，他们计划抢船，抢成功就跑回大陆，不行就上岸在台湾打游击。但因为台风来，船没靠岸，他们的暴动失败了，有些人在绿岛就被枪毙了。

后来来了一个技术总队，开始我们不晓得为什么派来这个总队，后来才知道因为南日岛俘虏暴动，他们被派来绿岛防备。这个总队的人，大多三十多岁，都是军官，带自动武器。从大陆撤退时安爆破装置的，就是他们。

我们这批被认为想“暴动”的政治犯，被送回台湾“军法处”第三区楼上，这里是关死刑犯人的。我们对面就是南日岛那些俘虏，有几个还同过房间。他们都会看字，我说：“你们小学都没念，怎么会看书？”他们说：“在部队里学的。”其中有个福州人，叫陈品官，问他为什么参加共产党，他说他是佃农，家里很穷，跟地主借贷，还不起，妈妈自杀了，妹妹卖掉了。后来共产党来了，分了土地，他当然支持共产党。“如果国民党又来了，我们就完了。”所以一要打仗，他就参加了部队。有个山东的俘虏说：“大家都参加，我不好意思不参加。”

七月一日，大家想，反正要死了，我们就一起唱歌，唱“国歌”，唱五星红旗歌。后来南日岛的俘虏，大概有一百多人，都被枪毙了。而我们这批被制造出来的暴动犯，却没有死。

我们中间有个人，被抓时是台大哲学系四年级的学生，叫张坤修，在绿岛刑求时手都残废了。我们从绿岛被送回台北时，都捆绑着，坐了十几个小时的船，先在高雄上岸，再坐卡车去火车站。这个学生的父亲张武是开医院的，恰好医院的药剂师在码头看到他，赶紧跑去通知张武。张武跑过来，但不能见面，张坤修偷偷把残废的手让爸爸看到。他爸爸回去后，立刻把自己的医院卖给医师公会的理事长吴基福（吴后来选“立委”，又办《台湾时报》），请他救儿子。吴基福有人脉，帮忙奔走，这个学生没判死刑，我们这批人也都跟着免了死刑，没有枪毙，真是幸运。

我们从“军法处”送到新店军人监狱时，南日岛的兵还没被枪毙，看到我们要离开，头伸出来，跟我们打招呼，不久他们都被枪毙了。大陆恐怕都不知道他们在台湾的遭遇，所以我特别把这件事讲出来。在“军法处”不能看报纸，我不能确定这事件的时间，但记得那时候正好是前国民党省党部主任李友邦被枪决的前后，算起来，应该是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前后。

被当成“暴动”组织者之一的陈澄诠被刑求得很厉害，从绿岛出来后，就没有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在监狱上大学

绿岛的政治犯有一些确实参加了地下组织，但大家的政治认识还很浅薄，还有很多人莫名其妙被抓，根本是冤枉的，国民党、共产党、毛泽东，什么都不知道，当然更不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东西。大家都想要了解，学习的热情就起来了，监狱成了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所以出狱之后，大家来往，互相称"老同学"。我也是在狱中，开始真正研读马克思主义的。

狱中本来就有政治学习的课，有"领袖言行""毛泽东思想批判""共匪暴行"等。叶青的《毛泽东思想批判》是我们的主要教材。叶青本名任卓宣，是个投降的共产党员，《郑超麟回忆录》里提到过他。这本书常常大段大段地引述毛泽东的话，我们只读这些话，不读叶青的批判，我们就这样学习共产主义思想。我还记得，叶青说过，毛泽东是真正的理论家，王明不是，是教条主义者。还说，毛泽东的理论是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般道理，和中国的特殊情况融合起来的，任卓宣的这种提法让我对毛泽东思想产生了很大兴趣。

绿岛有给管理员看书的图书馆，里面有共产党的小册子，如《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等，有人就偷出来，传着看。记得有次看到任弼时的文章，批评解放后很多大官休掉原来的太太，讨年轻漂亮的老婆。记得他文章里大概说过这样的话："我结婚是父母定的，太太不识字，又裹小脚，现在眼睛又瞎了，可是她还是我的太太，我没有换太太。"我觉得任弼时这个人不错。其他很多偷出来的书，我都看过。

有个台大的学生抓进来时，带进来一本书，是日本左派战后成立的"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出版的，这个协会出版了很多书，都是有关自然科学的。日本第一个拿到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就是这其中的一人，另有一人坂田昌一曾经到大陆去给毛泽东讲辩证法。台大学生带进来的这本，是井尻正二写的《古生物学概论》。看名字，古生物学，没问题，检查通过，其实里面讲的是唯物论的辩证法。概论是方法论，没有用辩证法这个词，用的是"连续的不连续"这个概念。事物发展有联系，也有分断（即不连续），等于辩证法里的扬弃。还讲"范畴"，如可能性与现实性、必然性与偶然性、本质与现象、量与质等。从这本书得到线索，我就买来了这个协会出版的《物理入门》《化学入门》

《自然科学辞典》等。从这几本书我学到很多东西，例如从可能性到现实性，有好多契机，契机的每一个叫作偶然性，合起来就是必然性。死是必然的，死的各种原因就是偶然。我就这样学到了辩证法的概念。

后来在新店军人监狱，买到一本《生命的起源》，苏联科学家欧巴林写的。传看时，好多人说看不懂，我看得懂，因为化学的内容很多，我念过化学，所以看得懂。达尔文讲了进化论，但是生命怎么来的，达尔文没有解释。这本书讲生命怎么来的，无机物变成有机物，变成蛋白质，变成生命，完全是辩证法，但一句也没提"辩证法"。我又从这里学到辩证法。

对我的理论学习帮助很大的还有英国的M. Dobb所著的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我们是用十倍的价钱委托新店军人监狱的"军事犯"买进来的。我很认真地读了三四次，终于了解资本主义是如何由封建主义演进过来的。例如进入大机器工厂时代之前，必须经过工场手工业时代，这让我想到我们家的榻榻米工厂，就是用木头机器，是工场手工业阶段。还有，封建主义要进入资本主义，都有一个代表性工业的发展，英国是羊毛，日本是丝。可是日本丝业没有工场手工业时代，它是通过批发商，批发商把原料给小家庭作坊，然后再来收成品。这本书和《古生物学概论》《生命的起源》等，教我如何思考问题，看问题，也坚定了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信心。

我在绿岛时才慢慢学了国语。同牢的外省人，还有"政治学习"时干事讲的国语，开始都听不懂，后来听久了，慢慢也开始听懂了。"筷子"这个词，我在牢里第一次听到，"哦，这个叫筷子哦"。光复后我已经读大学，没有国语课了，被关了才开始学国语。外省人是从各地来的，发音都不一样，很伤脑筋，所以我国语比较差。我闽南语讲得比较好，其次是日语，最后才是普通话。

狱中的派系

很多人被点燃了学习共产主义的热情，在政治学习课上，利用各种教材，偷偷抄写毛泽东的文章，藏到牢房里。有次狱方利用犯人出去放风的时间，来查房，查到了这些纸条，就加了一个“暴动”的名义，枪毙了很多人。当时第四队的学习最热烈，结果被枪毙的最多。带头的叫陈行中，前面已经讲过他们，他们在上绿岛前和在绿岛时就已认真学习了。虽然这么多人被枪毙了，但还是有人继续抄。譬如我们这一批所谓的暴动犯，调到新店军人监狱后，就有人在抄，抄完了藏在哪里？洗手间的便池，前面有盖子，把盖子下面的水泥地挖空，把毛泽东理论藏进去。

这样热情地学习，学习过程中，见解不同，就开始分派了，有极左派和修正主义派。极左派比较敢做，原本一无所知，坐牢了才了解共产主义，就比较激进，知识水准高的人不会那么简单。极左派人不多，但什么都斗争，就把大家都拖进去，很伤脑筋。比如上政治课，教官发书，他不要，甩掉，那第二个人也不好要了。于是整个房间都跟着受罚：禁止放风，禁止接见。所以十年间我妈妈两次来看我，都没有见到。来了都见不到，让她很伤心，不再来了。

还记得讨论《武训传》。为什么批判武训？极左派的人就说：不应该做乞丐，应该去抢啊。其实批判《武训传》，是批判它教的内容是封建的。还有，国民党宣传说，共产党的思想基础是恨，国民党的思想基础是爱。他们听了说：“对啊。”我说：“不对。这是一对的东西，爱恨一体。不是说共产党的基础就是恨。只有恨，怎么会有理想。”还有吃东西的斗争。狱里是早上十点一顿饭，下午四点一顿。一般下午四点吃不多，剩下的，狱方就拿去卖，赚钱。这些极左派说要消灭国民党的力量，就把饭盛很多，倒到粪坑里。其实，这只会影响监狱官兵的福利，不可能消灭国民党的力量，是很幼稚的想法。

还有“打入敌人内部”的斗争。狱方会在每个房间收买打小报告的人，极左派就想利用这个机会，将计就计，打入敌人内部。有一次让一个叫颜大树的——他台中工业学校毕业后，读军官学校——去做卧底，在监狱广播室工作。别的人都骂他，不知道他是卧底。我们房间比较安全，没有打小报告的人，就作为联络站。我们厕所旁边有个洞，颜

大树把一些消息写在纸条上，通过这个洞传进来。什么消息呢？比如，有个犯人进来前是工厂老板，看到监狱里有工厂，就想去做外役厂长，为了这个目的打别人的小报告，颜大树知道了，用纸条告诉我们。后来颜大树身份暴露，被调回来。不过，在还没被调回来之前，极左派拼命替他讲话。真是莫名其妙嘛，现在不应该替他讲话，这等于害他嘛。

他们商议再找个人打进敌人内部，选出陈俊堂，他是我农学院的学弟，判十二年，让他打进去。那让他打谁的小报告呢？打石沧柏的吧，石答应了。小报告怎么打？那时睡觉，是轮流睡牢门的栏杆边。轮到打小报告的人睡栏杆边了，晚上看守来，把小条子扔下去，看守捡起来。后来石沧柏一直被狱方叫过去问话，很害怕，最后发神经了。要知道，有的被打小报告的，问出问题，就调出去枪毙了。

当时我就反对这种打入敌人内部的"斗争"。监狱保安对我们能怎样？最坏的情况不过如此。打进去有什么意思？是白白牺牲，这个牺牲没有价值。我反对他们这么做，但我肯定他们的热忱和勇敢，只是脑子太简单了。除了这些，他们还要打击那些不主张"斗争"的，一般是比较有知识、想得多的人。蔡惠如的孙子蔡意诚，就被他们打成修正主义，搞到大家在一个房间，好几年不讲话。

这也可以说明当时政治犯普遍认识水准比较低，高的都被枪毙了，不像一九三〇年代，日本人抓台共，他们在牢里还可以互相学习。一九五〇年代的牢里，活下来的属罪行轻的，其实很多人根本是冤枉的，一点也不知道共产党和马克思什么的。

极左派为此牺牲很多。第一批因为抄毛泽东文章，枪毙二三十个，也有许多人被加判感训三年。我不赞成极左派的想法，但我有事敢出头，所以他们信任我，觉得我立场坚定。修正主义这边，理论水准高，但胆子比较小，不敢有什么行动，他们觉得我理论水准高，又不极端，也接受我，所以两边都信任我。

08 在新店军人监狱

我在监牢里的“特殊待遇”

新店军人监狱用来关政治犯的地方有仁监和智监。仁监的看守长似乎是虐待狂。他点名：“754！”“有！”“声音太小，出来。”“755！”“有！”“声音太大了，出来。”他把两个人用脚链连起来，左脚连左脚，让他们无法走路。大家看着，都很气。有一天，他又叫了一个人（那人现在还在，是嘉义农校毕业的陈棠梨），吊起来打，手吊在铁栏杆上，打他的肚子。陈棠梨大叫了一声，看守就从地上捡起一块抹布塞在他的嘴巴里。这个虐待狂，我忍了很久了！我在第一个房间直接看到，就用脚拍打地板，其他牢里的人听到，就跟着闹房，整片都打起来，砰砰砰，又大声喊。狱方吓坏了，以为是暴动。每个房间都有打小报告的，有个政战部的少校就打我小报告，因此，我就被调到智监。

监狱是这样安排的：成绩好、听话的住在前半部，后半部就关一些成绩坏、不听话的。我被调到智监十一房，此后一直在那里。监狱里很多外省人很可怜，没家，没人送东西，连卫生纸、牙刷都没有。我们有家人送吃的来，他们只有监狱的咸菜。我们在旁边看着，吃不下去，就叫大家一起来吃。把各自家里送来的东西汇集起来，一起吃用。后来大陆开始搞人民公社，监狱里就说我们发动搞人民公社。

在绿岛时，因为过度劳动，营养不良，我的身体已经开始坏了，但我没有介意。转移到军人监狱以后，咳嗽会咳出血。同房的廖万督是医生，他看我到了下午就会脸红、发烧，对我说：“明忠，你恐怕得了肺结核。”廖万督没坐牢之前，在云林县某一个卫生所当所长时，推行过一种合作医疗，让农民一年缴一点钱，整年看病都不用付费，地下党廖清缠就吸收了廖万督。廖万督在狱里骂廖清缠说：“你吸收我，但没有教我！”因为廖清缠那时候的理论水平也不见得很高，剩余价值有相对的和绝对的，他就不明白，跑来问我。所以廖万督佩服我，以为我懂理论。

第二次咳血时，我去看病。狱医一个礼拜来一次，问我："什么症状？"我说："吐血，有时在痰里，有时直接吐血。"狱医又问："还有其他症状吗？"我说："下午发烧。"他又问："还有吗？"我说："肩膀会酸痛。"最后他说："不够资格就医，回去！"不但不给药，也不让家里寄药。我们这样的政治犯，监狱就是要让你死掉的。所以虽然肺结核会传染，应该隔离的，仍然把我和别人关在一起。

又一次，我头痛得不得了，去看病，他说："不要胡思乱想。"我很气，骂他："兽医！"他报告看守长，我就被关了禁闭。在禁闭室里，我被铐上手铐和脚镣，然后又把手铐和脚镣连起来，让你没办法站直，也没有办法躺平。禁闭室很小，屋顶上还铺了沥青，热得要命。我只穿一条内裤，从早上太阳出来就开始流汗，一直流到晚上太阳下山，这样受了一期三个月的惩罚。因为上手铐脚镣，又没法站起来，看守很好奇，到底我们要怎样换内裤呢？有一天，他特地跑来看，看我这样那样挪，竟然换好了，他才恍然大悟，说："原来如此。"

“发神经”的难友

旁边的禁闭室关了一个外省人，叫作陈永生，是金陵大学的毕业生，来台湾在高雄女中教英语。学校有朝会，让老师轮流讲，轮到他时，他讲“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结果就被抓了。审判时，他说：“这句话是国父《三民主义》里讲的啊！”法官说：“现在，政策比主义重要。”就这样判了十年。在狱里，他的精神变得不正常，常常自言自语“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没有错啊！”有一天，他一紧张，突然喊：“斯大林万岁！”因此也被关禁闭，就关在我旁边。他肺病比我厉害，对我说：“明忠，看来我大概完了……可是也值得。”后来就死在监狱里。

狱中很多犯人得了神经病。其中有一个，把馒头用菜汤弄软，再捏成一个头像，第二天再捏一个，这样放了一个礼拜，味道已经很坏了。看守训斥：“你干什么？”他就吃掉。倒也没拉肚子。

放风时，有个得神经病的人，把自己所有东西包成一个包裹，拿在身上，说：“我不要在这里啊！我要回家。”还有人把邮票贴在脑门上，想走出去，被看守拦下来，就说：“我有贴邮票啊，把我寄回去。”还有人互相说：“哎，听说你有神经病啊！”那个说：“听说你也有啊！”有时他们叫我们唱歌，我们不唱，他们就说：“哎，看起来你们不爱国啊。”

监狱里的难友，在压力下出现精神错乱的情况，是常有的。在绿岛的新生训导处也一样。在绿岛时，我有一个同队、同班的叫作赖祖荫，他是前陆委会主委赖幸媛的伯父，被捕时是竹山小学的教务主任。赖祖荫被捕后，因为被刑求得太厉害，他想要自杀。当时台湾人都穿木屐，他把一只木屐垫在下面，把睾丸放在上面，用另一只木屐来砸，结果人晕倒了，睾丸却没敲碎，但从此不再讲话，变成哑巴。有天晚上，他忽然开口：“明天是我们的日子啊！”他就睡在我旁边。我奇怪，狱里没日历，几月几日我也不记得，他记得什么日子？第二天早上他就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原来是十月一日。我们就想，糟了，怎么办？因为不久前刚枪毙了一个。

那个人本来是国民党的军官，精神不正常了。抽烟，他捡我们的烟屁股抽，给他整支的，他不要。我们每个月吃一次猪肉，他不吃。他说："现在中国人民没有达到每个人都可以吃猪肉的地步，如果每个人可以吃到肉了，我就吃。"有天晚点名。点完了，值星队长跟大队长"报告完毕"，大队长回礼，要走了。他突然喊："大家听到！"大家都吓一跳，连大队长也停下了。他说："我以前杀人放火强奸什么都做，现在我改好了，为什么？因为我参加了共产党。希望大家好好研究共产主义，加入共产党。"结果就被调去"军法处"枪毙了。

负责思想问题的干事是东北人，很有个性，他叔叔是"满洲国"电影公司的演员，也坐牢。赖祖荫的事情一发生，这位干事就让大家投票：赖祖荫是不是神经病？如果是，就不移交"军法处"。结果大家投票说他是神经病，免了一死。出狱后，我还碰到过赖祖荫，他脑筋还没好，讲话会不连贯。赖幸媛一直以为她伯父是因为"二二八"坐牢，不过白色恐怖和"二二八"，好多人都搞不清楚，其实不是一回事。赖幸媛还说，她伯父家有毛泽东的照片。

赖祖荫的命被保了下来，也不一定是这位干事慈悲，如果是外省人，恐怕就直接枪毙了。外省人在台湾没根基、没亲戚。赖祖荫是本省人，在学校做过教务主任，日据时代读师范学校的，在地方上是有头有脸的人，国民党不敢随便枪毙。

其他难友

国民党“破获”的地下党案子里，有个阿里山基地案，是由张志忠和简吉（大众计算机简明仁的父亲）领导的。国共内战期间，共产党在江西、福建的根据地，曾经被国民党长期封锁，没有盐巴吃，人就没有力气，很痛苦。因此，他们就挖了一个大池子，大便小便都放进去，久了之后就有盐碱，可以用来做盐巴。因为这个经验，台湾的地下党人就设法在阿里山建一个酱油厂，盐巴就可以运进来，阿里山就可以做基地。阿里山住的是邹族人，地下党就跟他们的领袖联合。后来基地被破了，有关系的少数民族高一生、汤守仁、汪青山都被枪毙了，剩下一个判无期徒刑的武义德，他共产主义不知道，三民主义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但他是村长，酱油工厂就设在他村里，所以判无期。

新店军人监狱人满为患，一个房间睡很多人，地方不够，浴池上铺个板，晚上可以睡人。大家排两排睡，有些人个子高，睡觉时就得把脚垫高，才不会碰到别人。有时候晚上小便，会踩到人家。有个叫王任的，最好笑，踩了一个，喊对不起，再下脚，又踩另一人。

王任从上海过来，在成大读书。他在上海时搞学生运动，好像是民盟的。要抓他时，他跑到台湾成大。在成大跟着的老师是留德的，老师的爸爸是民主党派的一个领袖。大陆新中国成立后，老师的爸爸叫他回去，老师就打算带王任一道回去，因为王任是他的得意门生。可是，王任觉得再过三个月就毕业了，打算毕业再走，结果就被抓了。老师走了，他被牵连。本来判三年，他不服气，一上诉，“戒严令”出来了，糟糕，要撤回来不及了，结果就加，变成十年。王任在成大成绩很好，很聪明。在狱里，他一直在算人造卫星能不能成功，用微积分，算了好几天，结论说，可以。我们出狱后真的有了人造卫星。

他出狱后，在台中开了一家硫酸工厂，很多老同学去他那里工作。他后来娶了老婆，也是判五年徒刑的“老同学”。他在上海有个女朋友，后来在北京大学当教授。那个女朋友退休以后，写信来台湾托成大找他。成大很认真，找到他了。他还回大陆去见这个女朋友。

王任后来死在井冈山。台湾的“老同学”组团去老区，他是团长，拿花圈上祭时心脏病发作，就倒在阶梯上死掉了。年纪大了，太过劳累，心情又激动，就这样死了。

牢里抽香烟

我开始抽香烟是在农学院，因为研究烟草的金兵教授回大陆前，留给我很多很好的外国香烟。被捕后，“保密局”不可以抽，在“军法处”可以，因为谁会被判死刑都不清楚，很多人用西装跟看守或外役换香烟，反正要死了，要西装干什么。我在“军法处”第一次抽时，因为好久没有抽了，第一口，就吐出来了，呛了。

到了新店军人监狱，人是不会死了，香烟还是要抽，抽香烟，心情会好点，可以缓解苦闷和紧张，紧张之后一放松就想抽。监狱规定是不能抽的，家属也不能送。但我们可以跟外役换，用什么换呢？新店监狱每人每年配给两双布鞋，我们一天只放风散步十五分钟，鞋子穿不坏，剩下很多，用来换香烟。一双鞋子，只能换一包香烟。我们把一支香烟拆开，重新卷成好几支小的，抽烟的人一人一支。

有了烟，还需要打火机。有些鸦片贩子，会将棉花捻成条状，然后在地板上用木板摩擦棉花来点火。我们政治犯没有这个技术，那个技术不简单。后来想到用瓶盖，把瓶盖打平，挖两个洞，绳子穿进去，利用绳子的扭力，一拉就会转。然后一个人拿石头，一个人拉线，下面放着棉花，这样摩擦就点着了。后来又进步，从外役那儿弄来火石，牙刷上挖一个洞，把火石埋进去，用铁片刮，摩擦出火来点棉花。

抽烟时，怕看守来看到，就拿镜子轮流把风。把风的，有的比较差劲，笨，看守来到跟前了才喊：“来了！来了！”手上的镜子就被没收了。监狱统一换新棉袄，旧的要收回去的时候，我的棉袄一只胳膊都没棉花了，看守问：“这怎么回事？”我说：“拿到的时候就这样了。”——其实都点香烟了嘛。

免去小琉球

我在狱里的“成绩”不好，运气也就不好。母亲来看我的时候，我不是在关禁闭，就是在上脚镣。来了两次，都不让接见，以后就不来了。三姑妈的女儿在“空军总医院”做护士，她来见我，结果被调查，工作也丢了。姑妈的丈夫是上校医官，受到牵连，少将也升不了了。还有个冈山农校的同事来看我，也是被查，吓坏了。后来，就没人敢来见我了。

十年里，见到家人的次数很少。头两年关在绿岛，我爸爸当时在台东，就去绿岛看我。没想到刚好碰到那次被罗织“暴动”，送回台北。他到绿岛，没见着，还听说我组织暴动。后来我听妹妹说，他回家后躲在被子里哭，说：“坐牢了，还暴动！这是什么儿子呢？”他从来也搞不清这个儿子到底怎么回事。

刑期快满的时候，所有人都调回绿岛，我因为刑期届满所以留下来。我一直关在最坏的房间，一般来说，成绩坏的人，期满了也不给出狱，要送到小琉球继续劳动。我们这样的人一定会被送到小琉球的。有个难友叫陈天助的，先被送去小琉球，他看到那里劳动很厉害，就说陈明忠有肺结核，来了肯定会死。所以他跟一个要释放回家的流氓讲，请他带话给张倚融（同牢的难友）的家人，利用接见时告诉张，要他想办法不要让陈明忠被送去小琉球。（陈天助，坐牢八年。后来去了巴西。互助会开会的时候当着我的面，问：“陈明忠在哪里？”我说：“我是啊。”我以前很瘦，现在胖了，所以他认不出来。他在巴西被台湾同乡会选为委员，却被一些外省人拒绝，说如果他进去，他们就要退出同乡会。后来不知怎么知道他坐过牢，问他：“你反国民党啊？”他说：“没错，我是共产党。”那些人大吃一惊，后来对他很好。）

他们几个人商量这事，其中有个王子烽，哥哥是台中的大生意人，和国民党台中党部的主任很熟，这主任又是新店监狱政战部主任的同学。通过这样的关系，他们帮我去打点。这些我一点都不知道，没有人告诉我，大概是怕我反对。总之有一天，我被政战部主任叫去训话，他指着我的“成绩册”说：“这里是新店军人监狱，成绩七十分以上才能释放出去，你自己看看，四十七分！人家对你的报告这么多，怎

么能让你出去。”他就历数我被打的小报告（例如，对着报纸上的蒋公照片小便之类），总之很差。我不回答，随便你讲。后来他就说，如果回去，要改过自新，如何如何……听他的口气，好像要我回去啊！

回到押房，大家问我怎么样，我说奇怪。他们才告诉我，是陈天助让他们找人，怕我死在小琉球，他们通过王子烽偷偷运作。王子烽坐牢十年，因为刑求手残废了，出狱以后不再碰政治了。

出狱后，我进“中国新药”，是王子烽介绍的。我升得很快，他一直都是股长，没有升。后来我到“乖乖”做副厂长兼技术部主任，就把王子烽调过去，当科长。我第二次坐牢，他也被叫去问，审讯的人说：“你们一起坐牢，出来都在‘中国新药’，也一起去了‘乖乖’。以前你们都住三重，又都搬到和平东路二段七十六巷十七弄，你住二之五号，陈明忠住五之二号。你们能没有关系吗？”

其实我的政治活动他都不知道。我知道他不再碰政治了，所以什么都没有跟他讲。但二〇〇五年的时候，因为我劝连战去大陆，他怪我帮国民党，不和我讲话，后来了解真相后，又开始往来了。

09 我的一九六〇年代

出狱

一九六〇年我出狱了。到新店监狱办理户口，要在旅馆住一晚上。当晚睡在榻榻米上，手脚可以随意张开了，不像在监狱中要缩着身体睡觉，但很奇怪，竟然睡不着，只觉得身体怪怪的，不能适应。

爸爸和大姑妈领我回去，到冈山时候，看到一个女孩子迎面对我笑。我心想，这个女孩怎么三八兮兮，不认识对我笑什么。原来是我小妹丽玉，我被捕的时候她刚考进台南女中，坐牢十年，现在都不认得了。

那时我们家已经从五甲尾搬到冈山了。一九五〇年代开始实施"三七五减租"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地主家每户虽然可以保留两甲土地，但我家没人会耕作，只好把土地贱卖掉，妈妈带着弟弟和两个妹妹搬到冈山镇上住（爸爸早就搬出去和小老婆住了）。

出狱时我三十一岁，因为长期肺病，在监狱中完全没有受到照顾，从原来的六十五公斤变成四十三公斤，连老朋友都认不出来了。有一次在聚会上，一个很熟的朋友拉着我问："陈明忠在哪儿？"我说："就是我啊。"他好半天都不相信。

在旗山农校

政治犯出狱，找工作很难，社会上的人都避之唯恐不及。冈山是“空军训练司令部”所在地，蒋介石常去视察，每次他要来的前一天晚上，就会有情治人员半夜来我家敲门，搜查我房间。我想我恐怕得离开冈山了。

这时林渊源来了。他那时已经在高雄的旗山农校当校长，知道我出狱的消息，就跑来找我，知道我找事难，就让我去他学校教书。按说坐牢出来的人是不允许教书的。他跟情报机关的人说：“我有这么一个朋友，想请他来，可以吗？”情报机关的人知道林渊源是蒋经国要栽培的人，将来准备让他当高雄县长，就回答说：“你就假装不知道陈明忠坐过牢。”这样，我就到了旗山农校，在农产加工科教书。

当年在台中农学院读书时，林渊源是我的学弟，我们都是高雄县人，来往密切。有一次他生病开刀，我和另外一个朋友约好照顾他。那个朋友选择白天照看他，我就晚上照看他，晚上当然比白天辛苦，我没有讲话。后来那个朋友连白天也出去玩，我白天、晚上都照看他。林渊源觉得我很够朋友，一直对我很好。所以这一次出狱，他完全不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让我到他的学校教书。后来我第二次被捕，出狱后，他还是来看我，一点也不避讳。我们到现在一直有来往。（林渊源是高雄白派的领袖，王金平是他提拔的。后来他拥护宋楚瑜，始终不变心，是个极讲义气的人。）

我在旗山农校上课时候，情治机关的人会来听。林渊源跟他们做保证，他们才来得少了些。林渊源说：“陈明忠是政治犯，那是过去的事。他也要生活啊，他在我这里教书，保证与政治无涉，我负这个责任。”

学校的同事原来并不知道我坐过牢，那时候每周一要开周会，老师要轮流讲话。林渊源私下交代教务主任，不用让我讲话了。教务主任觉得奇怪，就悄悄问我。我就告诉他，我坐过牢，是政治犯。这样同宿舍的几个老师也知道了，恍然大悟说：“怪不得，我们早就觉得你很奇怪。”

虽然有林渊源保证，情治机关也没放松监视。我教书受学生欢迎，常有学生课余来宿舍，找我聊天。有天，有个特务来，故意说：“学生们跟你很要好啊。”我一听，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下去了。煽动学生，传播反动思想，那是大罪名，搞不好要连累很多人，我不能害了林渊源。

正在这个时候，坐牢的朋友王子烽来找我。他的亲戚在台北开了一家药厂，让我当化验员，当时对药厂按规定要实施品管，需要搞化学的人。我读的是农业化学，我就决定走了。在旗山农校不到一年，不得不离开。

在“中国新药”厂

这个药厂的来历是这样的：董事长原来是做进口药生意的，公司叫吉原行，生意很好。我记得当时治拉肚子的氯霉素针剂，一瓶二三十块，但后来两三块也可以卖，可见利润很厚。董事长赚了钱，就在日本开东菱制药厂，在台湾也投资了很多企业。“中国新药”厂就是其中之一，打算在台湾本地生产药品，这样成本更低。他把这个草创的药厂交给他的弟弟来做总经理，他是张克辉的同学。厂长是总经理的表弟，也是我农学院的学弟。

当时台湾卖进口抗生素很贵，如果在本地做，成本很低，所以许多本地药厂兴起了。美国就要管控，要台湾当局“卫生署”执行质量管理，上面有个美援会的工矿小组负责这件事。因此，药厂需要专业的化验员，我就是这样被请来的。

这个厂是家族企业，总经理和厂长找的都是自己的亲戚朋友。那些人虽然是农学院毕业的，但学的是畜牧、森林等科系，其实是外行。他需要学化学的，王子烽推荐了我，他就去查农学院的档案，一查我是农化系，光复后第二期第一名毕业——但思想有问题。他就说：“我们对国民党也不满意啊，但我们是做生意的，以后不要过问政治，只要你保证不再搞政治，我们就请你。”我当然答应。

总经理跟我讲话的时候，副总经理在旁边看。他会看相，之后对我朋友王子烽说：“他个性很强啊，会不会发生问题？”王子烽说：“不会啦，工作嘛，他会认真的。”于是我就开始到药厂做化验员了。药厂草创，很简陋，在一个破旧的小三合院里。我就睡在走廊上，摆张行军床。

我进去才发现，如今化学已经大大进步了。以前化验用化学天平，重量法，容量法，都是用滴管，由手工来做，现在都是用机器分析了。工厂从美国买了机器，一台 Spectrophotometer机器十几万，是我一百个月的薪水。我不知道怎样用，怕弄坏了。虽然有说明书，但我看不懂。何况，我不知道原料用得对不对。实验方法是怎样的呢？也都不知道。没办法，重新开始学，从原理开始。

进到药厂不久，就派我去培训，这是实行药品管制的规定，厂里的化验员不培训，就不能开药厂。培训地点是在台大医学院。伤脑筋的是，好多英语都听不懂。比如胶囊capsule，我读的是“力了"七儿”(kapuseru)。我在农学院学的英语，都是用日本方法读的，现在讲课的老师是留美的，发音全不一样了。那时参加培训的人很多是光复后才进大学的，而我是日据时代学的英文，几乎完全听不懂，不得不努力追赶，拼命地学。这样受训三个月，结训考试，我是第二名。前三名要派到美国去继续受训，但我有政治犯履历，不能去。厂里派的其他受训的人，根本没考上名次。

我们厂的目标是成为甲级药厂，但我们的设备是丙级的。总之，对我和工厂来说，都是从零开始。头两三年，我早上六点就起来，常常看书看到十二点才睡。搬药瓶、送药的体力活儿我也干。

那几年，真是非常用功，很累。放松的方式，就是每隔两三个月，去台北看电影。从树林坐火车去台北，我买了面包进戏院，连着看三场。当时日本的电影还可以进来。我喜欢看打仗的，谈恋爱的就没有兴趣，觉得啰里吧唆。打仗的速度就很快，反正是给脑子休息一下。那一阵子我其实过得很苦，但要吃饭，就要做事。如果在药厂不能站稳，就麻烦了。

有一次，我们卖抗生素软膏给军队，“卫生署”试验所检验不合格。这是我自己化验的，我知道没有错，就到卫生试验所去沟通。我了解化验的方法大家都一样，问题在于，金霉素要抽出来化验，是要用乙醚来抽的。乙醚用的是小瓶还是大桶，结果就不一样了。如果是用大桶，氧化之后，会影响分析结果。我问他们，他们是用大桶，那一定会有问题。我要“卫生署”试验所那个化验员重做，他不肯。他做这个工作也好几年了，有自信，但我也有自信啊，两人就吵了起来。科长出来了，息事宁人，让他按照我说的试一次。结果出来后，果然我说得对。试验员没有话讲了，以后对我的事他就不大敢找麻烦。

大概是我进厂的第三年，美援会工矿小组到各厂临时抽查，随便拿一份我们的药品，要查质检资料，我都做得很好，每一种药品我都可以提供相关资料。抽查结果我们做得最好，新闻对“中国新药”厂做了特别报道。

“卫生署”试验所是台湾最高的药品检查机关，美援会工矿小组是外国权威，两边都肯定我，几年的辛苦终于有了成效，我在药厂的信誉也就建立起来了。我在旗山农校教书时，月薪是九百元；进工厂时当化验员，月薪一千二百元；一九六五年升质量管理科长，两千八百元。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敢结婚。

结婚后，生活比较稳定，我还不断向外学习，又有了新的想法：做质量管理，是要用钱的，不是赚钱的。对公司来讲质量管理成熟了，内外都肯定了，就要研制开发新药。新药品质不好，会被退回。我因此就先研究为什么会质量不好，把原因找出来，加以改良。这样就更往上升迁，先调制造科长，再调副厂长，监管质量管理和制造。

当了“中国新药”厂的厂长

因为我的工作成绩，总经理要我当厂长，我不想接。这是个家族企业啊，我和他们的人没有关系，人事上没法管。老板的哥哥也来工作，什么都不懂，只好让他管仓库。有次我们做的口服液，成品有一千个，后来只剩下九百多个，因为老板的哥哥管仓库，他觉得是营养品，就偷吃了，别人跟着偷吃。这个我怎么管！我跟总经理讲：“你给他钱就好了，不要让他来上班，我不好管啊。”

董事长是大老板，有很多企业，包括建筑材料、摩托车工厂，最重要的还有东菱电子，“中国新药”厂只是其中之一，而总经理就是他弟弟。这种家族式经营潜在的弊端很多，慢慢会拖垮企业。（后来东菱电子倒闭，负债二十多亿。）

我有时候跟总经理抗议，日本人看了很奇怪，因为日本的企业下级是不敢向上级抗议的。总经理有一次对我说：“我用过的人有两三千个，没有一个像你爬得这么快！”我回答说：“也没有人像我这么认真做！”总之这种家族企业，一个外人当厂长是很难的。我又坐过牢，是政治犯，一定会被人攻击。那时就有嫉妒的人偷偷打报告，说我在厂里散播反动思想。

总经理一定要我做厂长，我就讲条件。第一，不能因为女工结婚，就把她裁掉。当时的女工，是按日计酬，刚进厂时一天八块，结婚就被解雇。所以许多人为了工作，不敢结婚。我说这个没有道理，要改。总经理说：“她们到结婚时，一天工资已经涨到二三十块，是刚进来的两三倍，成本太高了。”我说：“她们是有经验的工人，可以教导别人，发挥作用，不能因为结婚就裁掉。”

第二，如果女工做久了，成绩不错，有能力，就把她升做助理员（等于是士官长），也变成月薪劳动者，这样请假也有工资。这两个条件，总经理答应了。我就接了厂长。

我替女工争取权利，工厂营运很好，赚了不少钱，但我这个厂长还是做得很痛苦。当时台湾所谓经济起飞，靠的是严重剥削工人，劳动没有保障。法律是有的，民国初期定的劳动法是很先进的，是第一次国

共合作时期制定的，但台湾处于“戒严”时期，不执行，有什么用！我是厂长，不是老板，不是资本家。但我不能帮助工人。我觉得待不下去了，打算辞职，总经理不同意，我就两三个月不上班。他呢？还是每个月亲自送薪水到我家。

为什么呢？我当厂长是有功效的。女工支持我，因为帮她们争取了权益，股长和科员也拥护我，因为我教他们技术，工厂运营良好。只有总务科长对我不满意，他也是老板家族的，家族公司嘛。

后来有人密告，说我宣传共产主义。正好这时，药厂有个推销员，日据时代中学毕业的，业绩很好，董事长要他出去另建东大药厂，做总经理，后来也做食品，就是有名的“乖乖”。东大药厂的厂长拉我过去，做技术部主任，不用做厂长，不用管人事，那就轻松了。而且以前的资历都算在内，工资还再增加一点。“中国新药”的总经理当然不高兴，但我不管了，就走了。很久以后，我讲这段经历给别人听，别人说：“你怎么一点都不想自己发展企业，这样可以赚大钱。”老实讲，我一点也没想过。我一直想的，还是想搞政治，只要我生活稳定下来，我不会放弃年轻时代的理想。

结婚

我是一九六五年还在“中国新药”的时候结婚的。我太太冯守娥，因为兰阳工委案，跟我差不多同时被捕，坐牢十年。她的哥哥冯锦辉是同案被枪毙的。前面已说过，我和他同关一个牢房，他要出去枪毙前，跟每个难友都握手，我握着他的手时，他的手还是温热的。

坐牢出来的人，有点像亲人，结婚就互发喜帖，大家都来参加。那时守娥也在台北，在一家日本“山之内”药厂的台湾分公司做会计。在难友的婚宴上，几次碰面，就认识了。其实在绿岛的“新生训导处”，我就认得她。有人指给我看，这是冯锦辉的妹妹，我就记得了。有阵子我和别人负责挑水去女牢，也常看到她。

出狱后的几年忙于谋生，没考虑过婚姻。但妈妈一直在催，一定要结婚啊，要有后代。那时也有人帮我们撮合，住在三重的一个老同学，是从大陆来的，先生是台大的，也是“老同学”，先生判十年，她判感训。她带着守娥和几个人来药厂参观，就这样给我们介绍。

有人告诉守娥，陈明忠身体不好，有肺结核，要她多考虑。但也有人说：“陈明忠自己有肺结核，还替别人考虑，在牢里把家里寄的食物分给没有家人的人，还号召大家把钱放在一起用，帮助没钱的人——这样的人品，可靠。”她很多女同学也都推荐我。

交往的时候，我跟她讲了我认识她哥哥的事，她也逐渐了解了我的事情，比较安心。守娥会选择我，我不知道跟我认识她哥哥有没有关系；对我来讲，我选择她，跟她哥哥绝对有关系。

我岳母生了十四个孩子，活下来九个。长子冯锦辉，被枪毙。长女就是我太太，她因为只承认加入读书会，没有承认加入组织，所以判十年。当初是她先受老师影响，加入地下党的，女孩子不好活动，她又介绍哥哥加入。后来冯锦辉成了罗东区委委员。大陆准备攻台，地下党要做配合，郭琇琮拿手枪给他时，他就有觉悟，知道被捕后一定会判死刑。有邻居嘲笑我岳父说：“你就会生共产党孩子。”他非常生气。

岳父后来又再婚了，生了五个女孩。他很多财产是用我的名字登记的，因为他相信我。他的长子死了，他就把我当成冯锦辉一样，又信任我的人格。

那时结婚的客观条件是，我升了质检科科长，月薪有两千八百块了，才有钱结婚。守娥当时做事也很好——她会计是出牢才学的，考进公司时，一百个人只录取了她一个——结婚后也留用。她的日语也好，又心细，后来做翻译谋生，她翻译的稿子，出版社说都不用改。孩子出生后她也继续工作，只是孩子读小学时，因为只念半天，另半天没人管，才把工作辞掉了。

我们很快就结婚了，这还有一个原因。有个朋友，在台大念书时以"知情不报"坐过牢，出狱后，因为家里是地主，有资本给他开公司。有次我去他那里，有个女孩子在，他问我："这个女孩怎么样？"我说："很漂亮啊。"原来她是我们"中国新药"董事长的侄女，他们想撮合我俩。这个朋友以为我很乐意，说："如果你娶了她，你在公司里的地位就定了。"我很生气，虽然没说出来，他不知道，这对我是一种侮辱。后来董事长的太太就来工厂看我，问我的意思。这个女孩子什么思想我也不清楚，我还想搞革命啊。董事长夫人一逼我，我就说："我有未婚妻了。"因此，我就赶紧跟我太太结婚。坐过牢的，愿意找坐过牢的，有共同信念，互相能理解。

结婚时我们不请客，因为大家都没有钱，办婚事要包"红色炸弹"啊。就找了少数几个人，一个人出三十块，一起吃个饭，就是婚礼了。

小牢与大牢

结婚后，在南京东路租房子住。“警备总部”对政治犯是要监视的，在住的地方的派出所都有档案。有一天负责这个地区的警察来找我，要我每月付钱给他。事情是这样的：附近有个赌场，是一群流氓搞的，这个警察有投资。没想到赌场的老板跑了，警察为了弥补损失，要他管辖下的八个政治犯，每个人每个月摊一千块给他。我拒绝了，我那时工资是两千八百块，给他一千块我怎么生活。但他就每天晚上十二点来敲门，一直打扰我。怎么办呢？我就对他说：“你很可能是共产党喔，你老是找老百姓麻烦，让他们反对政府，所以你可能是共产党。”他就不敢来了。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们坐牢出来的，找工作困难，生活也困难，还要被监视、被敲诈，不想点办法不行。我太太说，她刚出来，只要找到工作，特务就去找老板，让老板知道她是政治犯。老板害怕，马上请她走路。几次以后，她很生气，跑到派出所大骂，还说要住在派出所，让他们养，以后他们才不敢这样做。

所以对政治犯来说，在绿岛是坐小牢，回到社会是坐大牢。

重新开始

出狱头几年，要在药厂站稳脚跟，不敢参与政治。一九六五年结婚后，生活也开始稳定了。我开始找资料，找书读。以前曾偷偷听大陆广播和BBC的中文广播，以便了解大陆的情况。坐牢出来的人，不敢公开活动，但我慢慢地开始偷偷活动，想办法找地下渠道买书。我发现了一家日文小书店，常常去买书，跟那老板聊天，慢慢给他灌输对社会主义和祖国的认识。这样讲了一两年，他终于被我说服了，敢帮我买书。台湾老一辈都读日文，所以情治单位对日文书店看得很紧，他帮我买书，是冒风险的。当然，书也卖得很贵。我让他帮我买一些日本左派的书，还有日本《朝日新闻》《世界月刊》之类的新闻、杂志。《世界月刊》，即使是在台湾的日本人，照规定也不能买，只有日本大使馆可以买。书店老板通过地下渠道买进来《朝日新闻》，很贵。那时《联合报》一个月七十五块，《朝日新闻》一个月要一千块。我为了找资料，花了很多钱，根本没有想到应该把自己的生活弄得更好。

在东大药厂的时候，我的月薪已经达到几万块，大部分都用来买书了。几个“老同学”又合买了复印机，偷印这些资料，通过秘密读书会和私人交往散发出去。这台复印机立功不小——当时复印兴起，大大便利了资料、信息的传播。那时，很多人，学界、政界的名人、政要都从不同渠道间接地看过我们这些复印的资料。后来有一次开会，台大教授郑钦仁跟我打招呼，他是有名的“台独”，大家觉得奇怪。其实是因为，他以前也看过我印的书。（他是新竹郑家的，很有声望，是中过进士的家族。）

那时候很多人开始关心政治，关心台湾的前途，因为尼克松访问大陆，接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华民国”被迫退出，然后，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很多人感觉到了形势的变化，不得不到处寻找资料，以便了解真相。虽然国民党一直在喊“处变不惊，庄敬自强”，而且加强社会控制，但很多人还是在偷偷设法了解大陆的情况。也在这个时候，我和党外的人，包括黄顺兴、康宁祥、郭雨新等人开始交往。

从这里就进入了七十年代，台湾开始有了政治热情，党外势力声势越来越大。整个七十年代，国民党都想控制局面，但没有办法。他们制造了几个案件，包括余登发案。我的案件（第二次被捕）是因为我们不断散播资料而引起的，案情以后再说。不过，当我被审判时，虽然我什么都没讲，但“警总”还是通过其他渠道，知道了太多人看过日文的大陆资料，其中还包括“内政部长”林金生（曾经担任过云林县和嘉义县的县长，是林怀民的爸爸）。由于牵涉了太多的人，我的案子拖了很久，海外才有时间抢救，我才能从死刑逃脱出来，也真是幸运。

10 第二次被捕

一九七四年，公司（东大制药厂“乖乖”部门）派我去日本买机器。以前都是老板自己去买，但他不懂机器，总被日本人骗，买回来的都不能用，还要加以改造，所以这一次让我去买。因为我有政治犯记录，不准出境，公司给“警备总部”管出入境的人塞了五万块的红包，我才可以出境。

到了日本，因为是买机器，日本公司对我也招待得很好。一般出差到日本，每天给二十元美金的费用，但我们公司却给我一天五十元美金。我住到新桥旅馆后，董事长恰好在东京，他把我的旅馆费用也都付了，五十元美金我可以随自己的意思花用，我拿这个钱搞自己的活动。

通过陈玉玺认识陈映真

陈映真出狱后，我是通过陈玉玺先生的关系，才认识他的。陈玉玺后来在美国的《中报》担任总编辑，还出过一本书叫《台湾的依附型发展》（人间出版社，一九九五）。

陈玉玺在台大经济系毕业后，前往夏威夷大学念书，后来参与反越战行动。他参加游行的事出现在电视报道中，被台湾的“总领事”看到。他们吊销了陈玉玺的“护照”，还勒令他回台，但陈玉玺没有回来，因为他知道回到台湾一定会坐牢。陈玉玺后来偷渡到日本，大概事前已经都有联系，所以日本社会党的议员也力保他抵达日本，当时他住在女作家川田泰代家里。

因为那个年代日本的生活比台湾好，因此很多人都偷渡去日本。日本政府将偷渡客抓起来后，关到一个地方，然后再将他们遣送回台湾，但是台湾不接收，所以累积的人数越来越多，让日本政府很伤脑筋。后来，蒋经国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时，曾去日本和日本内政部人员沟通，秘密协议的结果就是：日本政府同意将一个政治异议分子遣送回台湾，就可以同时将十位偷渡客送回。所以陈玉玺去换新的出入境证件时（台湾人在日本大概半年或一年，必须拿着“护照”到局“更新”）就被遣送回台湾，直接进入狱中，但日本政府那边也不是很清楚其中的状况。

陈玉玺去更新出入境证件却没有返回家中，女作家就去出入境管理局询问，结果竟得到陈玉玺已返回台湾的答案。这让女作家觉得很不舒服，觉得自己照顾陈玉玺这么久，结果他却连一句话都没留就离开，实在太没礼貌了。一个礼拜后，这位女作家收到一封从台湾寄来的信，是陈玉玺的爸爸寄给陈玉玺的，女作家阅读那封信后，觉得非常奇怪，因为信中提及之前陈玉玺跟家人表明想跟一位日本女孩结婚，陈爸爸同意了。但为什么现在陈玉玺的女朋友在日本，而陈玉玺自己却跑回台湾呢？为了搞清楚状况，女作家打电话给陈玉玺的父亲，才知道陈家根本不知道陈玉玺已回台一事。日本表示已经将陈玉玺送回台湾，但陈玉玺却没有回家，这下才发现台湾和日本的秘密协议，以一名政治犯换十名偷渡客的事件就被闹大。后来陈玉玺判得很轻，大概是七年。

一九七四年我去日本帮公司买机器前，陈玉玺把当时还在狱中的政治犯名单交给我，要我到日本转交给“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的成员川田泰代。由于当时台湾当局一直对外表示台湾没有政治犯，但陈玉玺就是要表示还有，因为他和狱中出来的人有联系，所以他要我将这个名单转到“国际特赦组织”，他要我去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女作家的家。我虽然跟日本的“国际特赦组织”有联系，但我不认识那位女作家，于是打电话与她联系。电话中我说是陈玉玺介绍的，她一听就约我在明治神宫见面。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明治神宫在哪里，我就从旅馆叫出租车载我过去，但出租车的跳表计费把我给吓坏了，因为实在是太贵了。那位女作家当天穿着红色大衣，我到明治神宫时，她已经等在那里。后来我们一起到她家，我把名单交给她，她则把陈玉玺被捕的经过都告诉了我，陈玉玺的一些事情我到那时候才知道。

陈玉玺出狱以后，我是在黄顺兴的家里跟他见面的。因为陈玉玺出狱后去找黄顺兴，陈玉玺是彰化人，他爸爸住在三重，陈玉玺去找彰化老家的“立法委员”黄顺兴，而我刚好在黄家，就这样互相认识并开始聊起来。所以我和日本国际特赦组织的关系之一就是陈玉玺牵的线，因为他要我把政治犯的名单交给特赦组织。

一九七四年我从日本回来，陈映真一九七五年出狱，陈映真和陈玉玺大概因为坐牢互相认识，所以陈映真出狱后，陈玉玺就将陈映真介绍给我。因为我出狱后还是一直被监视，不方便约在外面，所以陈玉玺就约在晚上（晚上情治人员也要休息，没那么认真）我台北的家中，介绍陈映真跟我认识，之后还有苏庆黎，我是这样和他们认识的。

陈逸松投奔大陆

通过国际特赦组织，我还见到了著名经济学者刘进庆。刘进庆告诉我策反陈逸松的经过。那时日本一些左翼亲中国大陆的人士，说服陈逸松转向大陆，陈就托刘进庆跟大陆通气。陈逸松年轻时曾经是左派。一九七〇年代的一系列事件，特别是尼克松访问大陆，以及中日建交，对台湾刺激很大。像他这种日据时代的老一辈，对形势的变化非常敏感。他们看过太平洋战争，看过中美对抗，认为中国正在强大起来，因此想要向左转。这种左，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左，日据时代的老一辈是有这种心情的。

据说，陈逸松去大陆前偷偷地对余登发讲：我们应该向左转了。陈逸松有一阵子偏向“台独”，虽然他现在想去大陆，大陆却不让他去。陈逸松写了一个声明，托刘进庆带过去，宣告从此放弃“台独”立场，为社会主义祖国献身。另外还写了一个报告，说明台湾党外的状况如何，并指出有哪些人是统派（如黄顺兴、许乃昌、彭德等人）。陈逸松把声明和报告交给刘进庆，托刘进庆转给大陆。后来大陆就同意陈逸松过去，这件事在台湾非常轰动。

当时的“内政部长”林金生，是国民党重用的台湾人。国民党曾经派他去日本，让他策反“台独”派的邱永汉。邱永汉“二二八”后逃到日本，写小说，在日本有名气。他搞“台独”的资金，来自林献堂。在日本的第一代“台独”派，很多是“皇民化”的台湾人，例如廖文毅。在美国占领日本期间，他们靠走私糖和香蕉作为“台独”经费，美国故意不管。后来美国结束占领，不能再走私了，日本的“台独”派没有经费来源，开始没落，廖文毅才回台湾投降。王育德是第二代“台独”的代表，由于是地主身份，怨恨台湾土地改革，才变成“台独”的。邱永汉和王育德是帝大同学，但邱永汉写了部小说，把王育德的情况和一些“台独”内部问题都写出来了，两人就反目，干起来了。后来邱永汉也回台湾了，林金生算是立了功。（非常有趣的是，一九七〇年代我和一些出狱的“老同学”影印日本左翼的书到处散发，看书的人中，就有林金生。）

陈逸松本来也是国民党派去日本策反“台独”派的，结果利用这个机会跑到大陆去了。

策反黄顺兴

我和刘进庆就这么谈了两三天，很愉快，我们思想见解都很一致。他突然冲口而出，说："嘿！现在来策反黄顺兴吧。"这样，我就踏入了第二次被捕的鬼门关。

黄顺兴曾经当过台东县长，是党外第一个当选的县长。最不可想象的是，他居然能在国民党完全掌控铁票的少数民族地区选上县长，在当时真够轰动。他在台东的民间基础打得很好，但没有连任成功，被国民党刻意破坏掉了。选举期间，他只有一部可以活动的车子，选举活动的第一天早上，发现司机不见了，被抓走了。选举当天，国民党把他选区的少数民族请去喝酒，第二天这些人来跟他说："对不起，不好意思呀，昨天喝醉了，投给别人了。"

他知道我，还是因为我爸爸，那时我还在牢里。他做台东县长，我爸爸在台东县农林局。我弟弟结婚时，他来参加喜宴。他问我爸爸："这个儿子是大的还是小的？"我爸爸说："是小的。"黄顺兴问："大的呢？"我爸爸回答："给政府养啦。"黄顺兴听我爸爸说了我坐牢的情况，就大感兴趣。后来我出狱了，他就来找我。

在台北我们常一起聚谈。他会打电话给我说，我这里有好酒，可是没有菜，叫我买鸭翅膀，过去喝酒聊天。他选举时，我们好多老同学捐钱给他。他跟我说："你的朋友拿钱来，这个说是陈明忠的朋友，那个也这么说，哦，你有好多朋友啊。"

当时整个形势松动，民心思变，党外运动兴盛起来，"台独"派在美国支持下势力越来越大，但左派的意识也重新复活。左派本来被白色恐怖清洗掉了，由于海外"保钓"的影响，年青一代开始左倾，想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中国大陆，五十年代的老政治犯也和年青一代的左派通过各种方式接上了头。在这一点上，我跟陈映真的认识是最关键的，这件事有点巧合，值得讲一下。

我和太太结婚后，有次跟她去她娘家宜兰的罗东镇，遇到日据时代老台共王万得的太太。她在市场里摆摊子，旁边放个收音机，声音开得大大的，一听就知道是大陆广播，"文革"刚开始时期的广播，很高昂

的，还唱歌。我吓了一跳，我也听，可我是偷听的。我就问："你怎么敢这样？"她说："我们一家都家破人亡了，要杀要剐随便他了。"

原来"二二八"时，王万得叫造纸厂的人组织起来，保卫工厂不被破坏，他说，工厂是人民的。后来他被通缉，跑到大陆去了。一九五二年，国民党捏造王万得弄了一个共产党组织，在罗东抓了五十多个人，许多是王万得太太娘家的人。后来枪毙七个，里面就有三个是她娘家的人。她无法跟娘家交代啊！已经这样了，她死都无所谓，什么都不怕了。我说："勇敢是勇敢，但还是会惹麻烦啊！"她说："随便他啦。"

她有一个孩子，还有一个养子。养子的亲生父母也是老台共，跑到美国去了。这个养子后来也被抓，据说是"台独"。王万得太太很生气，骂他是混蛋，爸爸妈妈都是共产党，他竟然是"台独"分子。她不理他，他写信来也不回。我觉得有点奇怪，回来一查，发现不是"台独"案，是陈映真案，是左的。我就让太太想办法告诉她，王万得太太说："不是骗我啊？"她就非常高兴。（王万得后来死在大陆。他和谢雪红是对立的，彼此之间矛盾很深。）因为这样，我知道了陈映真案，也知道了陈映真这个人。

陈映真一九六八年坐牢，一九七五年出来，在牢里，他认识了林书扬等老政治犯，非常尊敬他们，《赵南栋》这篇小说写的就是这些人。我后来也知道了陈映真案，开始读他的小说。一看就觉得很不一样，他的小说有思想。后来我们认识了，很谈得来。我让苏庆黎从陈菊那里拿到资料，让他写了一篇关于郭雨新选举、国民党如何作弊的文章，偷偷送到香港《七十年代》发表。他和苏庆黎他们想办杂志《夏潮》，来找我商议，《夏潮》聚集的知识分子基本是左翼的，也有党外的。

所以，当时的形势让我们过于乐观，觉得策反黄顺兴的计划看起来会很顺利。我们太单纯了，没有想到，黄顺兴另有打算。他没有让我们知道，就让女儿黄妮娜通过日本，到大陆去。他写了封信带给周恩来，写什么我们不知道。

黄妮娜到了大陆，先由全国台联会长林丽蕴接待。林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日文翻译，田中首相去中国，就是她做翻译的。接着又安排黄妮

娜去见杨斯德（大陆前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白天陪她参观的人，晚上会打电话给杨报告。我的案子判决后，台湾报纸报道说，黄妮娜说林丽蕴让她回来搞革命。林丽蕴爸爸的好朋友就责备林，怎么跟小孩子说这个。林说："我只是请她吃顿饭，并没有讲让她搞革命。"

黄妮娜的妈妈讲，黄妮娜从大陆回来后，变化很大，原来是个很爱漂亮的小姐，现在什么都不讲究了。黄妮娜回来后，也找过我，说，杨斯德问她，谁影响了她，黄妮娜说，陈明忠。杨斯德就说："你回台湾以后，把大陆的情况告诉陈明忠。"

我一听到黄妮娜这样讲，就知道会有危险。如果她被捕，一定会把我讲出来，我必须赶紧做准备。黄顺兴是当时党外大头，国民党不敢对他怎么样，绝对不敢抓他，但我就危险了。我赶紧把那台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复印机拆掉，偷偷丢到淡水河里。那些"非法书"，我让我在"中国新药"厂时提拔的一个女工，藏到她家里。

果然黄妮娜从日本到大陆时，就被台湾的情治单位盯上了。回来没多久，就被捕了。她七月一日被捕，她家人没有立刻通知我。二日晚上，他们才通过朋友告诉我，我想马上买机票去日本，但算了一算，知道来不及了。她这么一个女孩子，刑求绝对熬不过三天。果然，七月四日我就被捕了。

我参加党外运动，国民党那边本来完全不知道，但黄妮娜都讲了出来。根据黄妮娜的口供，国民党发现陈明忠大有问题，长期以来偷偷和党外有来往，还想策反黄顺兴，这还得了。竟然搞了那么多年，而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这个人一定要判他死刑。

后来我才知道，这里面还另有因缘。原来蒋经国最信任的部下贾亦斌在国共内战快结束时，就是被杨斯德策反的。黄妮娜的口供送到蒋经国处，蒋经国一看杨斯德的名字，当然认为我的案子极为严重，非常重视，我的死刑无论如何是逃不掉的。

我被捕了

一九七六年七月四日早上六点，“警备总部”的六部汽车包围了我在和平东路的住家，来人拿出来一张条子，写的是“约谈”。随后我被带到博爱路的保安处，包括一个中将、两个少将在内的十几个军官在等我。那个房间，后来才知道，叫一号问案室，很大，有五十多坪，有厕所，接下来我的审讯、刑求和睡觉，都在这里了。

后来我探听知道，那个中将是“警总”副司令阮成章，后来当了“调查局”局长。他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上面有命令，不管用什么手段，一定要口供。”第二句是：“就算人进了棺材，口供也要留下来！”说完他们就走了。一个问案人员（他们自称“参谋”），要我在手表、现金的保管条上签名。因为第一次坐牢的经验，我很了解军法的“行情”，所以，看到那保管条上的编号“一九七六年度特字〇〇一号”，我心想，糟了。第二天问案的人又说：“你房子的名义所有人是你两个女儿，你是不是买房子时就已经准备好再坐牢了？”我想，我才刚被捕，“警总”就已经调查了我的财产。依当时为政治犯定罪的《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的规定，“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执行者”的唯一刑期是“死刑”，而且还要没收财产。很明显，他们是无论如何都要置我于死地了。换句话说，他们是决定判我死刑之后才来抓我的。

问案人员说：“像你这样有‘叛乱家庭’背景的人，和黄顺兴、康宁祥、郭雨新这些党外人士来往，一定有阴谋。”我和同为政治犯的冯守娥结婚，我就成了“叛乱家庭”的家长。我们是“新生分子”（政治犯在绿岛的监狱叫“新生训导处”），总有叛乱嫌疑。

一九七〇年代初国际形势变化，“中华民国”失去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合法地位，在岛内，党外又在选举中兴起，国民党更加害怕。但它又有美国的压力，美国暗中支持“台独”，台面上要蒋经国实现台湾民主改革，开放民主党派。所以蒋经国不能直接对党外下手，只能设法证明，党外人士后面是共产党。美国痛恨共产党，只要牵涉到共产党，就不管什么民主人权了，杀“台独”分子不可以，杀共产党他就不管。本来我和党外的来往，国民党并没有掌握什么情况。黄顺兴的女儿黄妮娜被抓，变成“污点证人”，说她去大陆是受了我的影响，说我鼓动

他父亲黄顺兴去大陆。这个孩子啊，也不能怪她。她没有经验。所以，抓到我，对国民党来说是个突破口。关键是要坐实我是共产党，这样，和我有关的一切党外人士就可以一网打尽，就可以清除黄顺兴、康宁祥等这一批人，就可以消灭正在兴起的党外运动，而美国也不能抗议，因为这一切都跟中国共产党有关。

所以他们问案的重点，一是我和共产党的关系，二是我和党外的关系，他们要把两者牵扯在一起。

11 刑求逼供

第一阶段的逼供

“人进了棺材，口供也要留下来。”这是“警总”副司令交代的。当然，他们要的是他们想要的口供，这种口供我不会给，所以接下来的就是一连串的刑求，生不如死。

第一阶段六天五夜。他们四个小时换一组人，不断地疲劳式审问。他们换人，我却不能休息，连续审问了六天五夜。他们要我承认这个，承认那个，我什么都否认。他们骂：“黄妮娜都讲了，你还不承认！”他们不断地骂，这样我就知道黄妮娜到底讲了些什么。问案的人越急，就越露出了他们的底牌。这样一轮审问下来，我差不多就了解了他们掌握了什么。

我已经有过一次被审讯和坐牢的经验，知道如何对付他们。这种疲劳轰炸式的审问，电灯一直照着眼睛，不给睡觉，普通人三天三夜就完蛋了。我体质好，能忍耐，问案的人还问我：“你练了什么武功？”还有一点很重要，你的回答不能前后矛盾，只要被抓到，他们就死抠住不放，所以脑筋要非常清楚。我那时四十七岁，身体还可以，撑得住。

他们还闹了一个笑话。我五十年代第一次入狱时，并没有承认加入共产党。我只承认加入“社会革命党”，事实上这是我被刑求时胡乱捏造的，根本没这个党。“保安司令部”怎么查都查不到这个党，最后糊里糊涂地定罪，归入叛乱杂案，说我参加的“台湾民主联军”（即二七部队）就是叛乱组织。这是“二二八”事件的事，国民党已经表示既往不咎，怎么能说是叛乱组织！所以问案人员一查我的资料，也觉得莫名其妙，还问我一九五〇年为什么被抓？我说：“你们抓的啊！”他们说：“不是我们，那是‘保安司令部’抓的。”这是睁眼说瞎话！“保安司令部”根本就是“警备总部”的前身，怎么会没关系。

他们问案的一个重点，是香港的《七十年代》杂志上当年刊出的一篇文章《台湾政坛老兵郭雨新》，署名戴乃民。六十八岁的郭雨新竞选“立委”，竟然落选了。这篇文章把国民党做票的很多细节都写了出

来，包括许多村子开票时国民党怎么破坏，怎么弄出废票，最后废票竟然有八万张！天下哪有这种事！这就是台湾“民主政治的真相”。这篇文章后面还有一篇，是讲颜明圣的。在同一次选举中，颜明圣在高雄地区竞选“立法委员”，选举结束后他被抓了，判了十二年。

这两篇文章，尤其是讲郭雨新的那一篇在《七十年代》上发表后非常轰动。因为他有凭有据地戳穿了国民党的民主假象，影响很大。这一期杂志回流台湾后，党外的士气跟着高涨起来，国民党很紧张，很生气。“警总”怀疑文章是陈映真写的，拿这个问我。

我说我不认识陈映真。我被捕前已经把电话簿撕成一片一片的，用抽水马桶冲掉，但我留下一本旧的，里面没有陈映真的名字，所以我可以说我根本不认识陈映真。后来“美丽岛事件”中王拓被捕，刑求时也被问这件事情。王拓根本不知道啊！这件事只有我和陈映真知道。资料是苏庆黎从当时担任郭雨新秘书的陈菊那儿拿到的，我让陈映真写出来，交给朋友带到香港在《七十年代》刊登。这应该是陈映真第一篇报告文学，比《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没》还早。这件事到现在都没有公开出来。陈映真在这篇文章中故意改变了文章的风格，不过“警总”还是怀疑到他。

后来我听说，在我被捕的当天早上，陈映真听到消息了，穿着睡衣在街上乱走，半个小时后才冷静下来。因为除了文章之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那时候，《台湾政论》开始排斥左派，不刊登我们的文章（不过，他们出到第五期后也被停刊了），我们就想自己来办杂志。当时苏庆黎的前夫郑泰安——一个精神科医师，办了一份《夏潮》杂志，出了三期，不想办了，我们决定把它买下来。

当时还是“戒严”时代，申请办杂志很困难，买别人的杂志比较快。陈映真和苏庆黎找我商量，人和文章都聚起来了，但没有钱，需要六十万元准备金。我说好，我来想办法。我没钱，但朋友有，我就找出狱的“老同学”筹钱。七月三日晚上十一点左右，我把第一笔钱交给陈映真，七月四日我就被捕了。《夏潮》的人很紧张，陈映真都准备着被捕了。关键是我的旧电话簿里没有陈映真，我不承认认识陈映真，我挺住了，他们没法查下去，这样，陈映真和苏庆黎都没有被牵连进来。

有一天来了一个人，对我说：第三组的人不是你的对手，我可不一样（后来电视上说，保安处第三组张伟英“用科学的方法破了陈明忠案”，成了“国军英雄”，简直胡说八道）。他说：“你那本电话簿是旧的，应该还有本新的。”我说：“没有新的，就只有这一本。”他说：“你有一个朋友叫陈玉玺，你有他的地址，但却是旧的，你应该还有一本新的电话簿，记了他的新地址。”我回答说：“他以前住在三重，后来搬到民生小区，我知道，但你们经常跟踪他，他觉得麻烦，所以新的电话、地址都没有给我，说有事情他会来找我，不要我找他。”我的回答合情合理，他也无可奈何。

我一边应付他，一边想，这个人到底是谁啊？确实厉害。我突然想到一个人，平常大家提到“警备总部”的这个人，都说他是专门负责对付高级知识分子的，常请他们“喝咖啡”，我想可能是他。他对付不了我，要走了，我就问：“你是不是陈尽忠先生？”他吃了一惊，连说“不是不是”，就赶紧跑掉了。

当天晚上，他带了三瓶酒和菜来押房，说：“没错，我就是陈尽忠啦，你怎么知道我？”我说：“你大名鼎鼎啊！”他跟我喝酒，想要把我灌醉，想让我酒后吐真话。我被捕前在东大做副厂长兼技术部主任，常常应酬（东大食品公司，生产“乖乖”，是相当有名的大公司。现在的“旺旺”，那时是很小的小朋友）。老板患糖尿病，不能喝酒，我就替他喝，我酒量好，台湾人叫“酒桶”那种。日本人喜欢去酒家，所以台北那些大酒家，我差不多都带去过。三瓶酒喝完了，我一点问题没有。他想灌我，哪有那么简单。

我和党外来往，“警总”的人也找不到任何证据。我和黄顺兴、康宁祥等人来往，知道他们出门时，“警总”的人会跟踪，所以约好了餐厅，我都是提前一个小时在里面等，聚完餐后，他们都走了很久，我才离开，所以“警总”的人根本找不到我跟他们来往的任何痕迹。

以上所说的这些，他们抓不到证据，问不出口供，就想尽办法刑求，那真是痛苦无比啊！

三轮刑求

第二阶段，五天五夜的刑求。他们一边问，一边刑求，不让睡觉，给吃东西。但我吃不下，开水喝得比较多。也给香烟。医官在旁边，看看差不多就量血压，不行就告诉刑求的人休息一下。我就能睡一会。

八个人刑求我一个，有时候几种刑一起来。有的按手，用小棒夹手指、脚趾后加力，同时两个人用长棍子在两条腿上加力；有的通电，再一个人拿着汽油，等电通了，嘴巴张开了，就倒汽油下去……

坐老虎凳，弄得我整条腿都完蛋了。砖头再压下去，眼前会发黑昏倒，两三个星期不能走路，也不能爬。上厕所，只好用背靠地走路，用手向后划，关节痛得不得了。现在我的膝盖这样差，就是当年坐老虎凳的结果。

运来两块大冰块，让我光着身子躺在上边，旁边吹着电风扇，这么审问。刑求的人说："一个冰块八十元，两个花了一百六十元，你看我们对你多好。"皮肤、肌肉冰一段时间就会麻痹失去知觉，倒不觉得痛苦了，但同时夹手指，把牙签插入指甲和指甲肉中间时，痛得小便都失禁。这样冰了九个小时，按理说会冻伤，但因为夹手指太痛，身体一直乱动，反而没有冻伤。

灌辣椒水，辣椒水通过喉咙后，也就不怎么觉得呛了，只是会流眼泪。但灌汽油就太难受了，我尽量吐出来，但还是会吞下一部分，两三个月内都还会感觉到体内的汽油恶臭味。而且很奇怪，会放屁，白天能控制，晚上睡觉的时候，砰一声，自己也被吓醒，同房有人跳起来，说："什么声音啊？"

把电线绑在脚趾上，然后通电。钢丝捆成一捆，打背和腿，太痛了，比棍子不知道痛多少倍。打过后一个礼拜，身体都不能动，动一下，全身都会痛。背上、腿全都黑了。医官想要擦药，因为面积太大了，没办法擦。

我的脊椎给打到错位，所以后来神经会麻木，走路跨台阶时会摔倒，拿杯子会掉下来。或者拿东西以为拿到了，其实没拿到，神经指挥和

肌肉活动之间有偏差。我早就知道会麻木，只是现在越来越严重了。

按照第一次坐牢的经验，我知道有些罪状只要一承认就免不了一死。当然不承认也还是百分之九十九会死，但还有百分之一的机会可以活。因此无论如何都得挺下去，更何况挺不下去就会牵连很多人。在最痛苦的时候，我也想：算了，太痛苦了。想要我承认什么就承认什么吧！刚好这个时候，碰到刑求的一个空当，前一批问案的人要轮换，他们先走了，而后一批人还没来，我一下就睡着了。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一个剑道高手对决，他如果一剑劈下来，我根本躲不及，我忽然就想通了，我不躲，就直接朝他身上刺下去，同归于尽不就好了。我想到一首日本和歌（短歌）“身态舍了飞乙·元浮、沁濑δδ机”，翻译成中文，大约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思。痛到极致也就是死了，最多就是死。很简单，但是很重要，我终于想开了。

我终于体认到，被刑求的时候，精神力的支持是最重要的，只要精神没有崩溃，肉体上的痛苦是可以忍受得住的。而且，只要认为“我不过是生错了时代，才会遭遇到这样的痛苦，但我并没有走错路”，精神就不会崩溃了。做了这个梦以后，我的精神坚定了，以后的刑求，痛还是痛，但不会动摇了。这样又经历了第三阶段五天五夜、第四阶段五天五夜的另两轮刑求。肉体上尽管痛苦不堪，但因为精神得到“解脱”，反而忍受得了。有时候刑求结束，我还唱歌，他们还以为我疯掉了。

刑求的最后一晚，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心脏超过负荷，每分钟的跳动超过两百次，跳跳跳，我连话都讲不出来。恍惚中好像知道，医生把一个人叫出去，跟他讲，不能再用刑了，他会死掉。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外省人，大刑求的时候就会来，比如老虎凳、夹手指的时候。隔一天再来查，医官说，心跳没好，还是不行（不能刑求）。他说我不能动，我躺着稍微活动一下胳膊，他再来看心跳时，就说：“你怎么又动了！”

有一次在刑求的时候，我说，我认识一个国际特赦组织的人。他们问我是谁，我说了名字，是日本大阪大学经济系主任川久保公夫教授，国际特赦组织日本分会的副理事长，一九七六年六月来过台湾，也见过我。他们一查，这个人果然来过台湾。我猜测，如果把我刑求致死，国际特赦组织追究起来有点麻烦，他们就停止了刑求。那个中将

说过，“就算人进了棺材，口供也要留下来”，我终于没进棺材。后来那个中将还来看过我一次，他走进来，后面跟着一个校官（就是所谓“用科学的方法破了陈明忠案”而后来成为“国军英雄”的张伟英上校），帮他拿着茶杯，蛮威风的，我看着他，什么话都没讲。

这样刑求整整三个月，后来我的照片被贴在台北中山纪念馆展览，大概是破获匪谍案之类的展览。那照片，听说看起来真像土匪一样，三个月都没有洗脸刮胡子洗澡。这是我出狱以后看过展览的朋友告诉我的。还有人告诉我，陈映真和他太太也去看这个展览，正看着，陈映真突然走到一个角落去。陈太太跑过去，一看，陈映真正在擦眼泪。陈太太说：“你怎么搞的？”陈映真回答：“那边有我朋友的照片。”

问案的人事后对我说：“我们刑求分四个阶段。一般在第一阶段，大部分的人都会承认罪状；到了第二阶段，剩下的那些不肯承认的人，连叫他承认说‘偷古井’（闽南话谚语），他也会承认。所以第三、第四阶段的刑求，我们从来没有机会用过，你是‘警总’有史以来头一个通过四个阶段刑求还不肯认罪的人，你练过什么武功？”

刑求者的无知和我的错误

在刑求的过程之中，发生两件小事，可以看出这些刑求者的无知。有一次，他们把很多香烟拆散，把一大堆烟丝搅在一碗水中，要我喝下去。我跟他们说，你们是不是要我死，喝下去是会死人的，他们才不敢逼我喝。还有一次更荒唐，他们说准备了一澡盆的水银，要我躺进去。我说，水银的比重很高，人躺下去会浮起来，你们连这个都不知道。我嘲笑他们，他们很生气，但无可奈何。

我觉得这些人就只知道用刑，完全不会动脑筋，如果他们都像陈尽忠那么仔细，也许就会抓到我讲话的前后矛盾之处。不过，我到底还是犯了一次错，让他们抓到把柄，但没想到这一次错误反而救了我一命。

"警总"逼不出我和共产党及党外"勾结"的口供，他们没有其他的线索，只能从我家里搜出来的"禁书"和录音带入手。最后定案时，也只有这些东西成了"证据"。

有一本日文书，他们问："哪里来的？"我说："一个从日本来的人给的，叫户部某某，给我的。""他住在什么地方？"我说："国宾饭店。"他们去查，没有这个人住宿的记录，回来质问我，我就说："他跟我说他叫某某，我又不能问他说的是不是真名啊。"

还有一本书，美国几个有名的华裔学者去大陆访问，写出感想，香港《七十年代》杂志出版社出版的。台中郭明哲、蔡伯尧两个坐过牢的朋友复印了上百本后，给好多人看。看书的人被"警总"查到，调去问，都说书是我给他们看的。审讯时就问我，书在哪里印的，我说在师大门口哪个地方印的，四块钱一张。当他们要带我去找那家复印店时，我就说是我乱讲的，你们刑求，我只好乱说。

他们又问，那书到底哪里来的？我就说，师大一个叫Goodman的留学生帮我去印的。一查，师大确有这个人，但回美国去了。其实我也知道他已经回去了，才说是他。他是师大的留学生，我住和平东路，公交车上常常遇到，开始谈话，后来我去过他住的地方，发现他关心中南美的问题，知道他是左派，我曾经拜托他在香港买《七十年代》。

我这样糊弄过去，他们终究查不出来。他们说："怎么你讲来讲去都是外国人？"对我无可奈何。（出狱后，蔡伯尧的太太和孩子来我家，谢谢我没有讲出孩子的爸爸。）

从我家里还搜出来一卷录音带，是颜明圣在高雄的演讲。他们问："你怎么会有这个？你跟党外有什么关系？"我如果说"捡到的"就好了。我自作聪明，编了一套话，说："我妈妈病了，从台北回冈山看她，妈妈好了，我坐火车回台北，到高雄转车，因晚上才有卧铺（台北到高雄，那时要八个小时），还有时间，我就到火车站前面的广场听演讲，顺手就录起来了。"没想到过了没几天，他们从高雄找来两三箱资料，里面有这个演讲的录音带。他们问我："录音带是不是一样？"我说："一样。"他们就说："你说是在火车站前录的，明明是在什么什么庙前讲的！"这下子被抓到了，整个审讯过程中，我就犯了这个错。

12 死里逃生

陈金火与书报案

因为颜明圣的录音带，我被抓到把柄了，不得不讲出陈金火。我说，录音带是他给我的，陈金火就被抓进来了。

陈金火比我大五六岁，也是一九五〇年坐牢的政治犯，他是因为“全省学生委员会台南分部”这个案子被抓的，判了十年。出狱后，他在高雄一家药品公司做药品推销员。我出狱时家里已经搬到冈山，他有次推销药品，在冈山碰到我，我们才开始联系。有个坐过牢的四川人袁乃匡，他的老板也是坐过牢的人，我请袁乃匡去陈金火那里拿演讲的录音带，还有选举的宣传单。我让袁乃匡坐飞机去，坐火车回，因为坐飞机会检查。

从陈金火家里，他们又搜出一些“禁书”，他是通过三省堂买的。三省堂是当时台湾最大的日文书店，“保密局”需要的日文书都从这里进口，包括日本左派的书，写“文革”的书。李霈霖开三省堂，进日文书来卖，他帮“保密局”买日文书时，就多买几本，偷偷卖给陈金火，其实他也有意要散播。李霈霖日据时代就因为反日坐过牢，“二二八”事件时，台北的群众到广播电台广播，就是李霈霖他们冲进去干的。他哥哥参加了地下党，听说是他们那一群人里面的理论家，后来“自新”了，再后来就当了和尚——因为背叛了自己的理想，干脆去做和尚。陈金火供出从三省堂买书，李霈霖也就被捕了。

陈金火卖药，认识好多医生，高雄医学院的教授他都认识。他把书给这些人看，他们也喜欢看。他知道我被捕后，已经把大部分书分散掉了。但一刑求吃不消，就招出很多看过书的人，他一口气讲了五六十个人，除了高医的医生，还有很多教授、名人，甚至把“内政部长”林金生（林怀民的爸爸）都讲出来了，这下就不好抓了。后来陈金火跟我说，事情弄大了才比较有救。

陈金火还承认，陈明忠说过，选举的时候人们会激动起来，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事情搞大，消息传出去，大陆就知道了。他还承认有个组织，准备暴动，这就牵扯了几个人，都是五十年代坐过牢的政治

犯。他的房子也是登记在太太名下，问他买房子的钱哪里来的？他说，陈明忠给的。陈明忠的钱哪里来的？他说，大陆来的。他因为刑求太痛苦，就随便讲了。所以我们就成了叛乱团体，就这样被起诉了。

国民党本来想利用这个机会再抓人。其实坐牢出来，再犯叛乱罪的人很少，因此“安全局”的意见就开始有了分歧，一边是要扩大，一边是反对扩大。有个叫曾永贤的，日本大学毕业，参加地下党，是重建的省工委组织里的一个领导，被捕后投降，被国民党安排做大陆研究，后来在政治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做教授。听说他就主张不能扩大。后来曾永贤很受李登辉重用，有一次演讲的时候，他提到这个案子没有扩大，他是有功劳的。

查了五六十个人，查了一个多月，时间拖下来，这个时候外国的人权组织也闹起来了。我的案子本来要速战速决的，就这样一拖，好几个因素加起来，本来要判我枪毙的，现在也不好判了。真没想到，我犯了这个错（颜明圣的录音带没交代好，供出陈金火），反而捡了一条命。

各方营救与最后判决

身上刑求的痕迹大多消失后，我被移送到景美"军法处"看守所。十月二十九日，我被依《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罪名起诉。

依当时的法律规定，被告收到起诉书后，法官才能开"调查庭"，让被告对起诉内容反驳或说明。因此收到起诉书后，被告理应可以把起诉书寄回家，家属不仅可申请会面，也可委托律师于后续"辩论庭"中为被告辩护，家属并可以旁听或提出反证。但我受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待遇"。

首先，我还没收到起诉书时，法院已开"调查庭"，所以我对当场提出的莫须有的指控无法有周延的反驳；开庭后回到押房，我才收到起诉书，以及一份一星期后开庭辩论的通知书——摆明让我来不及请律师，他们准备进行"秘密审判"，我和太太的通信也被阻断了。我成了"戒严"时期被秘密审判的最后一人。

在此期间，因为一直不能会面，太太预感到事态严重，只好自己去请教律师。没想到不久后，我太太就被"警总"无端扣押，"警总"还把我家里的户籍眷本、户口簿以及身份证等能够证明夫妻关系的所有证件卑鄙地"偷走"，这样，我的弟弟妹妹也无法代替我太太请律师了。开过辩论庭后，当局觉得请律师也无法为我辩护了，才把我太太释放。她回家后立即把我遭到秘密审判的情况告知她在美国的妹妹与亲友，由此一连串的救援行动开始了——旅居明尼苏达州的我太太冯守娥的妹妹冯昭卿与她丈夫李界木在华盛顿召开记者会，指出："我姐姐在姐夫被捕后不久就被拘押起来（七月六日到九日）；在拘押时她被迫签署宣誓书，宣誓不把被逮捕的事情告诉任何人。秘密警察（"警备总部＇特务）搜查了姐姐家里的每件东西……我姐姐在十一月六日到二十日再度被拘押。在我姐姐被拘押期间，'军法处'法庭于十一月十日左右判处我姐夫死刑……十一月二十日姐姐首次打电话给我，知道现在没有外界的帮助，姐夫的性命是救不回来了。因此向我证实了特赦组织的消息（陈明忠判死刑）是正确的。"

美国副总统汉弗莱写信给当时的"行政院长"蒋经国，要求立即释放陈明忠；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要求台湾当局提出我的叛乱

证据，当局提不出证据，该组织于是认定我是“良心犯”。

郑鸿生在《“解严”之前的海外台湾左派初探》（《人间思想》第一期，二〇一二年夏季号，人间出版社）一文中说：“由于当时台湾仍处戒严状态，多数的支援活动必须以隐蔽的方式进行。唯必要时，仍然有适当的公开方式，最明显的例子为一九七六年的营救政治犯陈明忠的公开活动。……政治犯陈明忠于一九五〇年代在绿岛及新店军人监狱被关了十年。出狱后在一九七六年再度被捕，被判死刑。这消息经由在台湾（其实是日本)活动的美国人权工作者Lynn Miles(中文名：梅心怡)带出，登在美国的华文报纸上，引起‘保钓’学生的关切并发动救援。由于案情严重，时间紧迫，芝加哥的林孝信这批人，还有不少香港同学在短短几天内做了大规模的动员，包括在全美留学生界发动募捐，集资在《纽约时报》刊登全页抗议广告（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及相应的一两百位国际关心人权人士的联署、募款、示威游行等。这公开活动的规模之大堪称一九七一年保钓‘四〇一大游行’以来所仅见，最终促使台湾当局改判陈明忠十五年……

“《台湾杂志》是随着台湾民主运动的兴起，海外台湾左派第一份面对一般留学生的有关台湾的刊物，起源于一九七六年底。叶芸芸陈文典夫妇、黄于燕夫妇以及陈其南夫妇等三家人是当时在耶鲁大学的台湾同学，为救援台湾的政治犯陈明忠而印制的一份手刻钢版的专刊叫《动荡的台湾》，成为全美留学生界救援陈明忠的重要力量。这份专刊还有陈明忠的绿岛难友——当时寓居耶鲁的台湾老左派台南人胡鑫麟医生（小提琴家胡乃元之父）——执笔数篇。胡鑫麟是台大眼科医生，一九五〇年与许强同案被捕，在绿岛关了十年。

“救援陈明忠一事，可说是在保钓统运与中国热潮中转而面向台湾的一个重大旗号。”

在日本的救援运动，据我所知，社会党的田英夫参议员（殖民地时期第一个文人总督田健次郎之孙）、大阪大学经济系主任也是日本特赦组织重要干部的川久保公夫，以及以林伯耀、林伯辉（外号猪八戒）兄弟、服部良一、徐桂国（外号墨面）、杉原达教授等从事劳工运动的“杂草社”成员为主的人们都尽了很大努力。

后来他们给我看了一些资料，最关键的是《纽约时报》第一版的广告，花了一万六千块美金。本来台湾是要判死刑的，大约知道要登这个广告的消息后，连夜修改判决书（广告是美国东区时间十一月二十七日，宣判是台湾时间十一月二十七日，按照时差是宣判在前，广告在后。有可能是得知有这份广告，连夜修改判决）。后来我还听说，法院的打字员小姐，连夜打了一个晚上，打到手酸、发炎，第二天去医务室打针。

黄妮娜的案子，不能公开，秘密处理，判她感训三年。我另起一案，成了案头。

陈明忠案，是“意图叛乱并着手实施”。我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褫夺公权十五年，并没收财产。陈金火也十五年。看书的人呢，以前都会判感训，现在因为牵涉的人太多，又很多是官员、医生，还包括“内政部长”林金生，以及他的弟弟（高雄医学院的教授），就不好这么判了，何况还有外国干涉；所以最后是，单纯看反动书的，就写悔过书；自己看又给别人看，就是“为匪宣传”了，就要判刑。蔡意诚（日据时代抗日领袖蔡惠如的孙子，他五十年代坐过牢。这次被捕时已经是一个小企业的老板）和王乃信被判十年；还有两个给人看书的，也叫“为匪宣传”，判了七年。

陈金火在牢里就精神崩溃了，他在蒋经国死后才减刑出狱，出狱不久就死了。三省堂老板李霈霖被判了八年——因为连续八年“为匪宣传”，三省堂就完了。我出来后才认识他，跟他说我们是同案，其实案子发生时我们并不认识。我的书是从一个小书店老板那里来的。我花了两年的时间说服那个小老板赞同统一，帮我买书。

我被审讯时，凡是被查到的日本的书，都供说是刘进庆让别人交给我的。我以为他在日本，反正不会回来了，所以都推给他。判决书就写了，我受“共匪”在日本的统战干部刘进庆指使，回台密谋叛乱，书都是他托人带给我的。刘进庆在日本看了判决书，觉得我根本就是受到冤枉，完全没这个事，决定回台湾替我澄清。他真是天真，不知道台湾判罪是怎么回事。他回台湾后，一下飞机就被“警备总部”直接带去问，他把事实讲出来，说我在日本见过他，讨论对大陆的看法，但他没有给我书。他是日本籍，又是大学教授，“警总”不能随便逮捕他。“警总”听了他的话，都说，我们被陈明忠骗了。

我和太太秘密通信时，知道刘进庆回来了，心想糟糕了。按照以前的情况，我会被调回去，重新审问、枪毙。那时我在绿岛，一想到可能被调回去重审，只要想到那些刑求还要再来一次，就没法睡着，只好吃镇静剂。那时候林书扬也还关在绿岛，就一直笑我。后来竟然没有重新调回去审问，可能是因为我的案子已经闹得够大了，考虑到国际影响，也就不了了之了。

刘进庆最后一次回台湾时，跟我发牢骚，说当时日本那边的朋友不让他回来，说回来会害了陈明忠，一直骂他。我就安慰他。我说："我坐的牢实在是你应该要坐的；我们在日本聊天，是你建议策反黄顺兴的，后来是我帮你执行，所以按照道理，是该你去坐牢啊。"他听了很高兴，当晚跑去台大找一个教授喝酒。刘进庆教授一直心向祖国，人品好，没想到死得那么早，真是遗憾。我常常想念他。

判决当晚，蒋经国在电视上发表讲话，说："陈明忠意图从东南亚偷运武器发动暴动……"政治犯的判决一般都登在报纸上，蒋经国（当时任"行政院长"）亲自在电视上发表（讲话）是特例（从来没有"行政院长"在电视上为叛乱犯发表讲话的例子，为何如此，包括我在内，都觉得很奇怪）。

未判决前，"军法处"的一个组长对我说，他可以帮我越狱，但条件是带他走。我当然不会上这个当。我已经判决了，"警总"仍不甘心。押房里新来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自称是台南人，经营电器行，他的闽南话甚至比我还流利，起初我没有丝毫怀疑。但过几天闲谈时，我发现他对电气完全外行，责问他，他最后承认自己其实是湖南人，是"警总"松山区的负责人，奉命来查探我是否还有隐情未供出来。

当时在"军法处"看守所，所有被判过刑的人都调到洗衣场工作。当"外役"总比拘禁在押房自由些，我像其他人一样提出申请，但几次都遭拒绝，理由是"奉命不准"。这些让我怀疑，虽然逃过死刑，当局是否还会有什么阴谋。

13 第二次十年牢狱

押房中的心情

在景美看守所的押房里，有一名中医与我同牢房，他是因为在报上看到大陆试爆原子弹成功，一次和病人聊天就谈起，结果被密告了。审判时他向法官抗议，说自己是在报纸上读到这个消息的，法官说："报纸是给你看的，不是让你讲的。"他以"为'共匪'宣传"判刑七年。另外牢中有三位老先生，其中两位年轻时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届"立委""国代"选举时和国民党同台竞选，在党政机关中当过中级干部。后来他们的后台老板一死，随即被捕，刑求熬不过，都承认参加共产党，判十二年徒刑。他们整天在牢里发牢骚。另一位老先生曾经是所谓"敌后工作人员"的组长，他的部下从香港潜入大陆后被捕，他因此被控参加共产党、出卖同志，判刑十五年。

面对这样的难友，我想起第一次坐牢时，在像现在一般大小的押房里，关了三十多个政治犯，挤得满满的。他们和我都没判死刑，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回来。那时我们都是充满理想抱负的年轻人，在狱中，我们互谈身世，天南地北地谈论、争辩，由此激荡出的思想火花，让苦难的狱中生活充满了想象力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在那个恐怖的年代里，处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没有万丈豪情根本度不过那样地狱般的生活。而今，同房的人都是被冤枉的，只能听他们发牢骚，我一个人必须孤独地面对黑暗的将来，要如何度过这十五年?

日本有一首很有名的俳句"元日宁冥途@旅O一里冢"(元旦是到冥府之旅的里程碑）。在一九七七年"新年"这个"到冥府之旅的里程碑"的日子里，我不断地思考。一九六〇年我走出"小牢"（监狱）到"大牢"（社会），十六年的大牢生活，虽然也不自由（情治人员、警察不断找麻烦），但总比"小牢"的日子好得多。现在人到中年，重新过"小牢"生活，更为漫长的十五年，能够挨得过吗？还好，妻子每次会客时带来亲自做的许多小菜，送来许多衣服、药品，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为了妻子、孩子，无论如何我都得振作，活下去。

地狱般的刑求后，我体悟到的是，只要精神不崩溃，肉体上的痛苦是可以忍受的。我想起张伯哲面对死亡时的从容，想起他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我的理想，我们为两个女儿取名“志民”、“志平”——志在为人民、志在为民主；志在为和平、志在为平等。这是我们夫妻的共同理想。参加“二二八”事件抗争，是我自己选择拿枪。七十年代台湾民主运动刚萌芽，我虽然知道坐过牢的人参加这类活动相当危险，但我认为应当为台湾的民主尽力；同时也不愿意台湾继续做美国的附庸，希望中国统一，希望中国富强，希望中国人拥有自尊，不再被人歧视；并且希望在这基础上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永远不要再出现人欺负人、人歧视人的不正常现象。总而言之，这都是我自己选择的路，这条路就是要提着脑袋走的，坐牢和牺牲都不能埋怨。假如人生再来一次，我还是会选择同样的路。乱世的人本来就不如太平时代的狗，我不过是生错了时代，并没有走错路。

这就是我在押房中一再想到的，每次想到这些，我就心平气和，不再感到前途是一片黑暗。

第一次坐牢时，我还没有结婚，父母健在，家境尚好，并没有“后顾之忧”。这次不一样了。我结了婚，大女儿读小学时，为了照顾孩子，妻子辞去了公司会计的工作。现在我再度被捕，判刑十五年，我不知道她以后怎样养活自己和孩子们？会客时，她一直要我不要担心，但我怎么放得下心？我问家里的情况，她一直轻描淡写，不正面回答我的疑问，使我更加担忧。

被捕前，我每月工资几万块，有公开的和不公开的，台湾的民间企业一直有这个习惯。我刚被捕时，老板还经常送公开的薪水给我家。后来报纸上把我的案子写成一篇小说登出来，陈明忠叛乱如何如何，连公司的名字都公开说出来。老板吓坏了，拿出一笔钱作为退休金交给我太太，不敢再按月送钱了。他的好心肠，我到现在一直记得。

这时爸爸已经去世。弟弟因我被捕后到过我家，被“警总”跟踪，失去工作；妹妹已经嫁人，她的公公婆婆也害怕被牵连，因此弟弟妹妹都无法常来看我。这些我都了解，一点也不会怪他们。在那种恐怖时期，谁敢同情政治犯？谁不想保护自己？

后来妻子对人说，丈夫的再度入狱，带给她的伤害和精神的阴影是不能想象的。每每在撑不下去的时候，她就经常唱一首叫作《度过最冷峻的冬天》的歌来安慰自己。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度过最冷的冬天，春天就要到人间；

不要为枯树失望，春花就要开放。

度过最冷的冬天，春天就要到人间；

不要有一点猜疑，春天是我们的！

再上绿岛

判决后四个月，我被送到绿岛去。我还没到，我第一次坐牢时判无期徒刑的难友们就传开了：陈明忠要回来了。因为判决那天晚上，蒋经国在电视里讲话，说陈明忠要从东南亚偷运武器来暴动，他们都看到了。我去的时候，他们把酒和香烟都准备好了来迎接我。坐飞机去绿岛，走进监狱时，许多不认识的人在等着看·陈明忠是哪个?

一九五〇年我和林书扬差不多同时被捕，他无期，我十年。在绿岛的时候，他五队，我六队，那时我知道有这个人，但没有什么来往，因为不同队。我出狱十六年，再进去，林书扬还在等我。那时他已经被关了二十五六年。现在绿岛比较“进步”的是，可以在放风散步的时候讲话了。后来和林书扬最后一起出狱的李金木，都是一共坐了三十四年七个月的牢，放风的时候我们常在一起。李金木是工人，不会写文章；林书扬写文章，比较有名（林书扬二〇一二年十月去世）。

《夏潮》出刊时，在“中央日报”上做广告。监狱里只能看两种报纸，“中央日报”和《青年战士报》。头一次放风，我去找林书扬，他问我：“最近有本杂志有点奇怪啊，看题目，好像有左的东西，可以闻到左的味道。”我说：“什么杂志？”他说：“《夏潮》。”我“啊”了一声，说：“那是我们办的。”他很高兴（后来才知道，《夏潮》的同仁是有意在“中央日报”登广告的，以便让绿岛的左派政治犯知道）。我们想办法，让老兵去台东休假时，偷偷买来一本。记得里面有篇《自由主义最后的堡垒——《大学杂志》》，署名南方朔。我觉得文章的水平很高，就想是谁啊？那时候不知道南方朔就是王杏庆。《夏潮》筹备时我曾参与，知道其中有王杏庆。王杏庆本来要去美国，因为美国把钓鱼岛交给日本，他就不去了，所以我有印象，但不知道南方朔原来就是他的笔名。

无法改造的顽固分子

一九七八年“中央日报”副刊登了一篇文章《南海血书》，说是一个台湾人出海捕鱼捞到、翻译出来的。据说是越南难民阮天仇，在一个岛上饿死前，咬破手指用螺尖蘸着自己的血写的，写他怎样家破人亡，控诉越共统治。后来还编到小学课本里，拍成电影，是想拿越南来警示台湾的意思。听说那时的学生都会背：“今日不做反共斗士，明天就做海上难民。”狱方给我看文章，让我写感想。我说，假的。第一，我们用毛笔写字，因为毛笔含水，可以写；螺尖不含水，写一划两划可以，写几千字不可能啊。第二，切了血管，不可能流那么多血还活着。（《南海血书》作者［当时说是译者］朱桂于二〇〇三年承认“阮天仇”为虚构的人物。后来又证实，这一件事是当时国民党政战部主任王升策划的。）

政治学习，要写感想，我写台湾选举乱七八糟，开票的时候灯会灭。政战老师骂我，我说，我讲的都是实话，郭雨新废票八万张，怎么可能！

“警备总部”派了三个上校来跟我谈话。辩论了两三个月，我不耐烦了。我不会骗我自己，假的就是假的，我不能胡说八道。这三个人围攻我，要我承认我错了。我心脏经过刑求已经不好了，跟他们讲到激动时，心跳过快，晕了过去。他们还以为我心脏病发作死掉了。

后来《乡土文学论战》这部书出来，我想了解，我申请买书，书是买了，但却不准我看。钱拿去了，书不给我，凭什么？我就开始绝食。当时监狱里对付绝食，就是五六个人按着，往嘴里灌。我不给灌。我把几双筷子绑在手上，谁要来按我的手就戳谁眼睛。我对他们说，我这么做，顶多再多判几年刑，我无所谓了，反正这个年龄，能不能活着出去都不知道，你们眼睛给我戳下来，一辈子痛苦。他们谁也不敢过来。

刑求后身体越来越坏。很多病症。痔疮流血，量血压，高七十，低五十。体重平均下来每天减少一台斤（合六百克——编者注）。红血球，普通人五百万以上，我只剩下二百五十万，血红素普通人是十四以上，而我却只有七，随时会休克死亡。因此监方后来把书交给我看

了。为了《乡土文学论战》这本书，我十三天没有吃饭。本来不该这么做，但那时心情太坏。

和第一次坐牢不一样，那时一起坐牢的人有的谈，每天论战。现在牢里什么人都有，“台独”很多。要写心得，我随便写，不写他们出的题目，反正我交了作业。

后来看到有关大陆“文革”的报道，“中央日报”副刊也登大陆的伤痕文学作品，我以为是假的，但又好像是真的。还没坐牢时就看过陈若曦的《尹县长》，没当一回事，把她当成反共小说。现在大陆伤痕文学的东西出来，让我非常痛苦。以前我偷听大陆广播的时候，不是这样啊。大陆广播说：“‘文革’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意识革命——包括思想、文化、风俗习惯以及政治、法律、艺术等等意识形态的整体革命，是使人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革命。”但是伤痕文学里所看到的却是孩子控告父母、夫妻互相控告、朋友间互相指控、告密以至于人们不敢相信自己以外任何人的世界……再说，干地下反政府运动而被敌人刑求处死本来就是意料中的事。走这条路是自己选择的，没人强迫你……但像“文革”那样，被“自己人”扣帽子，甚至被虐待到死，才是死也无法瞑目的事。我急着想了解中国的革命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愿为之付出生命的革命，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想到这些，非常痛苦。那时甚至想，是不是死了算了。我不得不为自己牺牲一辈子所追求的道路寻求一个合理的解释，否则我觉得自己是白活了。这个困惑也成为后来我思考与写作《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本书的动力。

有六年，我一个人住一个房间，因为说我会煽动。我会在大家的不满快到高潮的时候，喊一声，不要吃饭了！把行动推上去。狱方就分析说，我这个人用闽南话讲就是“喊水水也会结冻”，很有影响力的意思，所以给我一个人一个房间，我也无所谓。没人讲话，我常常一个人躺着，躺了六年，脖子后面躺出了个硬块。按监狱规定不可以抽香烟，我也抽。我那时，据他们讲，就是拒不接受感训，一般老看守都随便我。监狱房间门上有两个玻璃窗，让看守随时监视的。我拿肥皂擦在上面，玻璃就不透明了。这当然违反规定，但他们不管我了。他们觉得一个为了一本书能绝食十三天的人，谁都管不了他。

母亲过世

我第二次坐牢中间，母亲两次中风。第一次中风，弟弟把她接到台北治疗。第二次中风，她不想活下去了，不吃饭，妹妹的小女儿就跟她说："外婆，你不是要等大舅回来吗？"她听了，就开始吃饭。

她在等我。但等不到，就过世了。妈妈死时，我非常痛苦。按规定，我可以戴手铐回去奔丧的。但狱方不让我回。那时我从绿岛去台北医院，要坐那种小飞机，能坐八个人的。如果我要回去，不光要出自己的飞机票，还要出整架飞机的钱，我怎么付得起。我无法回家奔丧。

妈妈是慈母，不是贤母。她很糊涂，土改后留下的土地，都被人家骗走了。骗她的人抓到了，土地还是没有要回来。有人借钱不还，妈妈去找他，发现他家生活很苦，结果债不要了，还又拿钱给他。

妈妈也不知道这个大儿子到底在做什么，但她相信儿子。"二二八"时，她听闻台中乱了，打仗了，又没有我的消息，自己一个人从冈山走路到台中去找我。我结婚后，生活稍微安定了，想接她来台北，她不肯，后来还是骗她说我车祸，才来了。住了几天就走了，说："这里和坐牢一样。"

在狱里听到妈妈过世，又不能回去，心里的痛苦……过了一个多月，还是缓和不过来。书也看不下去，才开始看金庸的小说。

记得金庸在某一本小说的后记中说："要掌握大权力，才能实现政治理想。要掌握权力，一、意愿要很强；二、要忍，忍耐；三、要残忍，朋友如果变成敌人，也要对他残忍。"我想前两条我可以，第三条做不到。

当时施明德也在坐牢，有次托人给我传纸条，说我们坐牢的人一定要弄出新闻，不然就会被忘掉。我没有回信，因为他是搞政治的，我是搞革命的，我们两人不是同一条路的。

对我来说，革命是牺牲，自我牺牲，其他什么都不用管。

在花莲医院

一九八五年，我身体状况恶化。我太太把保外就医的申请写了将近三十封，都不准。监狱长说：第一，你病得不够，如果癌症的话，可以。第二，你成绩不好，如果你成绩一级，可以，二级也还好，可以研究，可你坐了十几年的牢，还是四级啊！

后来把我送到台北的“三军总医院”做检查。一架飞机八个人坐，我一个，其他七个宪兵看着我。医院一栋楼的十一层，整个清场，空下来，就住我一个。别人看了还以为什么级别的将军，才有这个排场。后来，四五个月后，因为“国防部”要交钱给医院，负担太大，就把我送到花莲的军医院。在花莲两年多，住的病房有铁栏杆。有天我听到后面有女孩子的声音，爬上去看，有个女人，问我：“哎，你看我漂亮不漂亮？”吓了我一跳。后来才知是精神科。这里还用来关押刑事犯、流氓。我去了以后，把流氓集中到最后一个房间，把我放最前面。

有次流氓放风出去时，路过我监牢，问我做了什么，坐了几年。我说，合起来二十年了，他们吓一跳。监狱里排资论辈：强奸犯最低，杀人放火高一点。问到我什么罪？政治犯，叛乱。他们说：“啊，这个最大，这个是换‘国旗’的！”很尊重我，见面就给我香烟。

在花莲，包括看守，都很佩服我太太。那两年，每个礼拜，她一定带孩子来见面。原来在绿岛，交通太远，又是车又是船，费用也很大，只能每半年寒暑假带孩子去一次。现在在花莲，近了些，她差不多每个礼拜都带孩子来。那些看守说：“没见过这样的……你们夫妻感情一定很好！”去年（按：二〇- 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在马英九家吃饭时，他太太问我太太：“你都怎么去的？”我太太说：“坐夜车去，这样省下旅馆费。”

她一个人把孩子养大，小孩子教育得很好。

保外就医

我的保外就医申请一直不被接受，后来，日本的“台湾民主思考会”也发动了向蒋经国请愿、呼吁的活动。最后是靠马英九帮忙。王晓波和马英九因保钓认识，有来往，就拿了我的材料去找马英九。那时马是蒋经国的秘书，很受信任。马太太说，在纽约留学时就看到过“营救陈明忠”的广告。

所以，一九八七年三月八日太太来接见，还一点消息都没有，三月九日就让我保外就医了。那天让我上专机，我还不清楚怎么回事，以为是送医院，但怎么不戴手铐？很奇怪。后来才知道，给我保外就医了。通知我太太办手续，恰好家里电话改了一个字，开始还联系不上。后来联系上了，找两个证人，就带我回家了。在此之前，有个美国回来的教授陈文成被刑求致死的案件，舆论反应很激烈。所以送到家里，叫邻长来，咔嚓照片一拍，证明押送归来。这照片我还留着，你看，刚从狱里出来，裤上没有皮带的。（皮带，可以当武器，可以自杀，所以在狱里是不许系的。）

那天，我小女儿听说爸爸要回来，赶紧去告诉姐姐。大女儿在台大读牙医。小女儿骑车去找姐姐，太兴奋，结果在台大校园里摔倒了。

第二天报纸登出来：“陈明忠保外就医。”于是《夏潮》的朋友纷纷来找我。女儿说：“原来爸爸有这么多朋友。而且很多是报上电视上常看到的。爸爸没回来时，不知道爸爸有朋友。”

我还在牢里时，太太不让人家来，怕连累人；人家也不敢来，或者不愿意来。家里没有人来，也没有钱，很寂寞。黄春明曾经给我太太送来一笔钱。不少朋友要给钱，太太都不要。她说：“欠太多人情，明忠出来还不起。”家里就靠她教日语维持。幸好两个孩子争气，成绩都不错，上公立学校，学费很低，否则真不知道怎么生活。

过了几天，《夏潮》的人一起吃饭，算庆祝我回来，记得杨祖珺还唱《坐牢算什么》那首歌。（李娜按：来自一九四〇年代舒模作曲的《跌倒算什么》。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上海交通大学的四十多位学生在国民党的牢房里，集体重新填词，改名为《坐牢算什么》。

歌词是："坐牢算什么，我们是革命者，屠刀下不变色。坐要站着坐；死也站着死，站着死。坐牢算什么，我们是革命者。仇和恨，燃烈火；反内战，要和平。"一九六四年编入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那时，我连自己怎么出来的都不知道，别的事也搞不清楚。脱离了社会十一年啊。

14 第二次出狱之后（一九八七年至今）

一九八七年三月，我以保外就医的方式回到台湾。

那时正在“解严”前后，社会气氛特别活跃，朋友们常来找我，许多事情要讨论、推动，但在牢里待了十一年，情况一点都不了解，没法判断，心里很急。

夏潮联合会

我和夏潮的关系，在我第二次坐牢之前、《夏潮》杂志筹办的时候，就结下了。那时候，因为我们左派的文章渐渐被康宁祥的《台湾政论》排斥，就想自己来办杂志。《夏潮》本来是苏庆黎的前夫、一个精神科医师办的，他办了三期，主要是文摘。

苏庆黎从第四期开始接手编辑《夏潮》，打出“社会的、乡土的、文艺的”宗旨，以陈映真、陈鼓应、王晓波、苏庆黎、王拓等人为核心，大量介绍台湾历史与日据时期的进步作家和文学，用这个来暗中接续台湾反帝的、左派的传统；还用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批判帝国主义、分析台湾社会矛盾，可以说启迪了台湾一代知识青年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夏潮》对国民党的文化政策和现代主义文学的批判，引发了“乡土文学论战”。论战的很多文章在《夏潮》上发表，后来有人把论战的文章收集起来，出版了《乡土文学论集》，为了看到这本书，我在狱中绝食了十三天。

后来“乡土文学二十周年”座谈会时，陈鼓应发言说：“《夏潮》第一期出版的时候大家很紧张，因为陈明忠被捕了。”这么说以后，他忽然想到，问我：“哎，这可不可以讲？”我说：“可不可以讲？你不是都讲了嘛。”当时陈映真找我拿钱，钱的问题很敏感，不能公开，我被捕时如果讲出来，就没有《夏潮》了。

因为这个缘故，陈映真非常信任我。我出狱时，他正在办《人间》摄影报道杂志。《夏潮》一九七九年因为刊登写“江南案”的文章，被勒令停刊，后来他们又办过《鼓声》《春风》《生活与环境》《大地生活》《夏潮论坛》《前方》《海峡》《五月评论》等杂志，但“戒严”时代在当局的压迫下，都办不了几期。不过，《夏潮》已经凝聚了知识分子和社会运动的能量，完成了历史任务。

我出狱后不久，夏潮联谊会在济南路的台大校友会馆地下室开成立大会，主持人介绍我们夫妇，但成员大都是我不认识的年轻的人。整体上，夏潮联谊会就是以《夏潮》杂志的编辑、作家和读者为基础，结合日据时代的老台共（周合源、许月里、李南锋等），还有我们这些白色恐怖时期的老政治犯（我、林书扬等）一起成立的。开始叫“夏潮

联谊会”，一九九〇年向“内政部”登记为人民团体时，改称“夏潮联合会”。夏潮联谊会是统左派成立的第一个团体。后来的劳动党、中国统一联盟，都是从夏潮发展出来的。

所以，出狱后我重要的活动，就是通过夏潮联谊会（还有后来成立的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把老政治犯和统左派力量连接起来。林书扬早我三年出来，但他三十几年一直在坐牢，完全断了社会关系，很难和大家连接上。

“老同学”与互助会

正式的“台湾地区白色恐怖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成立前，就有一个政治犯的联谊会，比较中性，“台独”、统派都参加，一个月一次，反正一起坐牢，就一起吃饭聊天，一般不讲统“独”，只是感情的联络。

后来，有个加入民进党的“台独”派，叫蔡有全的，对这种情况很不爽，想把这个政治犯的联谊会吃掉，变成纯粹“台独”的组织。于是他就发起一个联谊总会，纲领写“台湾应独立”，把外省人和统派排除，独独留下了我。因为他搞不清楚我的背景：我“二二八”有参加，党外运动也参加，和黄顺兴、郭雨新又有来往。

这样的联谊总会成立，我们统派就很不满意。被排除的七八个“老同学”到我家来，说，我们也来成立一个会，我们人比他们多。于是开始组织我们统派的会。从我们几个人扩大，找更多的人商量。从二十多个，再扩大到五六十个，最后全岛成立一个“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总会在台北，各县都有分会，如桃竹苗分会、台中分会、嘉南分会、高屏分会等。

那时我刚回来，还是保外就医，参与政治活动很可能被送回监狱，就推荐林书扬当创会会长，大家都赞成。林书扬坐牢最久，个性温和，人品很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很高，在牢里就已经教育坐牢的可靠年轻人，写东西给他们看，很多年轻人受到他的影响。后来有人说，我推荐林书扬是大陆的意思，我说：“我现在是保外就医，说这些话，是要让我再进去吗？”

林书扬出狱后结婚了，对象是新竹一个政治犯的妻子，那个政治犯得了癌症，老政治犯们轮流照顾他，这位女性很感动。前夫过世后，经人撮合，她和林书扬结了婚。

婚礼时，全省有五六百人来，报纸上说，这些人的刑期合起来有一万年，当然是夸张了。但来参加婚礼的确实大都是老政治犯。那天也有情治单位的人来，守在门口咔嚓咔嚓照相，看都是什么人来参加。虽然“解严”了，气氛仍然紧张。坐牢的人几万个都有，参加政治受难者互助会的不过五六百，最多也不过七八百人。

有个老政治犯生病，大家去看他，他很高兴，但他太太说：“请你们以后不要来了。”这样的社会氛围，对我们发展的影响很大，戴上“红帽子”，仍然是恐怖的事情。不过，对台湾统派的发展，互助会等于是个母体。和“夏潮”连接后，劳动党、中国统一联盟，都是从这里出来的。组织互助会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工作。

后来对白色恐怖进行补偿时，因为我们互助会不愿意和当局打交道，没有在“内政部”登记，就另外成立了一个会，“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政治事件处理协会”，算是我们的白手套，两个招牌一班人马。不过处理协会是为了办理补偿，就增加了很多人，大多都是受难者家属，领完补偿后，很多人就不来了。

处理补偿时，有很多故事。有个老太太来办理补偿，说她的先生实在是非常好的人，全村的人，你问问看，没有一个人不说他好的，他完全被冤枉了，他怎么会是“共匪”呢。我们一查，她先生不但是共产党，还是干部，还有枪。那时很多人都是这样，加入地下党，家里人都不知道，都以为是因“二二八”坐牢。赖幸媛曾说她大伯是“二二八”受难者，王晓波说：“你大伯不是因为‘二二八’，是因为共产党，你想要了解的话，找陈明忠去。”赖幸媛说：“哦，陈明忠不就是陈志平的爸爸吗？”她认识我当记者的女儿。后来在杨渡女儿的喜宴上，她找我问她大伯的事情。

最痛心的事：工党分裂

一九八七年七月台湾宣布“解严”，开放“党禁”、“报禁”。夏潮想要组建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王义雄是高雄“立委”，赞成北欧社会民主主义，是民进党中难得的人（中间偏左），他退出民进党，想要组党。夏潮系统和王义雄合作，组建工党，如果成功，会成为台湾的第三势力。

那时候组织工党，确实有相当好的条件。《夏潮》和《人间》，集结了主张社会公平和统一的人。我坐牢出来，看到好多人家里都有《人间》，《人间》销量有上万份，社会影响很大。在这样的基础上，组织工党是受欢迎的。工党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希望，但情治单位和极左派，毁掉了这个契机。

工党筹备的时候，夏潮系统的人和王义雄合作，美国保钓的左派也有人回来参加。苏庆黎平常就睡在办公室，不回家，起草工党的纲领，非常用心。但她工作作风不好，她认为王是拿来当人头的，并不尊重他。内部选举主席的时候——流程是先选执行委员，由执委选主席，夏潮系统就输掉了。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搞选举。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工党成立，是“解严”后第四个登记的在野党。王义雄做了主席，罗美文做副主席，苏庆黎做秘书长。王义雄不想让苏庆黎做秘书长。我知道，我们和王义雄思想有不合的地方，但这个时候要一起做事。我就对王义雄说：“工党筹备时，纲领都是苏庆黎做的，她个性不好，没有错，但她有功劳。现在成立，你要把她开除掉，这是杀功臣啊。”

王义雄接受了我的意见，让苏庆黎做秘书长。但三个月后，他忍受不了了，又来找我，说：“按照章程，秘书长应该是我提议的，现在的秘书长是你塞给我的。我要自己找一个秘书长，如果他做不好，我辞掉主席。”

我也觉得苏庆黎不对。在工党办公室，有她的桌子，没有主席王义雄的。王来找她谈事，他站着，苏坐着。王的电话她随便摔。我想来想去，就叫苏辞掉秘书长，回美国念书，在美国做工党的代表处好了。

民进党里有“新潮流系”，我们也可以在工党里做一个“夏潮系”啊。她答应了，但和一些人一谈，又不同意了，他们坚持秘书长职务重要，不能让，要掌权。郑村棋在报纸上写了三篇文章，把很多争执的内情报道出来，对工党打击非常大。我问蔡建仁：“这是干吗？”他叫郑村棋来道歉，郑说：“小蔡是我的头脑，我是小蔡的手脚，他让我写的，现在他却让我来道歉！”郑也不满。加上报纸上情治单位的人一直攻击夏潮，这些年轻人的意气用事和情治单位在媒体上随意散布的言论，是工党分裂的关键。一九八八年工党就分裂了，罗美文的人、夏潮的人，都退出了工党。

极左派的问题是：只有自己是对的。合作就要尊重人家啊，他们做得太不像话了，只会批判人，说王义雄“走资”什么的。从美国回来的某一个人曾经拿美国左派的杂志给我看，我看到那里面对台湾左派的分析乱七八糟，根本不了解台湾的现实，以为台湾社会主义力量很强大。

所以在台湾，是要反右，但也要反左，反极左。工党的分裂，我觉得太可惜了。本来，声势很好，舆论对工党非常支持，民进党也不敢反对。王义雄是最高票当选高雄市“立委”的，他原本是声望很好的律师，信奉的是社会改良主义。虽然我们立场不完全相合，但可以合作，有合作的基础。当时工党有很多人参加，如果弄好了，会成为第三大党，会成为统左派工作的一个有力点。我痛心的是，这个时势没掌握好，时机一过，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劳动党、统联的成立

工党分裂后，我们本来打算做劳动人权协会。罗美文说不行，要建党。党的规模大，开销也比较大，要用钱。我和林书扬跟罗美文谈了很多次，互相退了一步，先成立劳动人权协会，三个月后再成立劳动党。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劳动党正式成立。劳动党的党纲中，也有统一纲领。

"解严"前后，运动多，罢工多，我们抓住的是中小企业劳工的工会，劳动党的干部主要从这里来。

劳动党组党后，苏庆黎来找我，说："世界上的左翼政党都是知识分子领导的。"她要换下罗美文，自己当主席，后来只好让她离开劳动党。

罗美文在劳动阶层里的声望很高。除了罢工的事，他在做工会干部时，帮工人争取了很多权益。国民党想收买他，准备给他一千万，还去说服他父亲。他对他父亲说："如果我拿了这个钱，我就没有脸做人了。"

一九八八年，"人民团体组织法"通过，夏潮正式登记，把联谊会改成联合会。接着我们就成立中国统一联盟，由陈映真任第一任主席，这是在劳动党成立之前的事。一九八九年发生了"六四"事件，陈映真带着中国统一联盟代表团去访问大陆，这个举动当时在台湾压力很大。统一联盟是对统一的时间和方式都不讲，只要赞成统一的就可以加入，等于是统一战线，知识分子比较多，比较受大陆重视。

少数民族部落工作队

台湾少数民族同胞的部落工作队是张俊杰带起来的。他本来是统联和夏潮的秘书长，一九九九年“九二一”地震时，他带着一队人去少数民族山区赈灾，接着就成立了少数民族部落工作队。他们是统左派的“别动队”。少数民族要的是自治，但做起来的事情都是有利于统一的。

从二〇〇二年开始，部落工作队去东京的靖国神社抗议，要求“还我祖灵”，把神社中台湾少数民族的牌位拿出来。起因是前一年（二〇〇一年）在东京开有关中国统一的会，有个日本朋友来找我，说反靖国神社，冲绳、韩国都参加了，没有台湾地区，台湾应该参加。我觉得靖国神社的事不好弄，也搞不清楚靖国神社里有没有台湾人，我们都没有认识的遗族（也不知往哪里去找遗族）。所以只答应合作，回台湾再找找遗族。后来有个日本的朋友服部良一，我第二次被捕时曾经营救我的人之一，拿来加藤邦彦的一本书《一视同仁O果乙：台湾人元军属O境遇》(东京：劲草书房，一九七九)，讲到几个少数民族同胞自己去过靖国神社，要求把祖先的灵魂拿回来，是新竹县尖石乡的。我问张俊杰，他说，有这回事，云力思（张的太太）的两个叔叔就是被日本人调去打仗死掉的。所以我们就请他们夫妇帮忙找出少数民族的遗族，了解他们的困境并带他们去参加“还我祖灵”运动。

以前工作队在山地乡展览过日据时代的照片，包括日本军队对少数民族执行“三光”政策的照片，让少数民族有自己的历史意识，然后再发展少数民族运动，冲击靖国神社其实也是这个工作的一部分。

二〇〇二年第一次去靖国神社，在日本就很轰动，大陆的媒体也都报道了。日本的左派用的是法庭斗争，我们是要搞行动的，但双方的合作终于使大阪高等法院在二〇〇五年九月做出“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违宪”的判决。这是日本史上的头一次。因为反靖国神社，高金素梅成了民族英雄。整个行动的组织者是张俊杰，他特别有行动能力。

在台湾，作为统派

大陆对台湾内部情势了解得不多，一般人只知道台湾有蓝、绿。有个大陆人来，问我是蓝还是绿，我说，我不是蓝也不是绿，是红的，他吓了一跳。

在台湾，整个发展对统派是不利的。“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一直这么说，一般人也都这么接受的。台湾媒体对大陆的正面报道很少。“维持现状”是台湾多数民意的选择，而当苏联、东欧“既存”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社会主义”被污名化时，台湾的“统左派”实在难于扩大影响。

统联很难壮大，是有现实原因的。参加统派的团体没有钱，没有办法生活，人们也要考虑自己将来的出路。劳动党有人，有群众，但问题是只属于地区性的，没有建立起全岛性的组织。做得好的只是新竹地区，罗美文、黄秋香夫妇长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所以高伟凯才可以选上县议员。高伟凯对劳工的服务做得非常好，否则也不可能当选。现在台湾社会的“阶级矛盾”虽然占着基本矛盾的地位，但主要矛盾却是统“独”矛盾，所以讲阶级斗争，劳工也没有多大兴趣。

台湾统派要发展，思想要统一，大家要有共识，再培养干部。如果我们本身没有一个健全组织的话，就难以发展了。

我们对台湾两党的态度，是两个烂的里面选一个，至少国民党不破坏两岸关系，所以只能选它。

二〇〇五年连战想访问大陆，郑丽文来找我，要我去国民党中央党部演讲，顺便推连战一把，让他去访问大陆，即后来所谓的“破冰之旅”。

我曾经在《日本投降前后的日子的一些回忆》一文中说：“九月我收到了改名为‘省立台中农业专科学校’的入学通知单。到了台中以后，最让我吃惊的是，街上十字路口旁常有二十到三十个年轻人，围着圈弹风琴一起学‘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到处也都有自发性教人国语的小型团体，这让我感到十分震撼，也深深感觉在思想上我真的比那些人落后太多。”

两年后“二二八”事件发生，我在“‘二二八’最后一役”之地的埔里看到了当年教唱“国歌”、教学国语的那些人围在谢雪红旁边、听谢雪红指挥的情形。

三年后五十年代白色恐怖肃杀全面展开，我更在“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里，看到了那些人从容就义的最后一幕，这也就是，由于“二二八”事件而抛弃“白色祖国”、走向“红色祖国”的那批爱祖国、爱人民的热血青年的下场。

一九五〇年我被捕、判决后被送到绿岛新生训导处，大约两年后，又被送到新店军人监狱，一直到一九六〇年释放。在这期间所遇到的所谓“台独案”的人们只有黄纪男等数人而已。这里我之所以用“所谓”两字的意思是说，他们本来并没有承认自己是“台独案”而是说属于“托管派”。其他白色恐怖早期的牺牲者和受难者，不论本省人或外省人，绝大多数都被戴上了“红帽子”。

白色恐怖时期真正的“台独案者”，是在一九六〇年后才逐渐增加的。我本身所遇到的第一批“台独案”是一九六〇年将要出狱时搬进同房的几个海军士兵（就是一九五八年以许昭荣为首的所谓“海军台独案”）。这就是说，一九六〇年前后，“台独案”增加的时间点，正符合海外“台独”运动的开始时间——王育德在日本成立“台湾青年社”的时间为一九六〇年，而“台独联盟”是一九七〇年才在美国成立的。因此我一直怀疑“台独”的“‘二二八’起源论”，而研究台湾历史的戴国辉教授也说：“‘台独’运动的形成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契机，是国民党退到台湾来以后的事情，与‘二二八’事件无关。”

一九八七年，我获准“保外就医”，一九八八年蒋经国去世后获准减刑，到一九九〇年才获准出境。于是当年就去日本、美国，向营救我的那些人道谢，并顺便在日本购买一些“台独”人士所写的书。稍微做了研究后发现：“台独”运动领导人中，毕业于台南一中、嘉义中学的、位于台湾最大农地“嘉南平原”的人特别多，而北部、中部地区明星高中的毕业生却不多。再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后，终于得知：“台独”运动实际上是因国民党政府土地改革而没落、远走美日等地的地主子弟所发起的反国民党运动，他们进一步和台湾中小企业主结合而壮大，而这些中小企业主中许多人也是由地主转型的（他们是在土地改革后获得“四大公司”股票，经过经营发展起来的）。

我认为，“台独”的“土改起源论”，才能够解释日据时代台湾的抗日领袖之一的林献堂为何远走日本且援助“当时”主张“台独”的邱永汉以及台湾第一个“党外”出身的市长（叶廷珪）产生于台湾最大的地主集聚地“台南市”等事实。

二〇〇四年，“立法委员”选举时，导演侯孝贤主持的“民主学校”提名蓝博洲（苗栗县）、郑丽文（高雄市）等人参选。选举全盘挫败后，侯导慰劳大家吃饭。在吃饭时我才头一次见到郑丽文。闲谈中提到“二二八”事件时，我提出以“土改起源论”反驳“台独”的“‘二二八’起源论”。“台独”的“土改起源论”从前没人提过，郑丽文似乎认同我的看法——郑丽文和蓝博洲在赵少康的“飞碟电台”上对谈时，提到我的“台独”“土改起源论”。因此二〇〇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在中央党部举行纪念会时，郑丽文要我去演讲。由于我的经历令国民党内部一些人担心我会讲出对国民党不利的话来，郑丽文要我提出“发言稿”，同时告诉我：连战本来想在二〇〇四年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就去一趟大陆，却由于“两颗子弹事件”落选而去不成。所以她问我对连战去大陆一事，是否可以推一下？对我来说，这当然是求之不得之事。

所以我以“‘二二八’事件当事人、台湾最后一个政治死刑犯”的身份所发表的《“二二八”：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讲稿中提出两个重点：

其一是：以“台独”“土改起源论”否定“‘二二八’起源论”，否定“台独”的道德正当性。

其二是：我的家庭（包括我太太那边）是因为“二二八”和白色恐怖而受苦最惨的当事者之一，但是我今天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并不是为了个人家庭的悲惨遭遇来讨什么公道的，我只希望同样的苦难不要再发生在任何一位台湾人的身上。国共两党长期内战，才会使得很多人民被牵扯进去，造成极大的牺牲。现在台湾的族群问题很严重，其根源就在国共内战问题。因此台湾各政党如果对“二二八”有真正的理解与彻底的反省，光是道歉或补偿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能解决发生悲剧的历史根源，结束两岸的敌对状态，缔结两岸和平协议。这也正是我在“二二八”纪念日的前夕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原因。因为，这正是国民党不能推卸的历史责任和义务，也是连主席的责任和义务。我希望连主席能代表中国国民党前往大陆，与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历史性的大和解，结束两岸的内战状态，让类似“二二八”的悲剧不再重演。然后将一把象征两岸和解的“和解之钥”交给连战，期许他勇敢负起结束国共内战

的责任。连战紧接着也发表了题为《抛弃敌对，期待和解》的讲话呼应，并当场指定副主席江丙坤率团登陆破冰。

据说，之前郁慕明曾多次劝说连战出访大陆；党内人士如新任发言人郑丽文、大陆事务部主任张荣恭等人也高度期待连战出访大陆。但连战本人对《中国时报》表示，今年（按：二〇〇五年）“二二八”纪念日受难家属建议他，国民党应从两岸和解着手，弥平伤痛，让他有很大的启示，于是他决定先派副主席江丙坤借总理孙中山先生逝世八十周年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九十四周年纪念的机会，率团访问大陆。

统派与左派

大陆改革开放后，台湾左派分裂了。之前，社会主义和统一是一体的，对大陆改革开放的看法的分歧，造成台湾统派和左派的分裂。台湾的毛派，认为大陆的改革开放是“走资”。当年在美国保钓的那些人说，劳动党的纲领里有统一纲领，如果去掉，我们就可以参加。他们受“文革”的影响，到现在还是这样，所以反对改革开放。左派里的年轻人，受他们影响很多。

大陆社会的确有许多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也令大家迷惑。以前说社会主义的特征是计划经济、国有制，现在没有标准了，大家各说各话。

有篇文章谈到陈映真小说《山路》里那些政治犯出狱后，对大陆、对社会主义感到迷惑，以为革命堕落了。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好好理解。

前面我已说过，在第二次坐牢时，读到一些伤痕文学的作品，了解了“文革”的某些事情，我感到很痛苦，不知道中国革命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几乎活不下去。我在狱中，还有在出狱之后，一直努力想要理解中国革命的经历为什么会这么曲折。我已经把我阅读、思考的结果写成了一本书，即《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人间出版社，二〇一一）。我在那本书的序言《寻找社会主义的心路历程》里，已经比较详尽地叙述了我的思考过程，并且简要地说明了我的结论。现在就把要点节录于下：

一九八七年保外就医后回到台北，开始跟“解严”前的社运团体产生联系，我又不得不面对另一个冷酷的事实：“统”和“左”的分裂，即赞成“统”的人不一定是社会主义者，而赞成社会主义的——主要是年轻一辈的人——又对统一采取消极的态度。

赞成“统”的人不一定赞成社会主义，这一点比较易于了解——因为民族主义者即使是反共，也可能赞成统一。

民族主义是双刃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内涵。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如德国的纳粹、日本的大和民族论等等，往往成为侵略的意识形态。但落后国家反殖民、反压迫的民族主义，不应该一概以落后反动而加以反对。据我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把民族主义视为国际主义的反命题，反而把它当作达到更高层次社会的自然垫脚石。列宁对民族主义的看法，简单地说，是在劳工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方面从头到尾地反对民族主义；但对表现于少数民族、殖民地、次殖民地自主要求的民族主义则予以积极的评价并加以支持。

问题是，正当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围堵中国，积极准备推翻共产党政权的状况下，台湾的左派为何不能赞成统一呢？既然统一的问题，是起因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为了其自身的目的迫使两岸处于分裂对峙的状态，自认为左派的人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基本原则上，不是应该赞成统一的吗？为什么还是有一批人对此感到迟疑？后来，经过广泛的接触我才了解，在台湾"统"、"左"之所以分裂，是起因于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评价不同。一部分左派认为那是"走资"，所以即使不至于反统，至少是采取消极态度。当然"改革开放"政策的是非对错是应该讨论的，但我们应该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讨论。

为了解答在牢里所想的各种问题，出狱后我至少阅读了上百本书，却一直找不到思考的切入口。

一九九二年，朋友从北京带回薄一波上下两册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在该书里我看到了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评价。薄一波提到列宁一个重要的观点：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注意的一个带有"普遍性"意义的重大问题，就是如何更加重视和利用资本主义已经创造的物质技术管理和文化条件的问题。薄一波又说，看来刘少奇同志的有些看法，是从列宁的这些论述中得到了启发……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特别是经历了一些曲折之后，大家才愈来愈感受到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这些思想的重要性和深刻性。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终于找到了思考的切入口。

后来，在研究新经济政策时，我注意到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E. Preobrajensky)在苏联的工业化论争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一个概念。据我所知，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积累”就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历史过程，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便是以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作为前提的。所以，将“原始积累”这个概念使用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形成时期，令我产生一个疑问，那就是：一般认为苏联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是布尔乔亚革命，而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否是一个正确的提法？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形成时期使用“原始积累”这个概念，是否证明十月革命并非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样，是落后国家“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社会革命”?

如果是，那么列宁“既然我们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然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的提法，就可以理解为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走的是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另一条道路了。

于是，我开始形成了“从新经济政策——新民主主义到后来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论”这一条“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想法了。

现在，我把二十年来读书、思考的一些想法，用最清楚的方式简述如下：

一、有别于马克思在经典中所揭示的西欧资本主义的一般发展规律，上个世纪诞生在苏联、中国以及其他“既存”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不能叫作“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社会革命”，这是落后国家为了实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和文明条件，以建立工农政权和苏维埃体制为基础来展现“走向社会主义”的决心，这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期”。

二、这些“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社会革命”都是在后进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后进国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摆脱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压迫与剥削。先进国劝告后进国说，只有学习他们，跟着他们亦步亦趋，才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完全是骗人的。后进国如果听先进国的话，就会永远做先进国的附庸或奴隶。

三、后进国在“社会革命”成功后，首要任务就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国情，以符合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集中全国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所谓后进国家的“原始积累”。先进国是靠资产阶级的力量、靠国家的暴力往外殖民、往外掠夺，发展生产力的；后进国必须靠全国人民一心一德，一起吃苦耐劳，也就是必须自力更生，才能在短期间内大幅度提升生产力。

四、在后进国集中全国力量发展生产力时，必然面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围堵、分化和打击，导致后进国家被迫实行“战备体制”，随时准备抵抗先进国的侵犯。生存下去就成为“既存”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任务。

五、由于建立“战备体制”的迫切需要，“既存”社会主义国家被迫扭曲了社会生产基础的积累构造，直接将农业剩余转移来建设重工业和军需工业部门，以至于忽略了整体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挫折了人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

六、“战备体制”另一个重大影响，就在于过早地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从而忽略了列宁称为“特殊过渡阶段”的国家资本主义时期。列宁认为，应该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在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强化、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同时应慎重实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小商品生产经济成分等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养成、利用、改造政策等。完成后，才是真正进入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所说的（进入社会主义的）“过渡期”，然后才是社会主义时期和共产主义社会。对此，列宁、刘少奇、邓小平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而斯大林、毛泽东却直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他们忘记了，这个时期，“既存”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还远远不如资本主义国家。

七、斯大林、毛泽东以社会主义的“理想”来规范“既存”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现实，将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指标，导致苏联和中国在生产力发展上的停滞。苏联政权没有及时意识到这一点，改革太晚，所以苏联政权崩溃了。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及时改弦更张，不但挽救了中国，还使中国继续往前发展。

八、中国共产党把改革开放时期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实就等于列宁的“特殊过渡阶段”，把改革开放称为“走资”，其实是固守毛泽东的观点，完全无视历史的现实。所谓“特殊过渡阶段”就是多种所有制并行发展的阶段，不能不按照价值规律办事，要引进市场经济以便迅速提高生产力。这一点，不但已经由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证明，现在不仅越南推行Doi moi(创新)，就连古巴也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越南的Doimoi为参考而将要确立“古巴社会经济模式”(简称MEC)——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公布《党与革命的经济、社会政策概要》，以达到“二十一世纪型社会主义”为目标。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根据这段话，只有全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到某一个阶段，人类才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放眼现在的世界，像非洲、拉丁美洲、伊斯兰世界，还有印度和东南亚国家，许多民众的生活条件都还在水平线下，我们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甚至在自己活着的这一生内，就达到社会主义的理想呢？社会主义是人类永远要朝这个方向努力的目标，我们在自己的一生内努力尽到自己的责任，就可以感到心安；如果想要“及身”看到社会主义的实现，我觉得那是一种不着边际的幻想。以这种幻想来要求某一个国家一定要如何如何，而对另外表现更恶劣的国家却闭口不作批评，我不认为这是自命为“左派”的人应该有的态度。

我现在认为，极左派的特质是不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否定事物的辩证发展过程，想要一步登天，认为人类可以在“一夕之间”成为“新人”，并造就一个“全新的社会”。再没有比这个想法更违背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的了。我认为，现在号称左派的很多台湾年轻人，常常犯了这种轻忽历史的毛病，他们把人类社会的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人活着总希望可以多做一点事情，但时势使然，人有时候可能白白活了一辈子。回顾我的一生，从大形势来看，我对我这一辈子还是满意的——我开始反抗日本人的时候，中国还在艰苦地抗战；我加入地下组织的时候，国共正在打内战；我第二次出狱的时候，中国还处在改革开放的艰难时期，现在中国大陆不论在经济实力上还是在国际地位上，都节节上升，已经仅次于美国。而且美国的实力也愈来愈弱，而中国的实力还会继续增强，中国人终于可以在世界上扬眉吐气，我高中时所经历的那种痛苦的民族屈辱可以大部分洗刷干净。

我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发展成这个样子，我自己觉得是蛮满意的。这就是说，我生错了时代，但没有做错事，就这一点来说，我没有遗憾。再说，我大概有生之年看不到两岸统一了，更不可能看到终生向往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这是小小的遗憾。不过没有关系，大趋势是挡不住的，我已经知道，统一不成问题，而人类社会最终还是要朝着“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前进的。

一个台湾人的统左之路——陈宜中 吕正惠采访

此访谈于二〇〇八年一月十四日下午在吕正惠家进行，由陈宜中、吕正惠提问（大部分的提问只是引起话题，最后谈到两岸关系及大陆现状，都是由陈宜中问），郑明景录音，陈福裕也在场。录音由郑明景、陈福裕两人整理，再由吕正惠简单修改文字，调整部分访谈的顺序，并加上小标题，以醒眉目。最后，由陈宜中、陈明忠确认、修订。

一、“台湾人的悲情”来自日本的统治

问：陈先生，您的经历非常特殊，我们今天的访谈，事先没有设定一个问题表，您想怎么谈就怎么谈，请从您最想说的谈起。

陈：我想先谈“台湾人的悲情”。民进党说，“二二八”是台湾人的悲情。这根本不对。以我的经验，台湾人民在日本的统治下，没有任何尊严可言，这才是真正的“台湾人的悲情”。我因此知道自己是“清国奴”，是中国人，才开始起来反抗，我的一生从此就改变了。

如果要讲悲情，就要从日据时代讲起。日据时代，台湾人是二等国民，被欺负到什么程度？我的思想改变是从高雄中学开始的，当时我们一班五十个人，只有十个台湾人，其他都是日本人。我经常被骂是“清国奴”，动不动就被打，我搞不清楚为什么。后来，我才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对我冲击很大的事情是，有一次我和一个日本同学打架，事后来了十几个日本人打我一个，最后跟我讲一句话：“你可以和内地人（按：日本人）打架，但不可以打赢。”这对我冲击非常大。不是说一视同仁吗？我一直以为我是日本人，但台湾人和日本人打架却不可以打赢，这是怎么一回事儿？我的脑筋开始产生混淆，两三年以后才知道原来我不是日本人，是中国人，思想才整个转变过来。

我感觉到在日据时代作为台湾人，真是一点尊严都没有。例如，当时村长在乡下都是有声望的人，是我们尊敬的人。但是，日本的警察叫村长跪下，村长就要跪下，这在我们看起来，实在是太瞧不起台湾人了。日本人跟台湾人的薪水也不一样，同样的学历，日本人的薪水比台湾人高百分之六十，为什么会这样？再举个例子，我认识一个人叫作林金助，是石油公司的工友，给大家烧开水泡茶的。可是林金助这个名字日本人也有。有一天上面有人来视察，从名册上看到名字，以为他是日本人，马上升他当雇员，因为日本人是不能当工友的。日本人可以当劳动者，就是不能当工友给人服务，不能倒茶、扫地。你想，当时身为台湾人是什么感觉？我们是“二等公民”，甚至是“三等公民”（因为还有琉球人），一点尊严都没有。我家是大地主家庭，我每天有牛奶喝，但因为在日本人面前没有尊严，才知道尊严最重要。我家的佃农在我面前也没有尊严，就像我在日本人面前一样，所以，我开始反抗日本人的统治，也开始转向社会主义。所有的台湾人，在日

本人面前都没有尊严，那我们台湾人是什么东西呢？难道这不是“台湾人的悲情”吗?

二、“二二八”不是省籍冲突

问：那您怎么看待“二二八”？

陈：“二二八”是反抗，反抗国民党的恶劣统治。“造反有理”，这是人民的哲学。“二二八”是反抗，不是悲情。

问：您反抗日本人，又反抗国民党政府，这有什么不同？

陈：当然不一样。日本人是外国人，他们瞧不起所有中国人（包括台湾人）；国民党是中国人的政府，它是一个不好的政府，我们是反抗一个我们自己的不好的政府。“二二八”时，我们反对的是一个恶劣的政府，而不是所有外省人。当时从大陆来的人，好坏都有。台中农学院的外省老师，包括院长（就是校长），学问好，思想开明，我就很尊敬。我不但不反对他们，还保护他们。“二二八”事件期间，我把他们集中起来，请我的学弟林渊源（他后来当过高雄县长）照顾他们。

问：照您这样讲，“二二八”就不是省籍冲突，至少主要不是省籍冲突？

陈：“二二八”本质上是一个反抗恶劣政府的行动，不是省籍冲突。当然有些本省人情绪激动，打了外省人，这是有的，但不是主要的。你们还要注意，当时的省党部和陈仪是作对的，他们要把事情闹大，好搞垮陈仪。蒋渭川是省党部的人，他找了一批打手，专打外省人。他故意制造纠纷，就是要把事情闹大。

我们在台中开大会斗争台中县长刘存忠，因为他贪污。民众要把他处死，谢雪红说，他有罪，但罪不至死。民众又喊要割他耳朵，谢雪红又说，那太残忍了。民众说，那就打他，于是谢雪红让一些人上来打。这可以证明，反抗的人相当节制，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但蒋渭川这个人你们要注意，他是省党部李翼中的人。“二二八”之后，他当了台湾省民政厅长。我第一次坐牢之前，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九日的“中央日报”上（按：此时陈先生拿出复印的剪报资料），看到一则怪异的启事，内容是“庆祝蒋渭川、彭德、李翼中、林日高等四人出任民政厅长、建设厅长、省府委员”。在贺词的下面有二十一人署名同

贺，名单中好多人竟然都是在“二二八”事件中遇害或行踪不明的台籍人士，像林茂生、王添灯、林连宗、宋斐如、王育德的哥哥王育霖，还有陈妍。我后来坐牢时，才听说这则启事是地下党（共产党地下组织）吴思汉刊登的。吴思汉为什么要用这些人的名义来刊登？因为据说这些人之所以被害，都是蒋渭川告的密，所以吴思汉故意用他们的名字以示抗议。蒋渭川是CC派，他的老板是台湾省党部主委李翼中，也是CC派。那时候被打的外省人，很多都是蒋渭川的人打的；蒋渭川找了一批流氓，到处捣蛋，要把政学系的陈仪斗倒。陈仪很气，要抓蒋渭川，结果被蒋跑掉了，蒋被李翼中保护起来。蒋渭川的女儿，为了保护父亲，挡在蒋渭川前面，结果被陈仪派去的人杀了。

李敖曾说，“二二八”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台湾人杀外省人，第二个阶段是外省人杀台湾人，第三个阶段是台湾人杀台湾人。李敖的说法太夸张了，很容易引起误解。第一个阶段，一些外省人被打，少数人被打死，蒋渭川的打手到处乱打人；第二个阶段，外省军队从基隆登陆，一路开枪扫射，但因为大部分台湾人躲了起来，所以只有在街上的人，才会被流弹打中；第三个阶段，国民党捕杀了一些台湾知名人士和地方领袖，其中不少人可能是蒋渭川开名单密告的，所以李敖说“台湾人杀台湾人”。李敖讲话是很生动，但太夸张，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二二八”是省籍冲突。

当时，我们根本不觉得“二二八”是省籍冲突。我们要反抗的不是外省人，而是贪官污吏。但是，贪污的人都躲起来了，倒霉的却是一般的外省人；有些外省人挨揍，还有些被打死了。所以，“二二八”的性质并不是省籍冲突，而是反抗国民党暴政，是政权跟人民之间的冲突。

坏的人是那些贪官污吏，但我们学生对外省老师的印象就比较好。因为，那时候来台的外省老师很多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左派的也很多，比较进步，比较讲民主，跟学生相处很像朋友。台籍老师受日本人影响，权威性较强，讲话都是用命令的，所以学生对外省老师比较有好感。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说法，黄春明也这么讲（他的外省老师因为是共产党，后来也被枪毙了）。

关于“二二八”，我还可以说两点。民进党一直在制造一种印象，让人觉得，“二二八”时国民党在台湾进行大屠杀。依我的了解，“二二八”死的人，大约在一千上下。一九五〇年我被捕时，在狱中跟台湾各

地的难友聊天，了解各地的状况，据我当时估计，大概就是这个数目。后来，民进党成立了“二二八”赔偿委员会，列了一大笔经费，到现在钱都还没领完。据我探听，领的人不超过一千人，而且其中有一些还是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领的。民进党完全不公布这个消息，还继续炒作，实在很不应该。

还有，陈映真跟我讲过，有一个外省老师，看到接收人员欺压台湾人，非常不平，写了几篇小说加以揭露，发表在上海的文艺刊物上（按：这些作品已收入人间思想丛刊《鹅仔》，人间出版社，二〇〇〇年九月），可见“二二八”主要是“官民矛盾”，不是“省籍矛盾”。

三、白色恐怖是国民党镇压人民，不分省籍

问：您的说法跟民进党的差很多。有些“台独”派说，“二二八”是“台独”运动的起源，您不同意吧?

陈：好多人（尤其是“台独”派）说，“二二八”是“台独”运动的起源。这个说法我不同意。“二二八”是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的事，但是一直要到我第一次坐牢出狱的那一年，一九六〇年，才有人因为“台独 " 案件进来坐牢。另外，“台独”派在日本成立“台湾青年会”是一九六〇年，“台独”联盟是一九七〇年在美国成立的。怎么看，时间上都差太多了。

光复以后，台湾人热情欢迎祖国军队的到来，可见他们对日本的统治有多反感。后来看到祖国的政府这么糟，才开始想，要怎么办？然后大家才了解到，原来我们的祖国有两个：一个是共产党的红色祖国；一个是国民党的白色祖国。既然压迫我们的是国民党，是白色祖国，于是年轻人就开始向左转，向共产党那边靠拢。当然，当中有些人像我，在日据时代本来就已有社会主义思想；但是，也有些人是因为反对国民党的暴政，才转向共产党的。所以，当时在共产党里面有这两种成分，一种是日据时代就有社会主义思想的，还有一种是“二二八”以后对国民党不满才向左转的。在第二种里面，有些人日后因为反国民党而变成“台独”，李登辉就是一个典型；不过在当时，即使是第二种人，也是向左转的，而不是主张“台独”。根据后来“警备总部”的资料，“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党员只有七十二个人；但到了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全部抓完之后，共产党员总计有一千三百多人。从这个对比，你可以看出“二二八”以后年轻人向左转的大趋势。

问：您现在谈到“二二八”以后台湾社会的变化，接着就是白色恐怖，您对白色恐怖有什么看法?

陈：国共内战国民党失败，撤退来台湾。当时我们认为，“解放台湾”是迟早的事，但没想到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竟然侵犯中国主权，开入台湾海峡。有了美国保护，国民党像吃了一颗

定心丸，就开始大量逮捕、屠杀反对它的人，特别是潜伏的共产党地下党员。

我要特别强调，白色恐怖，是国民党对于人民的恐怖统治。凡是被认为有可能反对国民党的人，不分省籍，也不管有没有证据，就一律逮捕。我被捕以前，大概是一九五〇年的五、六月间，报纸登出地下党领导人蔡孝乾投降的消息，他呼吁所有地下党员出来“自清”。当时蔡孝乾所供出的共产党员共有九百多个，主要是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系统（简称“省工委”），加上别的系统（包括搞情报工作的）。受难的共产党员共一千三百人左右。可问题是，按照谢聪敏引用的“立法院”的资料，整个白色恐怖时期因涉及“匪谍”案件被捕的人数就有十四万到十五万人，可见其中大多数人是被冤枉的。就共产党员来说，他们是“求仁得仁”，是无怨无悔的；但是就大多数受冤枉的受难人和他们的家属来说，白色恐怖当然是“悲情”。另外，根据台大社会系范云的估计，在十四万到十五万受难人当中，约有百分之四十是外省人。当时外省人占台湾总人口数不到百分之十五，由此可见，外省人受害比率非常高。所以说，白色恐怖不仅是本省人的悲情，更是外省人的悲情。所谓“台湾人的悲情来自于‘外来政权’的统治”这种泛绿阵营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正确地说，白色恐怖应该是“白色统治阶级对所有被统治阶级的恐怖行为”，是国民党对所有台湾人民（包括外省人）的恐怖统治，与族群矛盾没有关系。

四、为什么认同“新民主主义革命”?

问：陈先生，您愿不愿意谈谈“二二八”以后您政治态度的改变?

陈：“二二八”前后，我对国民党这个政权已经彻底失望。但当时我听说，大陆还有一个共产党，是主张革命的。后来，我就知道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毛泽东说，中国是处在半封建半殖民的阶段。一方面，我们受制于封建传统，譬如，中国还有很多大地主，许许多多的佃农整年劳动，负，起来反抗，被日本人关了起来。国民党来接收的时候，还特别派人把他从监狱迎接出来。“二二八”之后（那时候，他已经是台大医院的医师），他也加入了地下党。白色恐怖时被抓了，国民党要他投降，他宁可被枪毙，也不肯投降。跟郭琇琮同时枪毙的，还有许强和吴思汉。许强是台大内科主任医师，在日本读医科时，日本人很佩服他的才智；他们说，如果诺贝尔奖有医学奖，许强有可能得到。吴思汉原本在日本学医，放弃了，偷渡到朝鲜，一路跑到重庆。在当时的“中央日报”上，他发表了题为《寻找祖国三千里》的文章，轰动一时；为了表示对祖国的情怀，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思汉”。后来，他们思想都改变了，转为支持共产党，被捕后宁死不降。他们这些人都比我们没被判死刑的人，优秀得太多了。当时这样有才能又勇敢的台湾青年很多，最杰出的都被处死了。

“台独”派说，“二二八”把台湾的精英杀了许多。这一点也不准确，因为“二二八”杀掉的知名人士并不多，而且大半是年纪较大的。白色恐怖杀的青年人就不知多了多少倍，他们都是台湾未来的希望。应该说，台湾人才的断层，关键在白色恐怖。当时还有很多岛内的外省朋友，也跟我们一样，一起合作，想要打倒国民党。这样，你们就能了解，为什么国民党有了美国保护之后，就开始逮捕、屠杀，而且牵连那么多无辜的人。你想想看，地下党听说只有一千三百人，而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却多达十四万到十五万人（保守估计），你看这个政权有多残酷！

五、“台独”运动是地主阶级后代搞出来的

问：照您所说，从“二二八”到白色恐怖，其实都是政权跟人民的矛盾；这个政权在压迫人民的时候，是不分省籍的。但是，国民党政权毕竟还有另外一个面向。当年老蒋几乎完全用他带过来的外省精英统治台湾，所以还是种下了省籍冲突的祸因，以至于“台独”派日后不断炒作族群议题，甚至把“二二八”和白色恐怖都讲成是“外省人杀台湾人”的族群杀戮。您能不能进一步对“台独”运动做更细部的分析？

陈：刚刚说到，“二二八”一直被讲成是“台独”运动形成的原因。我认为时间不对。“二二八”是一九四七年的事情，开始有“台独”政治犯却是在一九六〇年左右；在那以前，只有廖文毅等几个人是“台独”政治犯，其他通通是红帽子。王育德在日本成立台湾青年会是一九六〇年，美国“台独”联盟的成立是一九七〇年，和“二二八”相距太远了。“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的年轻人是向左转，而不是转向“台独”。“台独”的概念是从土地改革才开始的。当然，土地改革是应该的，但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看法就不一样。我自己家里是地主，有好多亲戚也都是地主；他们的感觉是：国民党在大陆根本不做“耕者有其田”，来台湾才向台湾人下手，是要把台湾地主的势力消灭掉。

同时，土地征收的价钱也差很多。台湾是两期稻作，中间种杂粮，但是征收土地的计算方式是以两年的稻米收成来计价，中间的杂作不算。国民党一方面用战争末期的粮食价格作为计价标准，让土地变得很便宜；另一方面又把市面上只值一两元的四大公司（台泥、台湾农林、台矿、台肥）的股票，高估为十元来作补偿。这一来一去，原本二十元的东西变成一元，所以很多人不满意。

地主不满意，可是没有办法。因为白色恐怖，反对的话就会被抓起来，所以什么都不敢讲。但是因为他们家世好，早期到日本、美国的留学生都是他们的子弟。在海外“台独”人士当中，台南一中和嘉义中学的校友比较多；一半以上的“台独”干部，都是这两个学校的毕业生。因为最好的土地都在嘉南平原，嘉南地主的子弟就变成了海外“台独”的主力。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林献堂。在日据时代，他领导台湾文化协会反抗殖民统治；他曾经因为去大陆访问时说了一句“我终于回到祖国”，回来后被日本流氓当众打耳光羞辱。这么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一

旦阶级利益受到伤害，便放弃了民族意识。土地改革后，林献堂跑到日本去，还曾支持邱永汉搞“台独”。这也是为什么台湾有县市长选举以来，第一个党外的县长是台南市的叶廷珪，因为台南是地主窝。还有，地主阶级也因为“耕者有其田”拿到四大公司的股票，又经营中小企业发达起来，于是渐渐形成势力。

台湾内部的中小企业家，和在美国的“台独”组织，这两股力量一合流，“台独”就发展了起来。所以，“台独”运动事实上是台湾土地改革的结果，是地主阶级的运动。这是我个人长期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我第一个讲的。可惜我以前收集的资料都散失了，但这个题目可以好好研究。

六、“皇民化”意识的复活是国民党的统治造成的

问：您这样讲“台独”运动，跟现在的流行说法相差很大。刚刚讲到日据时代，当日本人来台的时候，反日抗争死掉了很多人，“皇民化教育”是后来的事情；所以郑鸿生会写到他爸爸跟他祖父两个不同世代，对祖国的感情不太一样。也许有人会说：陈明忠先生当初在雄中被欺负，产生了抗日意识和中国认同，这可以理解；不过，另外也有一些受“皇民化教育”的人，愿意为日本人打仗；因此，陈先生的经验或许有一些代表性，但是也有另一些人对“悲情”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更进一步来讲，可能也有些“台独”派人士会说：陈先生讲到的日本人对台湾人的欺压，其实正是“台湾意识”或甚至“台独意识”的种子，而不见得会导向中国认同。您怎么回应这些说法?

陈：其实不用把“皇民化”看得那么成功，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儿。我举个亲眼看到的例子：光复前我住在乡下，那时候日本快打输了，要训练台湾的兵员。年轻人上过日语小学的还可以，但要训练三十多岁的壮年兵就有问题，因为大多数都听不懂日语。班长训练踏步走，用日语喊“左右、左右”，但台湾兵听不懂，变成了同手同脚。为了让台湾兵听懂指令，班长只好用台湾话讲“碗筷、碗筷”（碗代表左手，筷子代表右手）。你说，对这些人来说，“皇民化”能起什么作用？连日语都听不懂。再举个例子：有一天，我的同学迟到，老师问他为什么？他用日语回答说：“我家的猪妈妈发神经，叫猪的哥哥来打。”老师当然听不懂。其实翻成闽南语，就是“我家的猪母起哮（发春），叫猪哥（种猪）来打（交配）”。像这样子，怎么“皇民化”？所以说，“台独”的“皇民化”论述事实上是台湾地主阶级的论述，跟一般台湾民众没有关系。如果说“皇民化”的效果那么大的话，就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日本投降的时候很多日本警察被打？譬如说，郭国基就把以前刑求他的日本人，带到半屏山杀掉。如果“皇民化”那么成功的话，为什么光复的时候会有那么多人去欢迎祖国军队？更没办法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青年在“二二八”事件后向左转。“皇民化”成功的话，不会是这样。近年来“皇民化意识”的重生，是因为国民党统治失败的关系。也就是说，“台湾意识”之所以会变质为“台独意识”，其实也跟国民党来台湾统治有关。

如果“台湾意识”所意味的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民，意识到自己生长之地的存在，以及这个存在的独特性”，那么“台湾意识”应该萌芽于一八九五年。清朝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切断了台湾和祖国大陆的脐带，所以台湾人民产生了一种“台湾意识”。但是这种意识以祖国情怀、祖国意识作为主要特征，因此成为对抗日帝压制的武器。这个阶段的“台湾意识”，在台湾人民的心中不仅和“祖国意识”没有冲突，甚至是重叠在一起的。

不过，台湾人民在对抗日本统治的过程中，由于祖国落后、没办法帮忙，所以心态上逐渐有了些变化。台湾人民逐渐感觉到，要摆脱殖民地这种没有尊严的“二等国民”处境，唯有自立自救一途，于是开始养成了以台湾为中心去看问题的思考方式。这时，“台湾意识”跟“祖国意识”开始出现一些微妙的差距。一方面，“台湾意识”之中包括了因割台而涌现出来的民族之爱、亡国之痛；也就是说，“中国意识”是“台湾意识”的主要部分。另一方面，清朝割让台湾给日本，很容易使台湾人民产生充满悲情的“孤儿意识”；正因为孤立无援，“当家做主”的愿望也逐渐成为“台湾意识”的重要成分。但我想要强调，这种与“中国意识”稍有距离的“台湾意识”，绝不是一个以祖国为敌、与祖国彻底决裂的“台独意识”。台湾所谓“皇民化意识”的重新起来，其实是国民党统治台湾的结果。

七、“外来政权”与“省籍情结”

问：您刚刚的谈话，让我印象最深的有几个重点。您说，在日据时期，“台湾意识”不但没有异化成“台独意识”，而且跟“祖国意识”高度重叠。“皇民化教育”根本不成功，台湾人民热切欢迎祖国军队的到来。可是不多久却发现，取代日本殖民统治的，竟然是一个我们自己的恶劣的政府；于是展开了反抗，“二二八”事件之后更进一步向左转，最后遭到受美国保护的国民党的恐怖镇压，株连无数。您说，“二二八”的起因是反抗贪官污吏，白色恐怖是国民党统治者对所有台湾人民的迫害，不分省籍。您指出，“台独”运动的形成和土地改革很有关系，不能回溯到“二二八”。您认为“台独”派把“二二八”和白色恐怖讲成省籍冲突，是指鹿为马，是对历史真相、对国民党暴政性质的严重扭曲。现在我想进一步请问，您如何理解民进党所谓的“外来政权”。问题，以及所谓的“省籍情结”？“台独”派不断地操弄“外来”和“本土”之分，而且还非常成功。您怎么解读这个现象？陈：“台湾意识”之所以变成想与祖国彻底决裂的“台独意识”，除了地主阶级鼓动“台独”的关键因素外，另一个重要的背景，当然就是所谓的“外来政权”的问题，以及由此衍生的“省籍情结”。前面我一再说，不论是“二二八”还是白色恐怖，都不是省籍冲突，而是国民党政权和台湾人民之间的矛盾。国民党政权不但迫害本省人，也迫害外省人。这种迫害，完全不能从民进党所说的“外来政权”去

理解，因为外省人也同样遭殃，甚至更惨。不过，蒋家政

权用外省精英统治台湾，这个省籍面向当然存在，这是不能否认的。“台独”派之所以很成功地挑起“省籍情结”，然后把“二二八”和白色恐怖通通扭曲成省籍冲突，跟这个当然很有关系。

蒋家政权来台的时候，带了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万的人来。他们并没有讲台湾人是“二等公民”，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外省人都是统治阶级。事实上，除了少数的蒋家家臣外，大多数是军、公、教的中下级成员，特别是老兵，他们不见得过得比本省人好，好多人的生活比本省人还糟糕。可是，那时候决定台湾命运的最高等级“民意代表”，通通是外省人，连乡下的派出所主任都是外省人。那些担任蒋家家臣的“高级”外省人，在台湾的地位和处处表现出来的优越感，跟日据时期日本

人的表现并没什么两样。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台湾人会认为光复不过是“从大陆来的新统治阶级替代日本统治阶级”而已。同时，台湾人民会在心中把日本人的殖民统治拿来跟国民党做比较。很多人觉得国民党比较差，所以“皇民化意识”又重新来了。

当所谓“外来政权”的说法普遍在民间流传时，台湾人要“出头天”、要“当家做主”的口号，就很容易打动民心。这为“台独意识”提供了发展和扩大的空间。因此，“台湾意识”之所以异化为“台独意识”，可以说是蒋家政权完全忽视台湾人民的心情所造成的。“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意识”；“台独意识”是异化了的“台湾意识”。今天表现在政治上和中国大陆为敌，意图和中国大陆彻底决裂的是“台独意识”，而不是“台湾意识”。台湾心怀不满的地主阶级“台独”派，就是利用了台湾人的省籍情绪，才获得成功的。当年靠外省精英统治台湾的蒋家政权，对此当然要负很大的责任。“二二八”事件以及使成千上万人民受难的白色恐怖案件，令台湾人民陷入恐惧的深渊，所产生的仇恨到今天还飘荡在台湾岛的上空。你想想，如果高官都是外省精英，这种仇恨是不是很容易被简化成族群仇恨？是不是很容易被“台独”派利用？

八、国民党丧失民族立场引发了另一种悲情

陈：我想，还应该讲一点，“台湾意识”异化成“台独意识”，国民党还要负另外一种责任。为了自己的生存，他们丧失了民族立场，对美国人不能保持民族尊严。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二十七日，美国第七舰队就进入台湾海峡。不但如此，还有第十三航空队驻防，同时成立美军顾问团入驻阳明山。最严重的是，台湾当局在美国的要求下，竟然同意美军享有“治外法权”。也就是说，美军在台犯了罪，台湾当局无权过问——这是晚清时期列强租界和“治外法权”的现代版，是国民党当局撤退来台湾后，台湾人民所遭受到的最大耻辱和悲情。这样，国民党（包括其统治下的中国人民）对美国的关系，不是比台湾人在日本统治下的法律处境还糟吗?

美军杀人没有罪！典型的案例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刘自然事件。他是革命实践研究院的职员（当时的班主任是蒋经国），被一位名叫雷诺的美军上士在阳明山的美军眷区枪杀了。警方要逮捕雷诺的时候，被美军借口“外交豁免权”而强行阻拦。事后雷诺辩称，他枪杀刘自然，是因为刘偷看他太太洗澡。但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我们不知道，因为死无对证。五月二十三日美军军事法庭判决雷诺无罪，当天就用飞机送回美国。五月二十四日，刘自然的遗孀到美国“驻台大使馆”前面抗议，高举“杀人者无罪”的牌子，引起群众的围观；最后人群冲入“美国大使馆”，把汽车烧掉了，连美国国旗都烧掉了。不但这样，连里面的文件也烧掉了，还围攻美国新闻处以及美国协防司令部。当时参与的群众有几万人，还是高中生的陈映真也参加了。后来抓了一些人，群众要求放人；警察又开枪打死了一个人，伤了三十多个人。然后，还派了三个师进台北镇压；第一批先抓了四五十个人，后来又抓了一百多个，其中四十多个人以“意图制造事件的暴动者”的罪名，判了六个月到一年的有期徒刑。报道这个事件的《联合报》记者，竟被判了无期徒刑，一直到一九七六年我第二次坐牢的时候，他还关着。为了这件事情，蒋介石把“卫戍”司令、宪兵司令、“警察署长”通通撤换掉，俞鸿钧“内阁”也被迫总辞。蒋介石还亲自出面向美国“大使”道歉。这是国民党当局来台后的第一次反美事件，这难道不是“台湾人的悲情”吗？为什么民进党从来不讲？难道他们的悲情意识是有选择性的?

台湾人的悲情还表现在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上，这个民进党也从来不敢讲。一九七九年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也就是跟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断交），为了取代遭废止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国会片面以国内法的形式制定了《与台湾关系法》，试图把美国国内法直接适用于台湾。这就意味着台湾是美国的属地，是美国的一个地方。这就难怪邱义仁会说：“台湾不抱美国的大腿可以吗？”这就是奴才，把台湾当成美国的新殖民地，使台湾人民丧失了尊严，失去了作为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主人的地位。所以，我觉得泛绿人士的悲情意识是选择性的悲情意识。日据时代不愿意讲，治外法权不敢讲，就连《与台湾关系法》也不能讲，只会不断地扭曲台湾人民的历史记忆，将“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打造成“台独”的历史神话。

九、国民党不杀“台独”派

陈：我还要再讲一点。《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内法，民进党竟不以为耻；承认美国的治外法权，国民党也不以为耻。他们都是一样的，不必“龟笑鳖无尾”，一样都是美国的奴才。台湾哪里光复了？以前是日本的殖民地，现在是美国的殖民地。你们知道吗？台湾“戒严”时期的政治犯里面，“台独”政治犯是不判死刑的，因为美国不准国民党把他们判死刑。最有名的是云林县的苏东启，他想要去军援仓库抢武器，先和高玉树商量，但高玉树知道不会成功，就去密告；所以苏东启一去抢就被抓起来，可是没有枪毙，判了无期徒刑。“台独”派只有一个被枪毙，但那是例外。被枪毙的那个人确实有“台独”思想，可是没有活动。“调查局”知道之后，派人伪装成“台独”分子去怂恿他发展组织，然后派他去日本跟“台独”人士联系。在日本的国民党情治人员也假装自己是“台独”，教他回台之后如何推动工作；等到组织发展到三十多个人之后，就把他抓起来。这个事情在法律上是不应该的，是入人于罪。他本来没有发展组织的想法，是调查局设计他去做，然后再抓起来，这其实是杀人灭口。

但那是个例外，其他的“台独”派都没有被枪毙。当时还没有“外独会”，“台独”派都是台湾人。如果像民进党说的，外省人和台湾人的矛盾那么严重的话，那“台独”应该是会被杀的啊！国民党为什么不杀“台独”？这不是很奥妙吗？美国的敌人是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的敌人也是中国共产党；“台独”派不是美国的敌人，反而是美国暗中支持的。以前，国民党常把“台独”派和共产党连在一起，这不是很荒唐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置之死地。但也因为太笨了，没有人相信，所以这样炮制出来的政治案件，一次也没成功。那个时候，“台独”派都是台湾人，而国民党不杀“台独”派。如果国民党政权的主要敌人是台湾人或本省人，怎么会不杀呢？国民党抓台湾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从来没手软过，杀他们也毫不犹疑，这证明了什么呢？难道这也叫省籍矛盾？再说一句，九十年代“台独”派势力最大的时候，民进党批统左派（不论省籍）毫不留情，国民党批统左派也是如此。在这里，他们是内部矛盾，统左派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因为，民进党和国民党都是美国的奴才，他们都没有中国立场。台湾表面上光复了，但实际上是美国的殖民地；这是战后台湾人最大的悲情，就像战前台湾人最大的悲情，

是被日本人统治一样。我这一辈子在台湾，还没有当过真正的中国人，这是我最大的悲哀。

十、蓝营的问题：神化两蒋、亲美反中、有人坚持“一中一台”

问：您对台湾的现状，还有什么批评?

陈：我还想批评一下现在的蓝营。首先，我对他们神化两蒋感到非常不满。蒋介石在大陆时期的功过可以暂时不提，但对两蒋在台湾的功过，必须有一个合理的评价，不该把他们看得像“神”一样。当然蒋经国是比他爸爸好一点，可是当时好多人的死还是跟他有关。所以很多“二二八”事件或是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死难者的家属，到现在都不能原谅两蒋。泛蓝把他们“神”化，我非常不满意。我每次看到他们去参拜慈湖，感觉就跟看到日本首相去参拜靖国神社没什么两样。

蒋家父子在台湾的统治至少有几个争议点。例如，他们引进美国势力，将台湾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造成两岸长期对峙的局面。驻台美军的“外交豁免权”，重演清朝后期的“租界”和“治外法权”，终于引发了“刘自然事件”。另外，他们还接受属于美国国内法的《与台湾关系法》，让它适用于台湾，使台湾沦为美国的附庸，甘愿做美国的爪牙，牵制祖国的发展。

蒋介石统治台湾的另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产生“省籍情结”。由于蒋家政权的统治，才使得“省籍情结”发酵，使得“皇民化意识”复苏，使得“台湾意识”异化为“台独意识”。也就是说，“台独意识”的产生，“台独”派的坐大，其实都是蒋家政权统治所带来的恶果。泛蓝阵营根本没有考虑过这点，根本没有检讨。就像他们一味崇拜两蒋一样，他们丝毫不考虑台籍人士的心情。

我对泛蓝阵营不满的另一点是：他们中的有些人坚持“一中一台”，主张“‘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愿意也不敢做中国人。这一点我非常不满意。“‘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这讲得通吗？“中华民国”撤退来台湾之后，中国的主权当然应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继承。主权问题不是自己说了算，要世界都承认才行。台湾的蒋家政权，虽然拥有土地、人民和政府，但却没有主权，不能自称是主权国家，只能说是一个地方政权或“流亡政府”而已。但是泛蓝人士一直认为台湾比大陆还进步，又由于“反共”意识形态的作祟，不想要

两岸统一，只想要永远维持现状。时代在变，“现状”也在变，所谓的“现状”是不可能永远维持的。在台湾的中国人，不应该一直听命于美国人。实际上，国际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主权”应该由两岸的人民来“共享”，台湾的“治权”才是由台湾人民来“独享”，一国两制就是这样啊！在这种情况下，大陆保证不征税、不派官，连部队都不会派来台湾，这有什么不对呢？为什么要拒绝？我认为，蓝营的“一中一台”和绿营的“台独”，区别实在是不大的。他们只不过是在争夺台湾岛内的政治权力而已，他们都没有真正为台湾人民的前途和利益着想。

十一、“一国两制”与两岸关系

问：我觉得“主权共享、治权独享”这个概念，其实有些“台独”派是可能接受的。可是“主权”要如何“共享”？“治权”如何可能“独享”？这中间好像还有些争论空间。比方说，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之下，如果是“主权共享、治权独享”的话，那是不是某种比较松散的组合方式？独享治权的台湾，政治的自由度会有多大？再举个例子来说，苏联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也是联合国会员；在一个苏联的框架下，苏联在联合国共有三个席位。当然，我并不是说苏联模式是最佳选择；我也不太相信台湾人民真的那么想要进联合国，或非进联合国不可，那是“台独”炒作出来的议题。不过，国际空间或地位问题之所以高度敏感，也正因为它同时涉及台湾在“一中”框架下的政治地位问题，也就是您提到的“治权独享”问题。在这些方面，您愿意再多说一些吗?

陈：大陆的态度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下，两岸什么事都可以谈。问题是，现在蓝、绿两党都不肯直面或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所以，你提的想法根本就不能在谈判桌前谈。台湾方面如果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你怎么能够让大陆方面跟你谈这些问题呢？还有，谈判与实力是有关系的，台湾应该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时机来谈，讲话才更有力量。你不觉得，台湾已经错过最好的时机了吗?

问：“一国两制”在台湾一直被妖魔化。所以，统派在谈“一国两制”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多谈“一国两制”“治权独享”的一面？以及，将可以为台湾带来更多的国际空间等等？如此一来，台湾的一般民众也才会知道，原来统派的主张是这样，原来“一国两制”是这样子谈的。这点在台湾很敏感，很容易被炒作成“大陆打压台湾”。所以我想要问，您怎么看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

陈：很多国际组织，是规定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譬如联合国。有些可以用地区名义加入，譬如奥运。如果台湾所说的国际空间属于前一类，那不是等于要大陆承认台湾是个“主权国家”吗？这根本就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如果两岸以“一国两制”的方式统一，那么，在这种架构下，台湾的国际空间比香港还要大。老实讲，台湾的两党就不甘心接受“一个中国原则”，所以故意在那边打迷糊仗，蓄意欺骗台湾

人民，想要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他们不想让台湾人民了解，在“一国两制”架构下，台湾的国际空间很大，而且比现在要大很多。在台湾现在的经济条件下，两党这样莫名其妙地坚持下去，到底对台湾好，还是不好呢?

说到国际空间，我就想谈一点历史。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内战失败，撤守台湾，共产党在大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统治了中国绝大部分的土地和人民，而“中华民国”却只能靠着美国的保护存活下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还仗恃它在联合国的强大影响，让“中华民国”保有联合国的中国席位，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没有国际空间。从联合国的角度来看，那时候“中华民国”是一个拥有中国主权的政府，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却只是一个不受国际承认的政府。这种情况，维持了二十一年！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取得联合国的中国席位。说难听一点，美国保护“中华民国”，跟日本保护“满洲国”有什么不同？在这种状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愿意以对等的地位，“政府”跟“政府”谈，还有比这更好的条件吗？怎么可能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呢？当“中华民国”还占据联合国的中国席位时，它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主权国家吗？那不是制造中国分裂吗?那样蒋介石也就会成为中国的千古罪人。蒋介石不肯干的事，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肯干吗？不管将来谁当中国的领导人，谁都不会干这种留千古骂名的事。

问：两岸关系要改善，大概首先需要有一个好的循环出现，然后才会慢慢上升到更进一步的层次。像现在，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互动状态。大陆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可以给的，但它现在不愿意给，怕你用来搞“台独”；台湾这边其实也知道自己可以要，但是假如要不到会很没面子。而且，台湾当局现在是“民选”，政治上的一个失败就要付出代价，所以会倾向于保守。面对两岸之间的政治僵局，您认为要怎么样才能有所突破?

陈：我想主要还是心态问题。台湾一直认为大陆比台湾差，实际上大陆现在已经发展起来了，“中国崛起”的事实已经不容否认。虽然大陆内部还有不少问题，但哪一国没有问题呢？美国就没有问题吗？现在美国的问题并不比中国少，现在也没有人再讲：“中国崩溃论”了。现在和未来的两岸关系，关键还是在于：台湾肯不肯承认“中国崛起”的客观现实？李登辉、陈水扁都瞧不起大陆，但如果未来台湾还维持这

种态度，不肯承认大陆的发展，不愿意跟大陆和谈、合作，那还会再吃亏的。

我想暂时回到光复初期，谈谈那个时候的两岸差距，再回到目前的两岸问题。台湾在清朝末年经过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等改革派官员搞的洋务运动的影响，早就已经进入商业资本主义的阶段，糖、茶、樟脑还大规模地外销到国外。日本人来了之后继承了这个基础，为了殖民统治的需要将经济规模深化，所以到光复的时候，台湾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初期。相对地，大陆从鸦片战争以后，内乱外患搞得一塌糊涂，加上经过了八年对日抗战，变成“一穷二白”。我认为，要穷人有志气是很难的。我在光复后看到来台接收的军队和官员的种种作为，才理解八路军为什么要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陆人来到台湾看到什么就想要什么，又抢又骗，什么都要，这是当时大陆比台湾落后的证据。我认为，接收初期接收者与在地人的冲突，在地人对接收者的不满等等，根本原因就在于海峡两岸经济发展阶段的差距。“二二八”之后，台湾青年向左转，就是因为了解到：只有搞革命，才能重建中国经济，才能根本解决内部很多矛盾问题。国民党的腐败问题，其实就是中国整体落后的一种表现。

按我的理解，大陆经过革命，经过重重的困难，终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全面发展起来。事实上，这等于实现了当年台湾左翼青年向往的目标。再说到当年来台接收的人，当年他们比台湾人还穷，贪污腐化，被台湾人瞧。不起。后来台湾经济因为受到美国的援助，发展得较快；于是，变得有钱的外省人就和变得有钱的台湾人一样，都瞧不起大陆。其实大陆因为地方大，问题多，又被美国围堵，才发展得比较慢。因为人家慢，比你穷，就瞧不起人家。现在人家发展起来，比你还有前途，你还不肯承认，还要“订高价”（拿翘）。我认为，这才是目前两岸关系的实质。台湾人（包括本省人和外省人），要好好自我反省，不要老是说人家打压你。

十二、台湾的三种左派：新民主主义左派、“文革”左派、洋化左派

问：陈先生，听您这样说，我想请您特别从左派的角度，谈一谈大陆现况，以及您对中国革命的看法。还有，您觉得您自己的左派立场，跟台湾的其他左派有哪些不同？

陈：台湾一直认为大陆比台湾差，实际上大陆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儿钱了。现在不是在讲“和谐社会”这个概念吗？这表示大陆已经有能力从内部来改变自己。例如以前讲“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强调“大家都要富起来”；以前只讲“效率”，没有讲“公正”；以前谈到经济发展只看GDP，现在强调要“以人为本”。现在提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这些概念，就表示说大陆已经有能力改善过去因为引进资本主义成分所造成的那些毛病。

我觉得以前大家对“一国两制”的诠释是不对的。它把大陆看成社会主义社会，而台湾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以统一以后可以各搞各的。其实，就我的看法，我认为大陆现在比较接近列宁所说的“特殊的过渡时期”，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国家资本主义阶段”。这是由共产党所领导的、以国家的力量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最后的目标是要达到社会主义，但现在还不是社会主义。很多的台湾左派朋友都搞不清楚这点。列宁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说现在实行的就是社会主义，而是表示要坚决地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意思。”中国的革命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阶段，一个是社会主义阶段。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实施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文化条件，所以必须通过新民主主义这一阶段，先创造出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然后才能够进入社会主义阶段。

台湾左派内部的一个分歧点就在这里。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才开始接触社会主义的人（“文革”左派）的看法，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就开始接触社会主义的人（譬如我这一代）的看法，就很不一样。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参加共产党或接触社会主义的人，对改革开放有一定的理解。因为新民主主义者，本来就主张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实行现代化、采用资本主义方式、利用资本主义又限制资本主义，然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过渡时期所采用的，不是完全自由开放的市场经

济，而是有限制的市场化。但是，“文革”时期接触社会主义的朋友，就比较没有这个概念。他们比较会认为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是“走资”，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甚至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

问：关于台湾左派的内部分歧，能不能请您再多讲一点?

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代，亲眼看到过中国的惨状，而台湾的青年，更亲身经历了日本人的歧视与欺压。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者来讲，革命一方面是希望中国富强起来，另一方面是希望中国的穷人能过好日子（那时候的中国农民真是惨）。我们的理想是从切身的痛苦出发的，我们了解这个革命过程可能很漫长、很痛苦，是要牺牲生命的。七十年代因为保钓运动而左倾的一代，对中国现代史不了解，没有切身的体验，只在观念上左倾；当时又是“文革”，他们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很理想化，以为马上要实现社会主义。所以，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有些“文革”左派会认为大陆已经“走资”，因此不屑一顾。但难道，他们想要让中国人一直过着一穷二白的生活吗？如果中国经济不发展起来，在苏东集团倒了以后，中国怎么能够在美国独霸之下存活下去呢？中国既要改善一般人的生活，还要有能力在美国的霸权之下独立发展下去，不改革开放，行得通吗?

台湾还有一种更年轻的留洋左派，我是听吕教授说的，他们同情古巴和拉丁美洲国家，反对美国霸权；但他们好像还是不太能够了解，为什么中国非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不可。他们似乎不太考虑到，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处境并没有比古巴和拉丁美洲国家好多少。要不然，一九五〇年美国怎么会毫无顾忌地侵犯中国主权，把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干涉中国的内战，又在联合国阻拦新中国取得中国席位达二十一年之久？不改革开放，经济搞不起来，要怎么抵挡美国霸权？我认为，七十年代以后左转的台湾左派，不够了解现代中国长期经历的痛苦。但从左派观点来讲，即使没有中国感情，也应该理解到，中国有过一百年备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就只要想想抗战就好了，一个国家为此死了几千万人，这难道不是一件现代世界史上的大事吗？所谓“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血淋淋的历史教训。

问：中国革命的历程很复杂，有“文化大革命”，又有改革开放，两方面相差这么大，您怎么看?

陈：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我想讲一点自己的亲身经历。一九七六年我第二次被捕不久，“文革”结束了。我看“中央日报”，看到它所“揭露”的“真相”，刚开始不相信，以为是国民党造谣。后来看到“中央日报”刊登的伤痕文学，就知道是真的，于是非常痛苦。如果革命搞成这个样子，我这一辈子的革命不是白搞了吗？我吃了那么多的苦，只要革命的理想能实现，又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革命搞错了，我岂不是白活了吗？为了这个，我痛苦了很久。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终于慢慢厘清了自己的思想。我跟刘少奇一样，可以说是两阶段革命论者。我主张先用国家的力量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搞现代化，但要朝着社会主义目标，就是邓小平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进。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现代化，就不能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也不能让中国真正强大起来。那样的话，什么社会主义都不要讲了。

毛泽东可能不是这样想的。他马上要进入社会主义，所以就搞起了“文化大革命”。我到现在还不完全了解“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样子，因为没有一本书讲得清楚。但立刻要进入社会主义，这我不能同意。穷国怎么可能实行社会主义呢？我还认为，毛泽东一直想着美国包围中国，随时会打中国，所以，他要把中国搞得随时可以应战。但这应该叫作“备战体制”，不叫社会主义。苏东集团垮了，中国没有垮，因为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认清了革命要分几个阶段。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可以说是中国革命的奠基阶段；这一阶段的目标在于：重建中国，原始积累，从事基本建设，建立初步国防（包括原子弹）。有了这些基础，就可以改革开放，开始大步现代化。很遗憾，毛泽东似乎不这样想，才有一点基础，就要进入社会主义，当然乱了套，多走了冤枉路。不过，中国终于走向正路，既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大目标，也没有全盘倒向资本主义。苏联和东欧就不是这样。他们以前走过头，现在全部不要，另外走资本主义道路。从极左到极右，怎么会不乱？他们没有认识到，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不能跟西方一样。他们太迷信自由经济了。

落后国家的路很难走。中国革命后党内的意见很多，也犯了几次严重错误。我们也不能随意责备他们，因为从来没走过的道路，谁能一次就走对？西方资本主义初期，不把工人当人看，所以才会产生社会主义思想。但现在有谁还会记得，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与

血腥？谁还会记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期，西方人在殖民地所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毛泽东虽然走偏了，邓小平却在党内的长期斗争中看到了正确的道路。“文革”结束初期，中国还有极左派，也有想要倒向资本主义的极右派。但邓小平坚持走中间路线，紧抓“四个坚持”（其中最重要的是：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目标），同时引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随时调整。以前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讲“和谐社会”，这就是“与时俱进”。要有弹性，不要教条主义。我认为，台湾七十年代以后的左派，不懂历史的现实，不懂历史唯物论，缺乏发展的视野，都有教条主义的倾向。

十三、我对社会主义的看法

问：听陈先生这样讲，我还想要继续问您一些关于左派的问题。您说，社会主义要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成就和文明的基础上，这点我相当同意。如您所说，现在中国大陆是以国家的力量发展资本主义，想要靠着资本主义达成大国崛起的目标。可是，从某些左派的角度来看，可能会觉得大陆现在的发展路径还是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虽然说是要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但是不够和谐、不够公平正义的地方还是很多，在这里面许多弱势者是要付出代价的。我猜想，中国人终究是想要超英赶美的。所以，当“强国”的目标跟追求当前现下的公平正义有所冲突的时候，通常“强国”还是比较优先。当年因为美蒋政权是一个白色政权，另外一边是一个由下而上的革命政权，所以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得到统一。但是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左统派、或者说是统左派，伴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好像也在调整“统”跟“左”的优先和比重。先强国，先超英赶美，以后再谈社会主义，您的意思是这样吗?

陈：其实落后国家要进入社会主义，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这个阶段不能跳过去。西欧国家在发达资本主义之前，早就实现了民族国家的建立，或者说，民族国家既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因此，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解决阶级问题，不存在民族解放的问题。落后国家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压迫，一定会有民族意识，所以落后国家的社会革命一定是结合了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种成分。同时，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马克思以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为对象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定是不同的。落后国家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下，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并不具备直接跳跃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都是落后国家要进入社会主义的一个“特殊的过渡阶段”；这个过程说不定要搞个一百年以上，实际上就是由共产党来领导、实行资本主义生产的道路。在这过程中，一定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意识在里面。这正是为什么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很少有人反对的原因，因为里面有民族主义成分。有民族主义的概念，才能反对帝国主义。当前台湾一部分从美国回来的左派，一直反对民族意识。他们不知道要进入社会主义有两条道路，一个是先进国家走的社会主义革命，一个是落后国家的社会革命（以社会主

义为目标的社会革命）。落后国家在进入社会主义之前，一定要先将资本主义所达成的物质生产力吸附进来，才能够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同时很糟糕的是，西方很多左派对社会主义的看法，通常继承恩格斯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因此，他们很容易简单地就认为，只要把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去掉，就可以变成社会主义。事实上，马克思区分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最主要是从生产关系入手，而生产关系的内容远比所有制要丰富。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可是，在以工业生产为主要形式的社会里面，劳动者还是依附在庞大的生产资料上，这是没有办法诞生社会主义的；因为，就算你把生产资料变成国有、公有、集体所有或社会所有，劳动力都还是商品，根本的生产关系也还是没有改变。马克思认为，不是解决了所有权问题就是社会主义，而应该要从生产关系来入手；但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决定的，没有比工业资本主义更发达的生产力，就不可能出现生产关系的革命性改变。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但毛泽东相信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所以过度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

我觉得很多人之所以搞不清楚这些基本观念，是因为受到了恩格斯的影响。我比较同意日本"宇野派"（宇野弘藏）的看法，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在于"劳动力的商品化"。商品生产可以调节，要多的时候可以多，要少的时候可以少。但是，劳动力却不是这样。要多的时候，人生出来也要一二十年才能成为社会生产力；要少的时候，或停止生产的时候，人要靠什么吃饭？资本主义最没有办法解决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像欧洲的失业率越来越高，要怎么解决？荷兰的Work Sharing方案，就是因为资本主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才出现的。这样看，资本主义最后非得要走上社会主义这条道路。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化》这篇文章中提到：要实现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恐怕要在信息社会诞生后才开始具备条件，在那之前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只有在知识劳动高度发达的"知识社会"中，"自由人的联合体"才可能出现。一方面要将原本属于生产的主观条件的"知识"客体化，使"知识"成为生产手段，成为新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要将无法为私人所占有的"知识"，发展成为具有支配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力。只有在"知识"劳动者之间实现平等的、自主的"网络共同作业"，才能兑现自我实现型的社会主义劳动。如此一来，新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才获得了新的规定性（知识的生产手段化和社会共有化），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总的来说，我们一定要对社会主义重新考虑，要分清楚这两条道路：一个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论；一个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论。只有对这个问题有了认识，我们才能够对中国发展的现状做出科学的评价，也才能解决岛内左派在理论和现实上的各种分歧。

十四、要坚持走中国道路

问：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大陆近年来爆发了很多的维权运动，不见得是挑战政权，而是在抗议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某些严重的不公不义。但是，大陆好像还是以“维稳”的方式来处理这些抗议。对大陆内部的弱势者维权运动，统派是选择不发言呢？还是有不同的看法？

陈：实际上，我必须承认，台湾的统派实在对大陆情况不太了解。这主要是因为信息不足。如果像“凤凰”那样的电视台能够进来，也许还可以了解一些，但现在不能进来。另外，在书籍方面，我一向不太愿意看大陆的书，因为大部分是在为政策辩护，不是学术上的东西。现在大概有改变了，但以前我不太愿意看，我比较习惯看日本书；日本的左派从第三者的角度分析中国，对我来说很有用。所以坦白说，不是我们不愿意谈，而是不了解，资料太少了没办法谈。例如一九八九年的事情，刚开始我完全不了解，后来看到天安门广场上的某些口号，才开始觉得事情不简单，但也不能了解大陆内部的问题。直到看了《读书》前主编汪晖的文章，才稍微了解当时大陆社会的种种矛盾。我们只能在摸索中看问题，但不能看到西方或台湾媒体骂什么，我们就跟着骂。我们很关心大陆，但有我们的关心方式。

我们知道大陆还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就像刚刚说的，我们还不够了解，只能关心。但是，绝不能按西方或台湾所要求的方式来解决。大陆经济的发展，就不是西方模式。苏联按西方模式做，苏联就垮了。经济这样，政治也是这样。大陆的政治体制，当然要随经济的改变来调整，但是要按大陆的步子来调整，而不是按西方的要求来调整。最近的十七大，据说已开始实行“党内民主”，可见大陆也不是没有注意到政改问题。但我们确实不知道他们的长期规划是什么。大陆的体制不可能不改，我们都关心，但我们没有必要和西方媒体“同一口径”。

十五、讲“转型正义”民进党没政治智慧

问：陈先生，我突然又想起一个问题。这两年，台湾的绿营人士一直在谈“转型正义”。您经历过“二二八”和白色恐怖，被国民党关过那么久，狱中还备受刑求，好不容易捡回一命。您认为找出当年刑求您、迫害您的第一线“加害者”，要求他们吐露“真相”，是好的做法吗？对于“转型正义”，您有什么看法？

陈：什么转型正义！就是要算旧账，要清算嘛！我觉得，民进党真是没政治智慧。吕教授曾经讲过一个故事给我听。刘邦、项羽争天下，他们都是现在的苏北人，很多党羽彼此认识。项羽自杀、刘邦统一天下以后，刘邦准备算旧账，想杀当年先是他自己的党羽、但却投降项羽的人，结果议论纷纷，人心不安。刘邦请教张良，张良教刘邦找一个他最痛恨的人，不但封他为侯爵，还跟他同车出入。其他人一看，都说：连那个人都没事，我们还担心什么！刘邦就用这种方法，平息人心的不安。民进党现在要算旧账，所有外省人都不安，他们又怎么会跟民进党同心协力搞“台独”呢？“台独”是搞假的吗？我认为他们只会操弄族群，很没出息。

就讲我好了，我被国民党关了二十一年，我太太十年，我的大舅子被枪毙（他枪毙前跟我同一间牢房，临走时一一跟我们握手，我发现他的手还是热的，真是了不起。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出狱后会跟他妹妹结婚）。论仇恨，可以算“苦大仇深”了吧！几年前的“二二八”纪念日，国民党邀我到中央党部讲话。我去了。我跟他们说，我今天不是来跟国民党算旧账的。当年国共内战，我们心向共产党，被国民党搞得家破人亡。应该说，内战让很多人受苦。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你们两党应该和解，不要再因为两党不和，让无辜的百姓受牵连。如果你们能这样做，我们的苦就没白吃。我向连战强调，两岸分裂是国际“冷战”与国共内战造成的历史悲剧！而今几十年都过去了，再深的仇恨都可以化解，何况是为了中国如何现代化的路线不同而产生的国共内争！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因此，作为国民党党主席，你有责任与义务前去大陆与共产党和解。连战听了很感动，原来就想去大陆参访却犹豫不决的他，于是当场决定到大陆去，以党主席的身份和共产党谈。共产党对他也非常礼遇，以国家领导人的规格接待。我去国民党党部，我的一个难友非常不谅解，从此以后不跟我讲话。当年

我第一次坐牢，刑期已满，国民党还不让我走，要把我送到小琉球。那时候我身体很差，长期得肺病，很瘦。我那位难友认为，我会死在小琉球，所以他通过别人通知他父母，由他父母贿赂相关人员（他们有渠道），我就被释放了。他对我有救命之恩，他不跟我讲话，我很难过。但我认为，我没做错。我是为所有的台湾人（包括外省人）着想。"转型正义"——那么，民进党就自以为掌握"正义"了？这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无耻。他们难道不知道，是美国保护了国民党这个不得民心的政权，让它在岛内乱抓人、乱杀人？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围堵中国，想要困死中国，二十年不承认新中国；保护了被人民唾弃的政权，让它随意残杀支持新中国的人，还连累一大批无辜。是谁"不义"，不是美国吗？同样地，美国扶持韩国的李承晚、越南的吴庭艳，让他们残杀韩国跟越南的左翼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美国这样做，根本就不顾别的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死活。造成台湾将近四十年"戒严"的元凶，不是美国吗？民进党为什么不去算美国的账，不去跟美国要求"转型正义"？

再说，就是因为五十年代的残杀，让台湾人民对国民党充满了怨恨，民进党才能借此出头。民进党难道不是踏在左派跟无辜者的血迹上前进的吗？民进党曾经对那些牺牲的台湾左派，表达过一点起码的敬意吗？民进党只听那个罪恶之源——美国的话，怎么还有脸跟别人讲"正义"呢？

不过，我也希望外省朋友能了解过去的历史，不要再把两蒋当作神，动不动就去朝拜。很多在"二二八"或白色恐怖中受害的台湾人家属，到现在还不能原谅两蒋。我个人也不喜欢两蒋，但我认为，两蒋在台湾的功过，可留给将来的历史学家去评断；现在，民进党要算旧账，国民党就抬两蒋，再这样争下去，越争越糟糕。我希望外省朋友能理解这一点，不要动不动就抬出两蒋这个神主牌。

而且，我前面也讲过，原来在日据时代，台湾人的"皇d

民思想"并不深。国民党来了以后，台湾人拿日本殖民政府来跟国民党比较，才又怀念日本统治，"皇民思想"才又重生。有些外省人不能了解这种状况，所以老是指责台湾人。我当然很厌恶那些"老皇民"，像李登辉，但我们（特别是外省朋友）要了解其中曲折的情感转折，不要动不动就指责台湾人。

我认为，蓝、绿恶斗的根本关键，就是双方都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如果大家都是中国人，而且大家都为中国的崛起欢欣鼓舞，大家都充满了希望，怎么还会互斗呢？如果蓝、绿两边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大家当然会互相亲近，彼此有矛盾，也不过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就像我跟吕教授，我们是台湾人，你（按：指陈宜中）、钱永祥是外省人，我们的某些看法可能不一样，但不会成为互相对立、不能妥协的双方。现在蓝和绿，都把对方看作“异类”，是完全不同的人，彼此互相排斥，甚至互相敌视。如果他们都认为大家都是中国人，就不会这样子。所以我认为，“一个中国的原则”，不但可以解决两岸矛盾，还可以舒缓台湾内部的省籍矛盾。

记住过去的历史，是要得到教训，不要重犯错误。现在民进党虽然讲历史，却是要算旧账，而且这个“账”还是他自以为的“账”，这只能加深裂痕，于事无补。应该说，台湾几十年来的历史，是许多因素造成的（这不能不让人想到日本的侵略、中国的内战、美国蓄意制造的“冷战”）。我们必须放眼看这样的大历史，不能夹缠在台湾的内部。看看现在的世界，美国、日本的经济不可能有起色，中国的经济却欣欣向荣。我们应该往前看，为台湾找到最好的前途。如果台湾还闭眼不看，就会搞得进不能退不得，只好继续在窝里斗。如果大家放宽胸怀，重新复归中国人的认同，那路子宽得很，还有什么好斗的呢？总而言之，台湾的两大族群，再这样彼此不谅解，不往前看，继续恶斗下去，台湾一定没前途。这种局面，我们统派实在不忍心看下去了。

原载于《思想》第九期《中国哲学：危机与出路》，二〇〇八年五月

统一是大趋势，谁也挡不住——吕正惠采访

问：陈先生，回顾您这一辈子，有没有哪一件事对您产生过很大的冲击，改变了您的思想，而且影响了您后来整个人生的方向？有没有这样的事？

陈：当然有啦，那就是我在读高雄中学时，学校中的日本人对我蛮横的欺负与歧视。这些日本人常常莫名其妙地打我，后来我只好打回去，没想到我打赢时，他们就一群人围着我打，还说，你可以跟日本人打架，但不可以打赢。他们骂我"清国奴"，从此我才知道我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我这一辈子最不能忍受的是人对人的歧视，从此以后，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反抗日本人。

问：这样看，您感受到的是民族歧视，您会成为民族主义者一点也不奇怪，但您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呢？

陈：在学校里，我是反抗日本人的，但也有一些台湾人，也就是所谓的"皇民化"台湾人，见到日本人就卑躬屈膝，毫无尊严可言，真令人厌恶。可见，强者对弱者的歧视也会造成弱者的人格扭曲。我是地主的儿子，当我回到家时，我们家的佃农看到我也是卑躬屈膝的。我由此了解，人对人的歧视，不只限于民族之间，在一个社会里面，地位高的阶层也会歧视低阶层的人。可见，民族主义只能解决民族对民族的歧视，不能解决阶级对阶级的歧视，如果要有真正的社会正义，就非实现社会主义不可。

问：这样说，是不是社会主义要比民族主义优先？

陈：也不能这么说。自从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开始对外侵略时，被侵略者常常是整个民族沦为被奴隶的对象，这个时候全民族的反抗可以说是唯一的拯救之道，民族主义是很重要的。当然帝国主义也利用被侵略民族中的少数人，以他们为工具，来控制被侵略的民族。而这些少数人，往往可能就是这个被侵略民族中的压迫阶级。所以，被侵略民

族的反抗，对外就是民族主义，对内就是那些与帝国主义合作的压迫阶级，这样，这种革命就同时具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性格。

问：您怎么会形成这样的想法呢?

陈：这些当然是慢慢形成的。台湾光复以后，我在台中农学院（中兴大学前身）读书，看到来台湾接收的国民党的种种腐败现象，就想，那么我们中国要怎么办？如果中国一直是这种政府，中国怎么可能富强，怎么可能摆脱被侵略、被歧视的处境？在当时的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我终于了解到，必须以革命手段重新建造一个既反帝国主义、又能实现社会正义的新中国，才能实现我心中的理想。从此以后，我就走上了这条路。

问：您这种选择，让您好几次面临杀身之祸，还坐过两次牢，总共坐了二十一年，而且两次审判都备受酷刑，这样的道路，您曾经反省过吗?

陈：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而选择这条路就是随时准备要杀头，

我一开始就有这种觉悟。只有一次，我感到很痛苦。第二次坐牢时，我从“中央日报”读到一些伤痕文学的作品，开始了解“文革”的某些事情，我就想，中国革命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那我为革命献身不是毫无意义吗？为了这个，有一阵子我几乎不想活了。后来我不断地读书、思考，终于了解革命过程不可能很顺利、很简单，尤其像中国历史那么久，土地那么大，人那么多，又受了一百多年的侵略，怎么可能经过几十年的革命，就马上成功呢。人类追求理想的过程当然是很漫长的，不可能在你活着的时候就看到你追求的目标已经达到。每一个人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尽自己的心力去做，就可以了。我这个思考过程，非常漫长，写过很多笔记，后来，陈福裕帮我整理，你也帮过忙，出了一本书。我的思考不一定正确，但我由此知道，不可以寄望于革命马上成功，或者革命过程永远不会出差错，如果这样想，就会否定历史上所有革命的价值。人类当然最好不要用革命手段来改变社会，但有时候就是不得不选择革命，这是没有办法的。我恰好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我只能选择革命，我只能说，我生在一个不好的时代，但我认为，我的选择没有错。

问：除了这些想法外，您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

陈：我参加组织不久就被捕了，坐了十年的牢。出狱以后，十六年之间忙着养家糊口，有空的时候就到处弄资料来看，没想到因此又被捕。本来要判死刑，后来由于海外营救，只判了十五年，实际坐了十一年的牢。前后三十七年，其实没做什么事。第二次出狱以后，才开始搞活动，而那个时候“台独”已成气候，国民党实际上也是另一种“台独”，在这种大形势下，这些活动其实效果很小。要说起来，有三件事还觉得勉强可以。第一，我带头把统派老政治犯组织起来，成立“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有了这个组织，统派的活动才有了基础。第二，当台湾少数民族工作队和高金素梅委员到日本抗议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要求把靖国神社中的台湾少数民族的牌位移出时，我从旁协助，最后迫使日本法院判决日本首相以官方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是违宪的。第三，当连战准备访问大陆时，邀请一个统派到国民党党部去演讲，我去了。我说，我跟我太太两家，都被国民党害得家破人亡，但我不是来跟国民党算账的。由于两党长期内战，才会使得很多人民被牵扯进去，受到很大的牺牲。现在台湾的族群问题很严重，其根源就是国共内战，要解决岛内的族群问题，首先就要解决国共内战的问题。我告诉连战，解铃还须系铃人，你有责任，也有义务，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到北京和胡锦涛总书记见面，实现国共和解。现在两岸虽然不能和解，起码两党是可以和解的，为了两岸人民的福利，国民党有责任到大陆去跟共产党谈一谈。据说，我这些话，让连战下了最后的决心，提前到大陆去了。这三件事是我比较满意的。不过，整体而言，我做的事还是很少，我自己并不满意。

问：我想事情也不能全部这样看，这就好像是以成败论英雄。当然，人活着总希望可以多做一点事情，但时势使然，人有时候可能会白白活了一辈子。像你们这种“老红帽”，坐了这么久的牢，吃了那么多的苦，始终不改其志，实在是很不简单。比起现在的台湾人，只会追逐名利，完全缺乏理想，你们的人生还是充满光彩的。

陈：我们也就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不过从大形势来看，我对我这辈子还是满意的。我开始反抗日本人的时候，中国还在艰苦地抗战；我加入地下组织的时候，国共正在打内战；我第二次出狱的时候，中国还处在改革开放的艰难时期。现在，中国不论是在经济实力上，还是在国际地位上，都节节上升，现在仅次于美国。而且，美国的实力也越来越弱，而中国的实力还会继续增强，中国人终于可以在世界上扬眉吐气，我高中时所经历的那种痛苦的民族屈辱感大部分可以洗刷干

净了。我这一辈子能看到中国发展成这个样子，自己觉得是蛮满意的。

问：去年去世的颜元叔教授很久以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感谢大陆亿万同胞》，大意是说，中国能有今天，是所有中国同胞几十年来共同努力的成果，我当时看了相当感动。其实在革命过程中，有些人很早就牺牲了，例如你们的前辈郭琇琮、吴思汉、许强、钟浩东等人，我们不能说他们没有贡献。我觉得，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评价你们这些老政治犯。

陈：这是别人如何看待我们的问题，我们不好说什么。

问：您对现在台湾的局面有什么看法?

陈：我对台湾的现状非常困惑，也非常不满意。不论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都不想跟大陆好好合作。台湾的经济明显是不行了，还不甘心跟大陆搞经济合作。最近几年，明明是大陆的游客和大陆的购买团在支撑台湾的经济，但大家不肯承认，赞成统一的人还是那么少，我实在不知道台湾人在想什么。

问：台湾的媒体非常糟糕，基本上没有什么国际新闻，台湾的老百姓对现在世界的经济情势根本就不了解，如果不到欧美、日本的经济已经完全不行的时候，他们恐怕还是没有感觉的。

陈：不知道还要等待多久，台湾人才会醒悟。现在就更糟糕了，政治上的恶斗越来越厉害，政治人物完全不考虑台湾发展的方向问题，让人无可奈何。

问：可不可以简单谈一下您对大陆社会的看法?

陈：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走路也不方便，大陆能去的地方不多，我现在主要从日本的著作中看他们怎么分析大陆的经济发展。我觉得有几点是很明确的，大陆已经清楚地表示，政治上不走西方议会民主的道路，经济上不走自由经济的道路，西方和台湾因此批评大陆专制。我的看法刚好相反，这正表明中国还是朝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走。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人民民主专政来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便准备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物

质、文化等条件的阶段。当这些条件充足后，中国就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不应该以为中国推行市场经济，就已经“走资”。就落后国家（如中国）而言，没有通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可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列宁在晚年提出“新经济政策”(NEP)的时候也说过，像苏联这种落后国家是无法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前，还要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作为“特殊过渡阶段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确保工农政权的性质，充分运用资本主义的优势来发展社会生产，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提供条件。现在，欧美和日本的经济前途普遍不被看好，而它们的政治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这其实是证明了，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恐怕越来越难走；反过来说，中国的道路似乎就成了另一种选择。我还没有办法想清楚中国道路的意义，但很难否认这种道路也许可以为未来的人类开拓另一种前景，这种前景或许可以说，就是朝着社会主义的目标前进吧。

问：现在大陆学界有一种声音，越来越肯定中国文化，因为中国在强大的时候极少对外侵略和掠夺；反过来，中国强大的经济反而对周边国家产生帮助，这就是传统所谓的“王道”。以此推论，现在中国的现代化所激发的经济活力，如果也像以前的中国一样，对周边国家的经济有促进作用，而不是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侵略，那不就是一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吗?

陈：我以前只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思考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的问题，很少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来思考这个问题。我很遗憾，高中以前受的是日本教育，光复后不久就被关，没有机会好好学习中文，我的知识语言还是日语。你以前也跟我讲过大陆学者现在有些人又回去肯定中国文化，这是很有意思的。习近平上台的时候，也一直在强调，要实现中国文化的再腾飞，好像也是在表达这种想法。以前胡锦涛也曾提出“和谐社会”的构想，方向上也是一致的。在中国文化传统上找出和社会主义理想的相似之处，来让中西文化的最大的共同梦想结合在一起，确实很有意思。这就更能证明，中国绝对不会走上西方那种霸道的、侵略成性的资本主义道路的。

问：我们的访谈也许可以结束了，您能不能再讲几句话?

陈：我再讲两点。第一，我生错了时代，但没有做错事，就这一点来讲，我没有遗憾。第二，我大概在有生之年还看不到两岸统一，这是

小小的遗憾。不过，没有关系，大趋势是挡不住的，我已经知道，统一不成问题。

原载于《观察》第三期，二〇一三年十一月

暗夜行路：陈明忠回忆录之整理后记——李娜

第一次见到陈明忠先生，就被他的“蹒跚”吸引。拖着被当年酷刑毁掉的膝盖，他走得吃力却坚定，身无所求、心无旁骛的坚定，这坚定从什么生命经验中来？得知要做回忆录，我就“自告奋勇”了。

二〇一一年六～九月之间，我有时和吕正惠老师，有时和福裕大哥、博洲大哥一起，对陈先生还有他的太太冯守娥老师，做了十九次访谈。吕老师主持整个工作，我做了整理和初步的编辑工作，交与陈先生往复修订，吕老师再做进一步的编排校订，同时请福裕大哥、杰哥增补，最后由夏潮联合会的李中和人间出版社的钰凌做统合出版。

总之，《无悔——陈明忠回忆录》是台湾统左阵营的一项集体工作，我有幸参与其中，要感谢陈先生、吕老师和大家的信任。对我，这也是一段不平静的学习过程，带着我的“大陆背景”，我试着从统左派的血脉和现实，来理解台湾、思考我们欲求共同进步的未来。

“我的回忆有意义吗？”访谈中，陈先生好几次这样问。他难得“犹疑”，但这“犹疑”不需回答。他的一生，无论作为台湾百年离乱的见证，还是红色理想在战后东亚的一种艰困实践，其可贵价值，一读便知。

“有意义吗？”这问号只是让我再度感受他的壮心不已：他的回忆，不是八十岁老人的悠然抒怀，而依然是面对现实的斗争。

陈明忠先生，大家叫他“陈桑”（以日语发音），这是一个包含着亲切关系的尊称。一九八七年以保外就医出狱后，他很快成为统左派各路人马的核心和纽带，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夏潮联合会、工党、劳动党、少数民族部落工作队的先后成立，他都是个关键人物。这二十余年的活动，在这本回忆录里，他讲得不多，但这二十余年活动的根本与精神，念兹在兹，都贯注在他对早年经历的叙述里。

一、雨豆树下的小孩

陈桑一九二九年出生于高雄冈山的小村落五甲尾。如今名“嘉兴里”。二〇一一年夏天我去寻访时，问路“五甲尾”，年轻人多已不知。建于一九二〇年的小学还在原址，教导主任说，日据时代唯一留下的，是操场边那株绿荫如伞的雨豆树。

“整个五甲尾我还认得的，就那株雨豆树了。”

当年他和同学在雨豆树下练习相扑，他们“五甲尾分校”得了冈山地区小学比赛的第一名。因为不少孩子是一九三七年战争爆发后推行“皇民化运动”，才强制入学的，五年级生十八九岁的都有，跟别的学校十二三岁的孩子比，“当然第一”。此时日语的推行也从学校延伸到村落，乡村生活因此多了不少笑话。班上同学用日语请假“我家猪的妈妈发神经了，我要去找猪的哥哥给它打”（猪母发情了，我要去牵猪哥来交配），把日本老师听得目瞪口呆；电影公司来村里拍片，宣传“‘国语’运动的成果”，老农紧张到指着“脑袋”说“睾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村民被组织壮丁团操练，用“碗筷碗筷”代替“左右左右”的口令……这些笑话都极其生动，无论当年总督府宣扬的模范村，还是赞助“台湾独立”论述、貌似学术化的“日据时代日语的普及是台湾形成共同体意识的基础”，都得在笑声中遁形。同时，陈桑回忆农民所受的压榨、学校里的军事化训练，以及随时准备当炮灰的恐惧，来反驳李登辉对殖民统治的美化，“李登辉大概是个很特殊的台湾人吧”。

陈桑出身地主家庭，父亲是接受殖民教育的顺民，还因为战争的机会，开设牛奶牧场和榻榻米工厂，与日本人做生意。战争来了，一般乡下人吃不起白米吃番薯签的时候，他家的饮食变化，是从吃海鱼改吃“有泥土味”的河鱼——因为渔船被军队征用了。以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日本人”的小学生陈明忠，考上高雄中学，受日本学生的欺负，才知道自己是“清国奴”，不是“日本人”。

陆续出版和将出版的老政治犯回忆录中，有一部同样以真率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赖丁旺回忆录》'。赖丁旺和陈桑相差一岁，生在台南楠西村，作为贫家子弟，他更细致地讲述了日据后期农民生活的困苦程度，譬如即使是麻袋片做的衣服，一家四个孩子也只有两个有得穿；

还有习武结社的乡村习俗的起起落落，比如“宋江阵”与地方势力、日本人的关系。颇可与陈桑的回忆对照。

一九二〇年代生发的台湾新文学，以揭露殖民地现实与文化启蒙为职志，乡村社会是主要题材，一九三〇年代中期殖民政府越来越严厉的镇压和管制，让新文学的生存空间日益逼仄。卢沟桥事变后，陈桑喜欢读的杨逵、吕赫若、张文环等人的小说，即便仍以乡村故事寄寓对殖民地问题的思考，也都难以正面处理乡村的民族与阶级冲突（除了杨逵写于一九三八年的《模范村》）。就此而言，陈桑和赖丁旺的回忆录，正是了解“皇民化”时期乡村实景的可贵材料。

陈桑和赖丁旺的回忆都提到了他们的村庄之“偏远”，赖丁旺的楠西村近山，不若台南市区以及海边或平原上的村庄，有地利有交易。陈桑自觉于殖民记忆的“城乡差异和阶级差异”，那是否只有城市或经济较好的乡村，以及地主阶层，才会对殖民时代有好感呢？

以档案史料、文学作品和口述回忆搭建一个多层次的途径，可以了解的是：日本殖民台湾三十年前后，水利、发电设施的修建，农地产出的提高，让一般人在资源掠夺式的殖民地经济发展中，仍能维持生活；小学教育普及率在日据后期达到八~十四岁儿童百分之七十就学；高等教育方面，有条件读书的台湾人被限制进入有刺激不稳思想之虞的文法学科，却颇有机会入农林医各类专门学校，习得一技之长。如此，生产力的提高、导向明确的殖民教育，配合严密的警察制度，维持了所谓良好的社会秩序。这大概是陈桑的上一代人中，不只是陈桑的父亲这样的地主阶层，会对“日据时代”抱有好感的原因。这也意味着一种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殖民意识形态的建立。一九三七年后战争逐渐破坏了生产和生活，但意识形态的松动要复杂得多。

陈桑在高雄中学被日本同学欺负，由歧视唤醒民族意识，这是殖民地人，特别是受教育者觉醒的常见形式。他曾请求父亲给自己转学到台南二中（以台湾子弟为主的中学，“总督府台南州立第二中学校”，一九四五年改名“台湾省立台南第一中学”），如果在那里，陈桑自问，是不是他也会成为一个“读书就好”的顺民呢？

阶级是事实，阶级立场却是主观能动性。如果不是日后“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从雨豆树下走出的陈桑，大概难以这样得见殖民地生活的城乡

差异和阶级差异。

一九四九年后国民党当局通过土地改革、白色恐怖和情治体系，以及以儒家为底的道德伦理规训，完成了一套新的意识形态管控，却与日据时代的殖民意识形态具有本质的连贯性。正如“清理奴化思想”，取而代之的是“人人脑中有个‘警备总部’”。之后反体制运动和“解严”，也不曾动摇从日据时代确立的“知礼守法”和现代化价值。或也因此，虽然如今以美化殖民经验来建构“我族”的认同政治，不那么有效了，却不妨碍它以“多元文化”的名义，转为从官方到民间通吃的温情怀旧，或曰“殖民地乡愁”，如大热的《海角七号》里的日台之恋，如建成文物景点的金瓜石日本员工宿舍；也不妨碍国民党一样郑重其事地纪念乌山头水库和八田与一，不妨碍文化界热衷“跳舞时代”的各种“现代化初体验”。

从学界的戴国辉、许介麟到陈桑，都曾用了各种资料和譬喻来破解殖民现代化建设的神话，“小偷为了偷东西带了梯子来，离开时带不走，我们就该感谢他带来梯子吗？”但人们在意的似乎并非小偷的正义与否，而是这个梯子是否符合当下的审美。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日本殖民、国共内战、两岸分断……或者没那么要紧，只要“尊重多元记忆”就好了。如果这是一种普遍的怠惰，那么沿着殖民史观批判，或许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进对殖民意识形态的反思。我想陈桑可以略宽心的是，也有许多为社会变革投身乡镇、社区等具体实践的年轻人，“蓝绿”魔咒不能再捆绑他们，殖民地经验也得以被更清醒、有历史感地对待。

几次访谈之间，得知我去了五甲尾，陈桑在一个信封上默了一首诗给我看：

（所谓故乡，是唱着悲伤的歌、从远方想念的地方………）

“家没了，地没了，母亲走了……小时候的同学，这些年也一个个都走掉了。十几岁就离开家，故乡就一直是远远想着才有。回去，什么都没有。但五甲尾是这辈子最无忧无虑的时候。”回忆即便有着强烈的现实战斗指向，也仍是个感性的力气活，不时让他陷入唏嘘激动。他也从不回避他身上的日本印记，他记得许多日语诗与歌谣，坦言日本“二

二六”士兵和台中农学院的日本老师对他的影响；日语，更是他日后阅读马克思理论、获得中国大陆信息的重要渠道。

这样一种既有立场又坦然开放的殖民时代回忆，对于大陆理解台湾的殖民地经验和两岸文化差异，当大有帮助。大陆人多有“台湾人有日本情结”的印象——热衷于报道台湾政党斗争的媒体与有功焉——也同样难于了解这一经验的复杂性。想到这里，如果陈桑和赖丁旺的回忆能拍成电影，不会逊于《稻草人》或《海角七号》的有趣有味，一定会引发两岸，特别是年轻人了解的兴趣吧。

二、坐牢算什么

二〇一三年底，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落成了一个“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纪念碑铭文中写着：“一九四九年前后，我军按照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秘密派遣一千五百余名干部入台，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一千一百余人。”这是大陆官方第一次公开这段历史。有杂志报道：这是国共双方绵延三十年的角力过程中，中共鲜有的在“隐蔽的战线”上遭遇的沉痛挫败，也阴差阳错地开启了岛内的一段“惨史”。

“惨史”指的是台湾一九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它当然不是“阴差阳错”地被开启的。“白色恐怖”之于大陆人，还不如被蓝绿政治捆绑的“二二八”更熟悉。陈桑说，大陆曾有人问他：“你是蓝的还是绿的？”他说：“我是红的。”听者吓了一跳。

从党外运动到民进党执政，“二二八”是用以控诉威权体制的武器；“白色恐怖”少被提及，因为反共意识形态并非改变，而对彼时运动分化、通过了“台独”纲领的民进党来说，不分省籍的受难也无利于“国殇”建构。“白色恐怖”迟至一九九〇年代才因六张犁公墓进入公众视野，并不奇怪。“夏潮联合会”、“中国统一联盟”等成立后，统左有了组织，也有意识地以报告文学、口述史、纪录片等文化形式，推开白色恐怖和冷战的铁幕，争夺战后历史的论述权。（其实一九八〇年代中期陈映真和蓝博洲的作品都已开启了这一工作。）

近年来形势悄然变化，随着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日益开放，政治上打“省籍”牌已不是万灵药，民进党也开始“看见”白色恐怖。而陈桑的回忆，一方面以“‘二二八’台独起源论”为对手；另一方面，我觉得更有意味的是，他的亲历带出了“人民”的视角：从日据时代的抵抗，到“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是台湾人民反抗奴役、专制与腐败的连续历史。

1.“敢反抗日本人的，就敢反抗国民党。”

“从高雄到台中读书以后，最让我吃惊的是，街上十字楼口旁常有二十到三十个年轻人，围着圈弹风琴一起学‘国歌’…深深感觉在思想上我真的比那些人落后太多。两年后‘二二八’事件发生，我在“‘二二八”最后

一役’之地的埔里看到了当年教唱‘国歌’、教学国语的那些人围在谢雪红旁边、听谢雪红指挥的情形。三年后白色恐怖肃杀全面展开，我更在＾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里，看到了那些人从容就义的最后一幕，也就是，由于‘二二八’事件而抛弃‘白色祖国’，走向‘红色祖国’的那批爱祖国爱人民的热血青年的下场。”

“敢反抗日本人的，就敢反抗国民党。”

陈桑和赖丁旺的讲述里，时时可以感受到一种属于移民乡村社会传统的草莽气息。赖丁旺回忆，光复后，楠西和附近的村子迅速恢复了曾被日本人禁止的“宋江阵”，人们结社练武，交朋友，行侠仗义，“心里很畅快”。陈桑虽然已经是读农学院的“读书人”，但从幼年时就表现出来的机敏好勇，在这个才从日本军队的暴力和谎言中走出来的青年身上，更显旺盛。“会武功”的祖父和反抗日本人的“土匪”姑婆，似乎把反骨都隔代传给了他。

从凭着血气参加“二二八”，到“认识到国民党的腐败不代表中国”、“为了建设一个公平、平等的新中国”秘密入党，陈桑踏上红色理想的不悔路。

一九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中共地下党“潜伏在台湾”是大肆抓捕的由头；朝鲜战争爆发、“冷战”格局下得到美国的庇护，是大肆杀戮的背景。国民党档案资料中，被捕叛变的“中共台湾省地下工作委员会”领导人蔡孝乾供认，当时发展的台籍地下党员九百多人，大陆来的人数不明确，但一共被抓的党员约一千三百多人。而据台湾多年来官方公布或民间调查（争议至今）的数字，被抓的人达到九万（或说十三万～十五万），被处死的九千人（或说一万）左右。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再度“清共”，抓捕杀戮以至于疯狂——狮子的凶心里都有兔子的怯弱，陈桑说：“它（国民党）是太害怕了。”

对死难者，许多人是通过陈映真、蓝博洲等人的小说如《铃铛花》《山路》《赵南栋》《幌马车之歌》，或者电影《悲情城市》得以了解的。那些为理想抛家舍子、义无反顾，甚至拒绝“感训”、从容赴死的革命者，从几十年的压抑历史中浮出，其震撼和动人，可想而知。

陈桑说：“判死刑的人，许多人是像陈映真小说写的，视死如归。他们选择了共产主义，知道是掉脑袋的事。但那时候，共产党在台湾的力

量薄弱，为了壮大，采取了比较宽的路线，凡是反对国民党的，都争取进来。所以有许多年轻人，有左倾或者同情共产党的，还谈不上对共产主义有多少认识，或多深的信仰。所以，在狱中，面对死亡的命运，不好受。”他停下来，“心有不甘啊”。

陈桑自己在误以为被叫出去枪毙时（实际是转移），走在狱中过道上，天灵盖突突地跳，“才知道人的脑袋上面还有动脉”。

也因此，无论外省人张伯哲对周围人的关怀抚慰、上刑场时的平静从容，罗东镇青年冯锦辉与难友告别时温暖如常的手，还是那些心有不甘者的痛苦，都成为陈桑一生的精神印记。回忆狱中生活的时候，陈桑的讲述常常急促而跳跃，提到一个个人名，一个个故事，如断简残编却惊心动魄。许多人如武侠小说人物一样来无影去无踪，他所固执的，是想要为他看到的每一个生命的瞬间光华留下记录。

再之后，他叹息复沉默，要讲的是：“慷慨就义易，活下来难。”

第一次坐牢的十年，一方面，他看了太多逃亡、发神经、成为告密者的悲剧；另一方面，他见证了许多被牵连或无辜被抓的台湾人，原不知共产主义为何物，却在狱中走向“红色祖国”。那些喊着口号赴死的人震动着他们，“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对这些人，名为“新生训导处”的绿岛监狱，的确是他们的新生之地、他们的“学校”，所以出狱后往来，他们互称“老同学”。

有知识的教没上过学的，英语、代数、几何，什么都教。外省人教福佬人和客家人国语。思想上的学习则冒着风险，他们利用监狱“政治学习”课上的教材：投降的共产党理论家叶青写的《毛泽东思想批判》，“大段大段引用毛泽东的话”，简直有“为匪宣传”之嫌。他们略其批判而读。有人甚至偷偷抄下来藏在牢房里，几十个人因此被安上“暴动”的名字枪毙。但仍有人冒生命危险做抄录，藏匿在厕所便池下的水泥地里。伴随这样饥渴的学习热情，还产生了“极左”和“修正主义”的派系。“极左派”攻击较为知识分子型的狱友，开展各种形式的狱中反抗，譬如多盛饭然后倒在厕所里，来消耗敌人的粮食，譬如用做“狗仔”（奸细）的方式“打入敌人内部”，等等。回忆牢房里的“斗争”，陈桑叹惋：“极左”虽有热情，但徒劳而已，甚至白白牺牲。“什么都反抗”让整个牢房的难友受罚。十年间，母亲路迢迢地来绿岛两次都不得接见，从此黯然不再来。一次，为了让一个难友扮“狗仔”“打入

敌人内部”，他们选出叫石沧柏的来做“被打报告的人”，结果石被随之而来的审讯逼得“发了神经”。“是很勇敢啦！”陈桑不愿批评难友们，在那样残酷的处境中，即使是荒谬的反抗，也是种光亮，是活下去的意义。

2.“共匪”的信息

“老同学”多未亲炙过大陆，在狱中，除了“共匪”毛泽东的思想，还有“共匪”的战俘，带来“红色祖国”的信息。

一九五二年十月，国民党袭击莆田的南日岛，俘虏八百多名解放军，军官全被处死，士兵被送到绿岛，编入“第三大队”，成了与台湾政治犯一起上训导课的“同学”。陈桑印象深刻：他们很多人没上过学，却能认字，那是在部队学的；他们的军官都死了，但在绿岛，他们竟然摸清碉堡、机关枪的位置，策划了抢夺补给船、逃回大陆或者上山打游击的“暴动”，台风拖延了补给船，暴动失败。曾经帮他们送报纸“国际版”的“老同学”也受到牵连，包括陈桑在内的一批“不老实”的政治犯被趁机整肃，与南日岛战俘一起被押赴台北的“军法处”。

时逢七月一日，“反正要死了”，南日岛战俘与台湾政治犯一起唱起了“五星红旗的国歌”。

南日岛俘虏最后都被枪决了。台湾的政治犯们，因为其中一人的父亲卖掉医院奔走营救，再次得免一死。“南日岛的俘虏，大陆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的事情。”

考古学家张光直一九四九年也曾入狱一年，他的自述《番薯人的故事》里，记录了与金门战俘的两次相遇。一段是在情报处监狱时，十来个解放军战俘，被允许与单独关押的团长见面，一坐下来，他们讨论的是“这一仗怎么打输的”，如同开战后检讨会，连监狱的所长也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另一段更有意思，是送到内湖“感训”后，听到一个国民党教官对金门战俘的“指导课”：

教：（穿军装，二十出头，可能已在军校毕业）你在这里与原来的部队有什么不同?

俘：（穿俘虏装，二十上下。剃光头，华北农村中的典型老实人的样子）：不一样！就像我走出走进营部的时候，还要给卫兵敬礼。看见了个官，又要敬礼。

教：这是非常重要的"礼"。军队里没有礼貌就没有秩序。给卫兵敬礼是尊敬他的守卫的职务；给官长敬礼是尊敬他比我高的等级。这是从三千年前孔子的时候就传下来的。

俘：我们那边不敬礼，也照样有秩序。看谁轮到站岗，点一个头；我们没有等级，照样也有发命令的，有把命令接过来照做的。

这特殊环境下两岸接触的吉光片羽，让人听来五味杂陈。一九五〇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展露了如此清新昂扬的面貌！它不只是以暴力打破了旧世界。部队是学校，除了识字，他们在具体的战斗中认识和实践平等、秩序的新含义。这本是革命的精神所在，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的基础。相应地，一九五〇年代的台湾，如内湖的小军官所言，偷渡于"三千年前孔子的时候就传下来的"仁义礼智信中的等级与规训，正在重新整合台湾的移民传统和殖民地经验，形成三十余年"戒严"的基础。那是高度有效的管控，是思想暗哑、消失了"左眼"的时代。但在狱中，疑似的"共匪"经过"训导"，成了真正的"共匪"，恐怕是当政者怎么也想不到的。

张光直在北平度过童年，日本占领北平时，上学路上可见城外常常被八路军扒开的铁路；报摊上可买到偷运来的"解放区"的任何报刊。到台湾后就读建国中学，又受到国文老师——大陆来的地下党罗铁鹰先生的影响，以"左倾学生"入狱。一年后张光直终于被父亲张我军辗转保释出狱，即报考台大考古人类学专业，走上研究"器物与古人"的学问之路。比他大两岁的陈桑则继续他的暗夜之路。白色恐怖施加于他们的，在未来，还要让他们殊途同归：在民族情感与社会主义信仰的问题上。

总之，在绿岛这所学校里，从鬼门关走过一遭的人们成了"老同学"，完成了社会主义的启蒙，奠定了对"红色祖国"的向往。狱中学习资源有限，也无从实践。无须回避：作为台湾左翼思想的残存继承，这一血脉先天不足。但他们所走过的是炼狱，有逃亡，有疯狂，有为"激进还是修正"势不两立，也有相濡以沫、拼死卫护的情谊。陈桑说，狱中每天二十四小时相对，彼此全无遮掩，相互太了解了，所以"老同

学”的信仰中有无从撼动的情感，一九八八年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成立后，是以成为台湾统派最坚定的母体。

3.土地改革与白色恐怖

二〇一〇年我跟随蓝博洲去苗栗探访当年地下党最后逃亡的山区。陈映真曾以此写下报告文学《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一九九二）：客家青年曾梅兰苦苦寻找一九五〇年代以“二条一””处死的哥哥的尸骨，终于让六张犁公墓与白色恐怖浮出历史地表。陈映真随之探寻一九五〇年代被扑杀的左翼青年中“觉醒的农民”，为何农民中之最“诚恳、正直”的会投身革命，且“一旦觉醒，英勇异常”——这是土地改革几十年后，当代人难以理解的。作家朱天心则以出狱的亲人为原型写下小说《从前从前有个浦岛太郎》，地主出身而试图解放自己的佃农的“宝将”，在小说中，只是一种因青春血气导致的误会，一场龙宫归来猛然惊醒的悲情。

陈映真的报告文学，每读之如文中所言：“即使号啕失声，也不为失态。”但我们必得从这一情感重击中稍微抽离，来面对异议：那并不遥远的历史，却已经要问“谁的记忆算数”。陈映真的叙述脉络里，台湾人的红色理想在光复前后有其阶级矛盾的土壤，也有短暂而具体的实践。而朱天心对土改前乡村社会的描写，无疑更符合当代人的感觉：地主和佃农在各就其位的乡村秩序中，大可能温情脉脉。（这一想象分歧，与大陆社会近年来对土改历史的翻案和争议，颇有一比。）地主的良善与否自然可有别，但地主与佃农土地、生产关系上的根本冲突，却不取决于地主的品格。朱天心在小说中尽其可能地对“宝将”和他的革命理想做同情与了解，已是人道主义话语面对历史所能达到的进步的极限。

在苗栗，望着茂密山林和幽谷，蓝博洲说，一九四九年开始的土地改革，使得逃亡的地下党渐渐不易得到农民的支持了。

当年在苗栗山区逃亡的萧道应等人试图“重建”省工委，他对同志说：国民党土改可能让我们失去农民的支持，但我们还是要鼓励他们去减租、分土地。

“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源远流长，一九二〇年代台湾农民组合运动不曾做到，日据后期觉醒的地主子弟，比如陈桑，比如朱天心笔下的“宝将”，也曾想把家里的土地分给佃农。讽刺的是，自己革命做不到的，关在牢里时，却被敌人做到了。

从“三七五减租”到“耕者有其田”，农民逐渐转化为自耕农，与地主的关系得到缓解，也为一九六〇年代工业发展提供了自由移动的劳动力基础。从只管种地到只管赚钱，一样的是不问政治。

这里有个有意味的对照，中共在大陆发动土改时，不管是在抗战和内战期间以“打土豪、分田地”来获得农民支持，还是建国初期新区土改的“群众运动”，都极为重视这过程中乡村结构的改变和“人的觉悟”。很多档案和运动的观察者，细腻地记录了生产关系变化中人与人的关系变化、乡村新政治形态的产生，比如“干部”和“群众”的关系、群众的分化、暴力的问题等等。农民与政治的关系是被正向鼓励的。一九五〇年代，在台湾的国民党则有意以共产党土改中的暴力为反面教材，正当化其“自上而下”、和平赎买的方式进行土改，而作用恰是去政治的。土改让农民安分守己。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白色恐怖得以实行并令社会长期喑哑的“民意基础”。

所以十几年后“老同学”陆续出狱，无不感叹从“小牢”到“大牢”，体制监控与民间歧视的无所不在。一九九〇年代以来，以“走出白色恐怖”为号召的出版物，从官方到民间，所在皆是。如何走出“白色恐怖”？恐怕并不依赖“从吞恨到感恩”的劫后余生心态。对罪行的控诉或有时尽，深入个体意识肌理的恐怖，才更难走出。

三、陈桑的遗憾

第二次出狱后，在"民气可用"的形势下，丢失工党这个阵地，是陈桑最感痛心之事。一九七〇年代，他偷印禁书、与反对党接触乃至策反黄顺兴的行动，多是独立、秘密进行的，也不可能有什么组织工作。到了他出狱后的一九八七年，《夏潮》《人间》杂志十几年来凝聚的力量和影响，已有所积累，如果与社会民主派合作的工党组党成功，统左派将有一个真正的阵地，公开战斗的阵地。

"那个势，过去了就没有了。"陈桑详细讲了他认为的造成工党分裂的多重因素，或许也会引起当事人与关心者不同角度的意见。若以二十余年来各自发展的经验，重新检讨这个"失败"，是否能提供一个左翼各方实践重新合作的想象呢？无论如何，陈桑认为，这是他们该给后辈的交代。

比工党的分裂更让他揪心的，是"统"与"左"的分裂。陈桑认为，对改革开放后大陆社会性质的认识差异，是"统"与"左"分裂的原因。代表正义、平等、穷人过上好日子的社会主义理想，还在吗？陈桑为此大量阅读有关中国革命的历史材料，思考现实，得出的结论为，大陆是"特殊过渡阶段的国家资本主义"，仍在朝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走。而美国对台湾战后经济和政治无远弗届的渗透，让台湾一度成了新形态的美国殖民地。因而，统一亦是立足于反帝基础上的民族主义。基于此，陈桑认为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虽是阶级矛盾，但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却是"统""独"矛盾。因此陈桑的回忆录有着贯穿始终的对话对象：关于"独立"的论述，和渐行渐远的（不愿意统或消极于统的）左派。

台湾左翼的光谱并不只是以"统""独"分，还有保钓左，毛派，学院左，运动左，道德左，假左，还有不愿被归派别的、进入台湾社会变革的具体面向的新一代实践者……那么如何对待不赞成或消极于统一的左派呢？除了对大陆社会主义性质之争议，在其实践领域内，还有怎样值得聆听的声音？譬如对两岸经贸往来模式偏于图利资本的状况，对大陆"惠台"政策的反省。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只有为台湾的农业自主、合作化打下基础，大陆的"采购"和支持，才能成为可持续性的力量。何况，采购团若没有站得稳的中间人，没有在地组织

——远有台南学甲虱目鱼、近有金钻菠萝的案例，“惠”的落实又何其难也！然而，或许也是从这里，可以重新构想“统”与“左”的携手。特别是，在两岸文化、学术的精英交流之外，如何打开两岸基层民众的实质交流！

二〇一四年三月台湾发生的“反服贸”事件，无疑有政党政治与“冷战”格局的遗留或内化，但从台湾的年轻人的表现看，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政治操作，其实已经越来越罩不住他们。大陆无须对台湾民主抱有蔷薇梦，但也不能率意对待，错过与这一代青年以及他们所内含的台湾社会的深层矛盾的对话。新任国台办主任从台湾“反服贸”得到的启示是：“要全面了解台湾，了解台湾基层民众的想法。”

有时，陈桑会说：“我的一生是失败的，没能革命！也只能如此了。”

陈桑的路，贯穿着一个想做真正的、不被奴役的、勇敢的人，不为自己苟活的人的理想，在白色恐怖的年代他坚定了统一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心无旁骛走到今天，而两岸的往来，_直在以种种新问题提出挑战。有谁说，自日据时代萌生以来，台湾左翼运动是一连串的挫败史？看看二十世纪的世界，又岂止是台湾左翼。后辈只能踏着前辈的挫败往前走，如果对“失败”的检讨能推动两岸共同进步，我想，该是陈桑最乐见的。

关于回忆录的整理，我也有几点遗憾。首先是我不懂闽南语，陈桑用国语讲述，先得经过他自己的一番翻译，我的记录又常需补足，这过程中一定失落了他的许多生动。这是我觉得遗憾和抱歉的。但我想，他的经验仅是最平白朴实的保留，都无损其价值。我尽力保留他的口语，希望能把他的气息和气概留在文字中。

再一个遗憾是有关陈桑的爱人冯守娥老师的部分，冯老师的故事精彩动人，历史内涵的丰厚，不逊于陈桑；而他们和两个女儿一起经历的，足可以另成一本书。但为了陈桑回忆录的主题集中，只能留待他日。

感谢陈桑和冯老师，带我走过这一程，两年多前的所闻所谈，在今日仍是我的动力和思考资源。感谢吕老师和杰哥成全我的学习，无论资料还是实地踏访，他们都是坚强后盾。吕老师身兼主持、外联和校对，最为辛苦。感谢博洲大哥把多年访谈的资料、影像都复制给我；

福裕大哥以丰富的经济学知识帮我了解许多背景。感谢夏潮同仁的帮助，其实他们比我胜任整理工作。感谢陈桑的大学同学林渊源先生接受我鲁莽的访谈。还要谢谢俊宪载我去五甲尾和高雄踏访讨论。最后，很重要的，是李中、钰凌、美编玛琍、琪椿、敏逸为出版所做的统合工作，她们不只是“敬业”，也为珍惜这一台湾记忆，倾注了许多感情。因为她们，回忆录才以这样恰切的面貌问世。

整理后记我借用了“暗夜行路”这个词，这是陈桑曾经想给回忆录的名字，来自志贺直哉的小说。或许是觉得小说里孤独的思想探索终究太文人气？陈桑最后用了“无悔”。我觉得，这两个词合起来，是对他的人生最好的描述。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三日

封底

乱世的人本来就不如太平时代的狗，我不过是生错了时代，并没有走错了路

地狱般的刑求后，我体悟的是，只要精神不崩溃，肉体上的痛苦是可以忍受的我想起张伯哲面对死亡时的从容，想起他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

我们为两个女儿取名"志民""志平"——志在为人民，志在为民主；志在为和平、志在为平等。这是我们夫妻的共同理想

参加"二二八"事件抗争，是我自己选择拿枪。七十年代台湾民主运动刚萌芽，我虽然知道坐过牢的人参加这类活动相当危险，但我认为应当为台湾的民主尽力；同时也不愿意台湾继续做美国的附庸，希望中国统一，希望中国富强，希望中国人拥有自尊，不再被人歧视；并且希望在这基础上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永远不要再出现人欺负人、人歧视人的不正常现象

这都是我自己选择的路，这条路就是要提着脑袋走的，坐牢和牺牲都不能埋怨。

假如人生再来一次，我还是会选择同样的路

ISBN 978-7-108-05664-1

定价：48.00